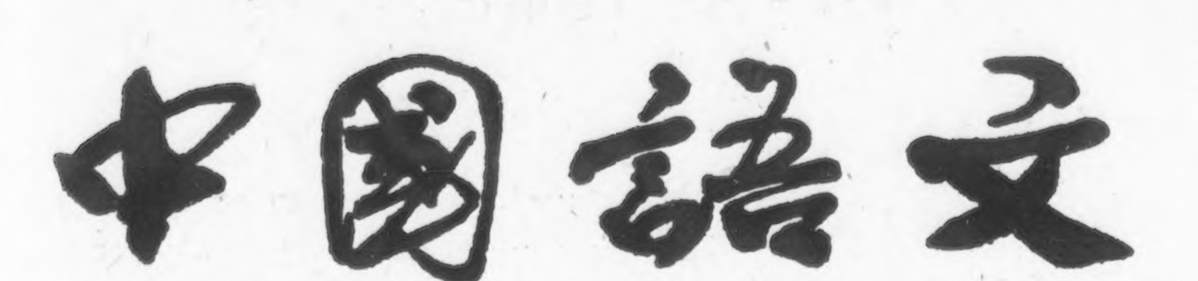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4

1959

1959年4月号(总第82期)目录

五四运动促进了汉字改革

郑林曦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員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澤东:《新民主主义論》

上面一段引文是毛主席在紀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后不久写的。在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們引用来說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汉字改革运动的促进作用，仍然显得非常恰当而有力。

可是有人說引文中的所謂"文字"，是專指白話文來說的，不一定包括汉字改革。我过去也有些相信这种解釋。可是当我研究了五四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的情况以后，再讀毛主席这段話，就越来越相信其中所說的"文字"方面的革命，是指汉字改革而說的，或者至少是兼指白話文和汉字改革两者而說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文字是書面形态的語言。文字和語言同样是思想的形式。五四以来，不仅提出了白話文，而且也提出了用拼音文字来書写白話文。改革汉字的口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至后来，都是很响亮的。毛主席是十分熟悉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發展情况的，不会不注意到汉字改革这个重要方面。第二，同一篇文章中，又有一句講到"文字"的極重要的話，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众，須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里文字和語言对应着說，十分清楚是專指書写的文字。同一个詞在同一篇文章中，不可能旣專指書写的文字又根本不包括書写的文字。因此我以为上述引文中所說的"文字"方面的革命是指汉字的根本的改革而說的，或者至少是包括白話文和汉字改革这两方面在內的。

从五四以来的历史的实际来看，文字方面是否和文學語言方面一样提出了根本改革的問題呢？事实正是如此。五四运动对汉字的改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不仅五四的当时曾經热烈討論过这个問題，而且基本上达到了文字应当拼音化的初步一致的意見；在五四以后十年左右出現了两种有相当影响的拼音文字的样品——国語罗馬字和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它們給今天的汉語拼音方案和将来的拼音文字的实現开辟了一条大路。

一

汉字改革的口号，在五四以前二十年就提出来了；可是只有經过五四运动，汉字改革的口号才得到新的意义；汉字改革的运动，才有了新的巨大發展。

請看五四运动以前汉字改革运动的局面是何等局促：那时候，王照、劳乃宣等的"切音运动"已經成了尾声，漸漸沈寂下来。第一套較完善的拼音工具——注音字母，虽然在1913年由讀音統一会通过了，可是被擱置下来沒有公布和广泛推行。汉字簡化問題，有人(如陆費逵)提过一下，也沒有什么动靜。整个的学校語文教育还依然是在識汉字、学文言、讀古書的方式下进行着。采用什么較簡易的方法来扫除广大群众中的文盲，更是无从談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这种局面。从政治方面說，中国的无产阶級已經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們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要反帝、反封建，而且要学文化、学科学。在掌握文字工具的問題上，不仅清末以来开明的士大夫那种把汉字作为"文綉之衣、膾炙之食"，專供上等阶級享用，把切音字作为"毛褐之衣、粗糲之食"聊使下等小民"御冻飢，保喘息"①的解决办法，他們不能接受；就是資产阶級文人学者那种在汉文旁边永不相离地加上注音字母，"用最少日力，超度一班'灶婢厮养'也增一点智識"②的主張，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他們不仅要求把社会上正在通用的汉字加以簡化以便于民众学習使用，而且提出根本改革汉字，另創一套便于人民大众掌握使用的拼音文字工具的要求来，也就是要实行文字拼音化。文字拼音化的方法，不再是采用汉字偏旁或笔画簡單的汉字来制作字母，而是干脆采用世界上較通用的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語。无論拼音文字是

---

① 这些話都見于劳乃宣的《簡字丛录》。

② 吳稚暉：《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5卷5号。

否真正在五四时期和以后取得成功，从四十年来的發展情况和汉字改革运动的整个趋势看，这条道路总是开辟得基本正确的。五四之功不可沒！回顧已經走过的道路，更加坚定我們的信心。我們相信：沿着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話以逐步發展为拼音文字这条路走，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要不要采用拉丁字母(当时叫罗馬字母)来拼写現代汉語以制作拼音文字問題上，五四时代是进行过剧烈斗爭的。首先提出"廢灭汉文"的錢玄同，是要把汉字汉語都不用，逕直改用世界語(Esperanto)的。在五四前一两年，他对于用罗馬字母拼写汉語，竟然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① 他和头脑混乱，对民族的語言文字抱虛无主义的吳稚暉一唱一和，把这种怀疑汉語拼音文字的必要和可能的意見坚持了好几年。直到五四之后三年(1923年)，受到北大学生們在李大釗同志支持下所办的《新潮》杂志等的影响，才在《国語月刊》上打出"汉字革命"的大旗来，主張采用接近拉丁字母的国际音标来拼写汉語，制作文字。当时陈独秀等人則都贊成"先廢汉文，且存汉語，而改用罗馬字母書之"。② 比較积極的并切实从事文字拼音化研究的是黎錦熙等人。蔡元培对采用拉丁字母拼音也表示了比較鮮明的贊同态度。魯迅在五四时期是积極支持用罗馬字母拼音的汉字改革的，曾經說："…当时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汉字，用罗馬字母来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罵錢玄同。"③到后来，他更积極宣傳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写《門外文談》，成为汉字改革运动的一員主将。瞿秋白一直是关心汉字改革事业的，据黎錦熙先生談，他在北京时曾把所拟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寄給錢玄同看，并写信要求会見談这个問題。可是因为当时他已經是有名的"赤色分子"，錢先生沒敢見他。瞿秋白同志后来批判了五四时代的汉字改革思想和国語罗馬字的方案，把文字拼音化的运动引导向大众化的方向。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看，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汉字改革的口号提得这样响亮呢？我們可以看到，主要是以下几种客观的历史發展的趋势所促成的：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工人阶級和农民，坚决反帝、反封建，就不能不在要求經济、政治上的翻身的同时，更要求文化上的翻身，要求一种容易为他們掌握的文字。領导革命的共产党一貫积極主張滿足群众的这种要求。

2) 中国資产阶級虽然是軟弱的，但也有它革命的一面。作为他們在政治、文化运动上的代言人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介紹現代科学知識；为了同封建文化作斗爭，也需要文字工具的改革。

3) 文学語言上的革新是一种促进剂。既然要用現代活人的汉語普通話来代替古代死人的文言文作为文学語言的正宗，就不能不考虑把那主要适于写文言而不利于写白話的汉字，改革成更便于拼写普通話的拼音文字。

4) 为了發展生产，不能不介紹进現代的科学技术知識。而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識就不能不普及現代科学技术上的重要符号之一的拉丁字母以及字母索引方法等。借入外来科学术語，音譯外国人名、地名，制作电碼、旗語、盲文等，也要求采用国际上較通用的字母，而不是自造汉字式的字母所能解决問題。

这些客观上的需要，常常表現在提倡汉字根本改革者的文章所提出的改革理由中。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詳細列举了。

二

四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在汉字改革这項事业上，到底建立了什么功劳，發生了什么影响呢？我以为主要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1)白話文的广泛应用，使普通話作为文学語言的地位确立下来。从前白話只用于小說和部分通俗讀物，五四以后逐漸应用到各种書籍、刊物上，后来并用于学校的語文教育和各科課本。北京語音也逐漸形成为普通話的語音标准，借注音字母的帮助在南方若干地区的中小学校和华侨中逐漸傳習开来。这給后来普通話的普及和發展，粗粗地打下了一个基础。对于汉字改革来說，白話文的胜利也十分重要。它肯定了拼音文字所要拼写的是現代普通話的白話而决不是文言。当时拼音文字的宣傳和設計者在白話文普及后也深深感到这点，避免了一手打两仗的麻煩。从十九世紀末就叫起的"言文一致"的口号終于基本上实現了。大家都动手写起白話文章来。越写越感觉到用汉字来写白話，非常容易写成半文不白。真要作到語言接近民众，白話明白如話，不受汉字繁杂难写的障碍，必須实行汉字改革，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五四时代这种推理的邏輯，到瞿秋白同志論語言文字的論著中更得到肯定和發展。他明确地提出了"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国文，应当是習慣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节的，有語尾的，用罗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④現在还时常有人在說：汉字什么都能写；拼

① 錢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問題》，《新青年》4卷2号，1918。

② 陈独秀：《四答錢玄同》，《独秀文存》卷三。

③ 魯迅：《无声的中国》，見《三閑集》。

④ 《瞿秋白文集》，650頁。

音文字比汉字更适合于書写活的語言，不能成为文字必須改革的一种理由。为了批判这种意見，大家倒眞是还有必要溫溫五四时代闡述白話和拼音文字互相關密切关系的一些文章哩！

2）注音字母的公布和推广，对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注音字母被搁置了五年以后，終于能在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公布。紧接着的正是偉大的五四运动，使得教育界和一般知識分子的耳目一新。白話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都在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普及全国了。在小学中教授注音字母，对于普及拼音知識是有巨大影响的。就拿我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說吧，如果不在童年先学会注音字母，对于后来文字改革运动也許不会那么容易感到兴趣。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五四时代曾經有不同的估計因而也有不同的作法。有的只把它限制在"代反切之用"，專为汉字注音。有的却要把它当作雛形的拼音文字来独立应用，制作出了各种体式的印刷字模和手写体。但是，注音字母作为文字独用的希望也終于消失了。五四以来的历史經驗証明了，脫胎于汉字的注音字母无論怎样扶植都不能成为拼音文字。蔡元培和其他的人早已看到这一点，于是就不能不从实际的需要中提出了"汉字旣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了"的要求。①

3）汉字根本改革口号的提出，拼音文字問題的深入研究，拉丁化（罗馬化）方針的确定，国語罗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制成，都是五四运动所直接取得或由它推动而达到的成就。五四时代对汉字要不要改革和怎样改革的看法是相当紛歧的。用黎錦熙先生的比喩来說，一种主張是取消汉語、汉字，将来用世界語代替它們的"无治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种是用罗馬字母拼写汉語以代汉字的"共和主义"；一种是不根本改革汉字，只采用一些俗体省笔字的"立宪主义"。②在五四运动中第一种的民族虛无主义的思想言論受到批判，連原来主張的人后来也不再坚持了。（錢玄同轉向第二种主張，吳稚暉轉向只要"注音符号"为汉字注音。最后，他連注音字母也不要了，只要用五六十个汉字作声、韵符号。）第三种的主張也受到批判揚弃，主張汉字应当簡化的正确部分被保留下来；而那种只可簡化，不能拼音的錯誤部分則为群众所拋弃。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四运动在汉字改革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經过討論和斗争，初步确立了汉字改革主要应走拼音化道路的思想，并且証明了現代汉語普通話是可以拼写成拼音文字的；而最合实用的拼音字母是世界上較通行的拉丁字母。五四以后的十多年中，对于利用拉丁字母制作汉語拼音文字有了比較深刻的研究，而且实際上由中国人提出了两种比較以往各种拼音方案都优良或簡便的更加适合汉語特性的拼音文字方案——国語罗馬字和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进行了比以往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都广泛和切实的实驗。两种方案虽然都未曾眞正代替汉字成为眞正实用的文字，然而它們从实踐証明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話来制作拼音文字的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虽說这条道路上还有不少实际的困难，尙待艰苦努力才能克服。最可笑的是一些右派分子在五四过了将近四十年以后还要在哪里瞎嚷，說什么拼音化問題沒有經过充分的討論，是共产党領导下的文字改革委員会关起門搞出来的。如果大家有空閑看看过去的文献，就可以看到差不多所有怀疑或反对文字拼音和采用拉丁字母的問題，四十年前都提出过，爭論过，大部分也已經基本上解决了。在文字拼音化实現以前，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和用什么字母来制作拼音文字的問題，今后当然还可以討論，并且还应当發动更大規模的討論；但是目前更重要的事情却是大力推广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用拼音字母来帮助扫除文盲，讓几亿人民掌握了拼音工具之后也来参加討論，由他們提出拼音化是好或不好，便利还是不便利；用不着再由少数知識分子冒充代表他們来搖头、嘆气。就汉語拼音方案本身来說，它正是綜合和發展了五四以来用拉丁字母制作的各种汉語拼音方案的优点。五四运动对拼音化开辟草莽、廓清道路的功劳，我們是永远不能忘記的。

4）减省汉字笔画和整理汉字的議案正式提出，对簡化汉字的方法也有了較系統的研究。陆費逵曾在1909和1921年两次提出整理汉字采用簡体俗字的意見。錢玄同1920年在《新青年》，1922年在国語統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都曾提出簡省現行汉字笔画的建議案，后来并曾亲自草拟过常用字簡化的計划。当时曾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贊同。虽然沒有采取什么实際的簡化汉字的行动，汉字应当簡化的道理却深入人心。簡化規律的研究和簡化方法的提出，为后来汉字簡化的实現造成有利条件。有些那时候的簡化建議，③到現在看来也还不失其光彩和价值。比如錢玄同的議案說："我們对于已通行的簡体字，固然应該尽量采用；如其尙可再减，便将他再簡。但已通行的簡体字，字数很不多，我們应該根据上列八种方法，大大添造簡体字。…务使常用的数千字；除那笔画本来很少的以外，个个字都把它减省一下子。"④ 这种建議，就在今天已經初步采用五百多个簡化字后，为了满足群众需要，也还是

① 蔡元培：《汉字改革説》，《国語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蔡先生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注音字母适于直写下行不适于引用橫写旁行的西文，旣然引用外文和学習西文都非学拉丁字母不可，汉語拼音文字就可以直接采用拉丁字母。

② 黎錦熙：《汉字革命軍前进的一条大路》，同上。

③④ 錢玄同等：《减省現行汉字笔画案》，同上。

值得加以考虑的。

5）汉字改革的群众运动和理論研究，都有一定的建树。五四以前的汉字改革热心者，往往不是上書給皇帝、学部，就是依附几个官僚軍閥的势力来推广，常常遭到打击和冷漠对待，跟广大群众距离是很远的。就是那自己設館教学的，傳播也还有限。五四的巨大群众运动推动文字改革者开始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宣傳、推广。拿"国語研究会"来說吧，1916年成立时还是冷冷清清的。随着《新青年》提倡白話文得到群众贊同，特别是"五四"爱国群众运动的展开，这个研究会的会員人数由数十人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1918年)，最后竟达一万二千人(1920年)。①中小学教师等和教育界的群众組織，对普通話("国語")和注音字母的普及，汉字改革运动的推进，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汉字改革的理論研究方面，开始把現代語言文字科学知識应用到汉語、汉字的內部發展規律的研究上。用汉字發展演进的規律来証明改革的必要和可能，对北京語音和四声的調查研究；对現代語法和按詞拼写規則的研究以及拼音文字的拼写法的研究和試驗（例如純拼音文字讀物的出版和教学試点），都取得一定成就，并对后来的理論研究發生不小影响。

总起来說，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汉字改革。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汉字改革运动逐漸形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它提出了根本改革的口号，开辟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現代汉語普通話以制作拼音文字的道路；推广了注音字母并且相当地普及了拼音知識；研究了汉字簡化的規律并提出了較切实的簡化方法。在共产党領导的偉大的五四群众运动激蕩之下和文化新軍的鋒芒載剌之下，当时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中的左派也积極参加了这一改革运动，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一直發展到1935年左右，这一改革运动才为共产党所直接領导并推动起来的更广大、更有力的一次汉字改革的群众运动高潮(大众語和新文字运动)所繼承和代替。后来經过失敗和曲折，才逐步走向今日文字改革运动的步步成功。

四

如果我們只談五四时代汉字改革运动的成就和功劳而不批判运动中的錯誤和缺点，那就不仅是对历史的片面性的理解，而且对于汉字改革运动的繼續發展也沒有好处。过去瞿秋白同志曾經对五四时代的文字改革工作有过細致的批判，然而主要还在于批評白話文学的不徹底和国語罗馬字的繁瑣。对于五四那个时期的文字改革理論和实踐，都还应当繼續进行更深入的批判。这篇短文做不到这一点，这里只能概括地指出那时期理論和实踐上的一些較重大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汉字改革运动还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脫离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还未能得到眞正的成功。前面說的国語研究会等虽然有扩大，基本上还是知識分子的团体，和工农群众接触很少。特别是資产阶級学者所提出的改革目的、具体方案和实現办法，沒有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發，都是不相信并且沒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进行的。例如国語罗馬字就正因为沒有考虑到人民群众学習起来是否困难，不肯从为平民教育服务出發，只想得到少数上層知識分子的承認，然后才去推行，結果脫离群众，通行不开。現在我們很容易看到这种推广路綫是顚倒的，脫离群众的，实际上也导致了五四时期进行的拼音文字試驗的失敗。

第二个缺点是在汉字改革理論上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的片面性。例如把汉字和用汉字写出的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一塌括子看作"記載孔門学說和道教妖言之記号"，②因而提出"廢灭汉文"的極不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起过一点引起震动和討論的作用，但也招来不少本可沒有的反对，对于后来的汉字改革运动也还有不利的影响。此外，对于实現汉字改革的社会条件，也缺乏冷靜正确的估計，有时急躁，有时保守，往往不知道如何發揮主观的能动性，去促成汉字改革的眞正实現。

第三个缺点是无批判地介紹和接受西方資产阶級的語言、文字学說，生搬硬套；而对于汉語、汉字眞正的發展規律，却具有錯誤的認識。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关于詞类的划分和連写規則，几乎全照西文。例如黎錦熙先生就曾明白地承認："总之，我們規定詞类的标准，大体上是参照英文；我們用連号表示詞类的'集合'，其規律，大体上又是参照德文。"③又如当时許多作者都把語言、文字看作个人"表情达意"的工具，离开社会历史的發展，専喜从自然的或技术的观点去研究語言、文字。这都对后来的文字改革的理論研究有不利影响。对語言、文字、文改工作的許多資产阶級的唯心观点，到今天也还应当繼續批判。

当然，五四时代的汉字改革运动，是有它的历史限制的。我們不能处处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当时的人們。这些缺点的指出和批評并不会使整个五四时期汉字改革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减色。我們今天正要承繼五四以来积極的丰富的遗产，并且接受历史的經驗和教訓；在党的正确領导和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走群众路綫，爭取汉字改革运动的更偉大的胜利，爭取文字拼音化的最終实現。(1959年3月底)

---

① 黎錦熙：《国語运动史綱》。

② 錢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問題》。

③ 黎錦熙：《复音詞类构成表的說明書》，《国語月刊，汉字改革号》。

从"国語"运动到汉語規范化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年——

魏 建 功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随着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的發展进入新的阶段。它的进展跟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和方式完全相适应。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員会举行的报告会上，2月3日吳玉章主任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上，都說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簡化汉字，推广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汉語拼音方案。他們的报告反映了一个意义，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生产大跃进的偉大局面迫切要求文化、教育工作也能跟上去，語文改革工作就必須加速进行。吳老說明了几年来工作的方針，特别解說汉語拼音方案草案制定經过和它的用处。汉語拼音方案草案得到全国人民代表的批准，并且被决定作为帮助学習汉字和推广普通話的工具。接着三月党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議上由刘少奇同志代表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極地进行汉字的改革"。这以后，各方面工作眞是飞跃地取得巨大成就。① 举例来說，去年七月底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在北京举行，我們看到来自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不同方言地区，不同职位（中小学、师范、民校教师、学生和教育行政工作人員），不同年龄（最小七岁），不只汉族、还有苗族、傣族、回族、僮族、东乡族、納西族的推广或学習普通話的积極分子。他們大都是在1956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推广普通話的指示以后开始学習的，不到一年半，而学習的成績惊人。尤其是听到福建大田县吳山乡团委書記陈进四同志在会上介紹她自己的經驗，眞令人兴奋。陈进四只上过一年多的民校，憑着建設社会主义的干勁，当全乡还沒有一个当地人会講普通話的时候，带头先学会普通話，又积極組織群众，設法推广，結果仅仅五十天就使吳山乡基本上改变了方言面貌。② 又如，三月中央教育部發出在中小学和各級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四月吉林省八岁的一年級学生陈雅珠才开始学，七月她不但普通話說得很流暢，而且看見用拼音字母拼出的詞句就馬上能准确念出来，听到一句普通話就馬上能用拼音字母拼写出来，連声調都很正确。总之，文改运动一年来的成就簡直是超过了从前几十年的成績。

以这样惊人的速度所取得的成就还只是个开头。分析它的成功原因，无疑地是党和政府的領导重視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党和政府的領导重視和群众的热烈拥护，两方面有着心連心的共同要求。共同要求是什么？可以用周总理报告末了的一句話来說明。他說：

> 希望大家积極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極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脫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發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党和政府代表的是六亿人民的利益，在进行一系列的革命工作中輕重緩急的措施都經过縝密考虑，并且絕对依靠群众。所以在"擺脫文化落后状态，多、快、好、省地發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要求下，党和政府的集中領导跟广大人民的热情拥护一致了，文字改革虽然初步进行，成就已經很大。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字改革工作就安排进行。有人觉得十年来工作还是解放前的那些項目。根据上面談的一年的飞跃情况，結合十年来的措施，我們可以懂得，工作項目并不完全是解放前的那些，而且相同的項目精神实質也大不相同。这要回顧一下几十年文改运动發展过程，把一些关鍵性的情况做一番分析。首先还是从周总理报告里的話来体会。政府領导、語文运动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立場一致，是今昔不同的。上面已經說明，党和政府的集中領导和群众拥护的热情一致了；由于党的領导，就使語文运动工作者和群众联結起来了。周总理說："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

① 杜松寿《試談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跃进情况》說得詳細，見本刊1959年3月号。

② 关于观摩会报导見本刊1958年8月号。

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驟是很愼重的。我們願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見，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項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点，我們就改正——这是我們党和政府进行各項工作的方針，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过去情形怎样呢？我們都知道，远在1894年(淸光緒甲午)，中国被日本打敗，許多爱国人士激發振奋，覚得要救国圖强，必須追上日本維新的措施，对于人民文化教育工作刻不容緩。这些积極的爱国者多半是当时的剝削阶級中有进步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大淸帝国”的官民臣子。他們用自己的語文知識設計一些帮助老百姓識字的工具，苦心孤詣地向專制君主政府情商献策，反映了人民的願望，結果統治者是无动于衷。大約到了1900(淸光緒庚子)年义和团农民运动以后，昏庸的政府才不得不改变一些态度，开始办新学。国家虽然負起了教育的責任，对广大劳动人民实际还不在考虑之中。虽然在淸政府末期資政院的議員对于学校教育也提出意見，主張小学开始要教“合声簡字”(相等于注音字母)，要教“国語”(就是“官話”)，实际新办的学堂依旧是地主剝削阶級子弟进身之阶，是变象的科举，語文改革的問題反而停頓。等到辛亥革命(1912)，資产阶級算是自己掌握了政权，于是“国語”运动才提到日程上来。1913年“讀音統一会”議定了注音字母，直到1918年才由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事实上这时候的政府已为封建旧軍閥所篡据，旧民主主义資产阶級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分散了。“国語”运动者代表着資产阶級新知識阶層，在反动封建旧軍閥政府之下进行社会宣傳活动，跟前此君主时代不同的是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依照他們的意願做一点有益于群众的工作。軍閥統治者只要你不妨碍他的当前利益，对文化教育事业是不关痛痒的，某些文化上的爭論实际上都是限于知識阶層里面的人。“国語”运动者一方面在政府教育部門起着推动的积極作用，一方面在社会上組成全国性的团体起着宣傳和形成風气的作用。①(这个团体叫做“国語研究会”)。总之，政府首脑和語文运动工作者一直不是站在一边的，更說不上和群众一条心了。語文运动工作者起的进步作用主要也只是憑自己的知識做了一些主观努力，例如簡体字的整理、“国音”标准的确定和分析研究、“国語罗馬字”拼音法式的制作等等。他們最严重的缺点是脫离群众。周总理說：“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步驟是很愼重的”。过去政府固然沒有負責，而“国語”运动者許多年积極負責的根本精神就不能象周总理所說的“很愼重”。他們的歧途开始于1919年的对付北洋軍閥政府。正当“五四”时期，文化革命方面的語文改革和文学革命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語統一”的两个口号。知識阶層內部新和旧、进步和保守互相矛盾。由于旧的保守派求援于軍閥統治阶層，如林紓同安福系武人政客的勾連，才引起“国語”运动者考虑对付的策略。他們把“国語研究会”作为民間团体，分出一个“国語統一筹备会”讓它做教育部的附屬机关。这显示了資产阶級上層分子可以化身半官半民，或者說亦官亦民的意义。所以要这样做，因为有这样一种想法：

> 中国向来革新的事业，不經过行政方面的一紙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的；就算大家知道了，而且贊成了，沒有一种强迫力也不会实行的。所以这教育部附屬机关国語統一筹备会的行政事业也大有可紀。況且这筹备会的会員，大多数就是研究会的会員，每有举动，發端于彼，观成于此；此主执行，彼任宣傳。到了后来，索性‘宮中府中，俱为一体’，而研究会这个机关，漸成了一个历史上的名詞，更不能不把这个行政机关作为国語运动史的主体了。

对付愚蠢的軍閥可以这样，对待革新事业的接受者(群众)就不应这样。“發端于彼，观成于此”，只可以对付軍閥一类的人。对待群众，一概認为“革新事业不經过行政方面一紙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和“大家知道了，而且贊成了，沒有一种强迫力也不会实行”，就錯誤了。这样一来，“国語”运动革新事业客观上就不能不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所以这样的主导思想和它的工作方法就不能不是脫离群众的。周总理說的党和政府“願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見，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項工作。工作中如有缺点，我們就改正”。这样的为人民服务法，也不可能存在于从前“国語”运动工作里。因此，党和政府十年来的工作，得到这一年飞跃，而且超过从前几十年的成績，是由于做到了領导、專家、群众三結合，立場一致，而党的正确領导更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我們要从党和政府十年来的措施上来体会。总的說来，具体安排切合实际，是从前几十年来所沒有的。人民政府剛成立，开国典礼后十天，“文字改革协会”就在党的領导下組織起来。随着工作的發展，在政府机构里組成文改工作部門，成立宙音、推广普通話專門組織。同时为了开展語文工作，普及祖国語文科学的知識，提高科学水平，也在党的領导关怀下出版了对象不同的期刊，如《中国語文》、《語文学習》、《語文知識》等。关于学習、参考的教科書和工具書也兼施并举地进行編訂，都安排在适当的力量基础上。每一件具体措施，凡是有关的部門都在党和政府統一領导

---

① 参看黎錦熙《国語运动史綱》卷二。

② 《国語运动史綱》卷二，75頁。

下，集中討論，分工負責，象語文工作上起主要的經常联系作用的就有文字改革委員会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举一个相反的从前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例如从前“国語会”的工作旁人看来就是搞“国語”运动少数几个人的私事似的。学閥傅斯年学生时代也曾經提倡过“汉語改用拼音文字”，当他身踞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时候，对“注音字母”和“国語罗馬字”都一概反对，叫“国語”运动者做“白蓮教”！历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做一些有关“国語”运动的工作簡直成了“不可告人”的工作似的！現在的語言研究所，主要工作任务在調查方言、編写辞典、研究汉語詞法語法，整个为推广普通話、現代汉語規范化服务了。同志們的心情同被譏訕为“白蓮教”的人当然大不相同。总之，过去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形态，国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当时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虽然也有人想做一点有益的文化工作，但是沒有党的革命領导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多大的成就。

上面提了十年来从文改工作上所显現的語文政策总措施情况，再仔細回忆更覺得具体安排切合实际的中間有一条紅綫貫穿着。这条紅綫是馬列主义，是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是馬列主义的語文科学原則。开国以来，民族政策一反从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显現了民族大家庭的新面貌，語文工作方面再不是从前只有汉語文的研究——也沒有研究好，而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語文問題同时并举地进行着。党和政府經过工作机构的安排和充分准备之后，1955年下半年召开了語文方面三个全国性的会議：(1)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議，(2)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3)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全国文字改革会議的参加者包罗了語文工作者、文字改革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新聞出版工作者，簡直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吳玉章同志致开幕詞中說：“文字改革是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关联的大問題。只有一切專家、学者、文教工作者和热心文字改革的人士，紧密团結，积極工作，稳步前进，才能够順利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会議从各面的代表反映出群众对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的迫切要求以及欢迎汉字簡化的情况。最主要的結果是：明确了文改工作的三个方面，簡化汉字、推广普通話和根本改革汉字的准备工作。尤其重要的是肯定了推行普通話的意义，普通話是現代汉民族共同語。会后，人民日报發表社論《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实現汉語規范化而努力》，給人們做了重要的指导。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是为着推广普通話的深入討論、并进行科学研究而召开的，主要出席代表是全国高等学校語文工作者、文字改革工作者，由中国科学院負責組織的。作为学术会議，还邀請兄弟国家（苏、波、罗馬尼亚）的專家来参加了。規范問題完全是馬列主义的語言学观点，根本不是旧的“国語”标准的概念。大家明确了普通話的含义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为語法規范”。这样科学分析的內容，反回几十年看看“国語”运动是找不到的，也不可能有的。人民日报社論也历史地闡說了“普通話”發展的經过，正确概括了我国解放以来汉語發展的情况：①

> 口語方面，能說普通話的人日見其多，普通話在語音方面要求接近北京語音的願望也越来越强。
>
> 書面語已經基本上統一于“白話”，达到了原則上的“言文一致”。而且会写会讀的人越来越多，書面語在口語的基础上隨时在提高自己的精密丰富的程度，同时也就对口語的發展起着集中和提高的作用。

正如社論指出：“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为語言的健康發展进行了不少工作。近几年来我們的語言学家和語文教师，热列地参加了对現代汉語的研究和討論；国家机关和部队曾經普遍开展語法学習；广播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开始注意正音訓練；新聞界和出版界也加强了文字編輯工作。这些实际行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在不同方面体現了党和政府的語言政策。也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条件下，我們提出了汉語进一步規范化的任务。”这样的逐步深入提高的工作質量，就是我所說的一条紅綫在貫穿着。过去的“国語”运动始終沒有能成功是历史的必然。象語音的标准有所謂“‘京’‘国’之争”的故事，在主持决定“国音”的讀音統一会上原是杂凑了南北方音不同的人士随意分散地逐字投票决擇的，后来改用北京音为标准的时候，在規范問題上又茫然无所限制，一时大有趋向于滿口北京土話才够标准似的風气。不管怎样变，只是“国語”运动者圈子里热鬧而已。書面語方面，“文言”“白話”杂糅，語法沒有可供衡量的規范。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对語文的应用也極为混乱，1931年5月瞿秋白同志發表的《鬼門关以外的战争》和《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館》罗列了好些例子，并且提出了分析批判的意見。总之一句話，沒有科学的領导，而热心改革的人头脑也不是受过馬列主义訓練的，工作效果是不大的。他們也勤勤恳恳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对于語文改革的發展上是有一定的打基础和推进的作用。例如，讀音統一会制定注音字母，国語会編《国音常用字汇》，錢玄同黎錦熙等人拟定国語罗馬字拼音方式等等。所以，如果你不深入理解这些工作在当时何以不象解放后这样見效，或者不全面認識

---

① 1955年10月26日社論，《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議文件彙編》轉录（240頁起），又《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文件彙編》轉录（259頁起）。

解放后党和政府怎样全面科学地历史地吸收經驗稳步引导語文改革工作，你就会簡單地感覚十年来工作还是解放前的那些項目。項目固然不是完全相同，效果實質更大不相同了，这是我的体会。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从“国語”运动發展到現在，要努力达成汉語規范化的要求，我們还需要从精神实質上認識自己的責任。就从1919 起，“国語”运动者的道路是走錯了方向的！阶級的烙印在这一历史事实上是鮮明无比的。由于五四到大革命期間，中国革命的領导已經落在无产阶級肩上，相应地文化革命的主导也必然要靠共产主义思想。“国語”运动者事实上从1919 到1928，是在1913 所繼承的清王朝的地主紳士的爱国思想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願进行給劳动人民識字工具的“恩賜”，一貫地保持資产阶級新知識阶層的姿态，并沒有能跟上党所領导的文化革命統一战綫。相反地，到了1928 以后，由于跟同一阶級的政权臭味相投，甚至于有逐漸走向跟党所領导的文化革命工作对立方面的傾向，虽然他們自己是認为“擺脫”政治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文化革命統一战綫上第一时期的一些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到了第二时期(1921—1927)，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① 解放以后，“国語”运动者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团結教育，在这一工作上尽了一些力，这是值得感奋的。将如何徹底改造思想，繼續努力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設而奋斗，是旧知識分子的共同問題。对一个“国語”运动者来說，就更有一層要警誡，不可認为解放后文改工作还完全是解放前的那些項目，不可被某些表面事象混乱自己的头脑，以为原来的工作都是“进步”的，自己过去总得是“对”的！

今年五四整四十年。我在五四这一年进大学，接触到文化革命运动，后来走上“国語”运动的道路。我从事这一社会工作也有了三十年。为了紀念祖国語文新生的开始，为了闡明党和政府領导我們工作的英明正确，所以才把这些膚淺的体会写下来。

---

① 《毛澤东选集》卷二，672 頁。

合肥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积極开展各項工作

合肥师范学院是1958 年暑期才成立的。这个学院的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自1958 年9 月正式建立后，就在党总支的直接領导下积極开展各項工作。截至目前为止，这个教研組除了完成上学期的教学任务和繼續担任本学期的語言学課程以外，又先后做了以下几項工作：

1）采用在党的領导下师生三結合的原則，反复討論了教学計划和教学大綱，并集体編成《現代汉語講稿》(初稿)，約三十几万字。

2）在安徽省方言普查指导組的領导下，完成了41 个点的方言調查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門編印了《集刊》第一册，第二册不久也可輯印。

3）1959 年3 月份完成合肥、屯溪和歙县三地的学習普通話手册(初稿)。其中的《合肥人学習普通話手册》，由教研組同安徽省教育厅和合肥市教育局合作，在市党委的領导下，專門成立了手册編写小組，并吸收中小学和工农业余学校的教师代表参加，共同編写。

4）最近發出倡議書，并提出具体計划，提議在全院的师生員工中开展一个学習和复習汉語拼音方案的突击运动(过去沒有学过的，这一次必須学習；已經学过的，也必須复習)。

5）合肥师范專科学校以及省委会等机构的夜大学，都有現代汉語課，也由教研組派員担任。

除了以上几項之外，这个教研組的九个成員，每人又都拟定了科学研究專題(有的还多到两三个)，預定在本年九月底以前写成論文，以便国庆节向党献礼。(**依　沐**)

五四以来汉語書面語言的变迁和發展*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組

一　五四运动和汉語書面語言

五四运动不仅是政治上的革命，而且是文化上的革命。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級領导的联合小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① 在文化上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級所維护的旧文化的斗爭；而文化革命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提倡以反帝反封建为內容的新文学和白話文，反对封建古裝的旧文学和文言文。② 所以五四运动对于汉語書面語言的变迁，也發生了巨大的作用。

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一方面白話文体逐漸代替了文言文体；另一方面白話文本身也在日益發展、日益丰富着。五四以来汉語書面語言的变迁过程就是白話文同文言文斗爭进而全部地代替了文言文的过程，同时也是白話文的健康發展的过程。

不同的阶級不同的态度　虽然“語言不是上層建筑”，“語言沒有阶級性”，但是阶級“对于語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四十年来在白話文和文言文的斗爭过程中充分証明了斯大林这些話所反映的眞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革命阶級和进步分子同反动的阶級对于汉語書面語言都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的。革命阶級总是关怀白話文的健康發展，要求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而反动的阶級总是維护文言文，反对白話文。同时，贊成或者反对白話文的主張总是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相关联着的。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禮教的，反对白話文的林紓就站在維护旧禮教的立場上来反对白話文，③ 而提倡白話文的人則是站在反封建思想的立場上来反对文言文。錢玄同就說过：“旧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梦的話，靑年子弟，讀了这种旧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将为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④ 大革命失敗以后，反动派千方百計压制革命。反动軍閥何鍵在电請反动政府重新編訂教科書的电文里就說：

> 近查各校教科書本，往往含有赤化意味，詞旨悖戾。…鍵謬膺使命，蠡办清乡，亲执刀圭，洞見症結，职責所在，未敢默然。拟請中央政府聘任中外碩彥組織委員会，将各項教科書重新編訂。凡小学四年級以上課本，全用文言。…邪說既熄，詭行自祛，文化未亡，国脉可續。…

何鍵不愧是一个反面教員，他这一段話突出地表現了反动阶級拥文言反白話的阶級实質。白話文容易傳播革命思想，工农大众和靑年人讀了容易覺悟起来，这对于反动統治者是不利的。所以他要求廢除白話課本，重新編定。四年級以下的小学生是不怕他們造反的，讀讀白話还可以；讓四年級以上的学生都去吟誦“詩云子曰”，天下就容易“太平”了。这就是反动統治者的用心！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議批判了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明确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爭。于是，革命深入了，接着大众文艺运动展开了，要求書面語言口語化，使文艺更好地反映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这些事例都可以說明，四十年来汉語書面語言的白話和文言的斗爭是有其政治內容的。

四十年的变迁　作为五四运动前导的白話文运动首先在文艺陣地上取得了进展。一般报紙的新聞、通訊、社論虽然仍是文言的，但文艺副刊一般却采用了白話。政治性或綜合性的刊物还多用文言，但文艺杂志一般都采用了白話。白話文运动在文艺陣地上可以說在五四时期已获得初步勝利，但是在应用文方面，却还是文言的陣地。而且这时使用白話文的还只是一些进步的知識分子，白話文还不能成为劳动人民广泛应用的書面交际工具。在学校教育方面，从 1920 年起到 1928 年，⑤白話文虽然在教科書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但反动統治者却并未認眞实行。五四运动时期以后，經过反复斗爭，白話文才粉碎了一切形形色色的文言复古

---

* 为了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們接受吕叔湘先生的建議，写了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吕先生的支持和帮助，謹此致謝。因为写作时間倉卒，疏漏在所难免，还請讀者指正。

① 参見《毛澤东选集》，671 頁。

② 《毛澤东选集》，673 頁。

③ 林紓致蔡元培書說主張白話的人：“必复孔孟，剷倫常为快。”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171 頁。

④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9 頁。

⑤ 黎錦熙：《国語运动史綱》，107－122 頁。

运动的反扑，逐渐地攻占了文言文的陣地。文言文的陣地是隨着反动政权势力的消長而消長的。白話文的应用范圍是隨着革命政权的壮大而逐漸扩大的。一直到解放战爭胜利了以后，白話文才在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胜利。

党和毛主席对于白話文的發展一向非常关怀。在毛主席的言論和党的語文政策的指示下，白話文日益丰富和完善，詞汇愈加丰富了，語法更加严密了，書面形式逐漸定型了。白話文已經成为全民的最好的書面的交际工具了。

二　从五四到北伐

三种类型的知識分子　"'五四运动'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战綫的革命运动"。①李大釗、魯迅和胡适是这三种类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李大釗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夕，便接受了并且傳播过共产主义思想，②魯迅先生在当时是有革命思想的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胡适則是站在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立場参与了文学革命运动，五四以后便很快地背叛了革命。③ 1920 年 12 月，反动政府下令郵局停寄《新青年》。这个問題引起《新青年》內部的不同意見：胡适主張《新青年》要改变內容，發表"不談政治"的宣言，向統治阶級投降；假如不改变內容的話，他自己就去另办一个杂志。李大釗反对分裂，反对停办，堅持共产主义者的立場，斗爭到底。魯迅主張不必發表"不談政治"的宣言，絕对不妥协。④三种不同的意見，反映了三种不同的阶級立場。

五四白話文运动虽然以胡适的《文学改良芻議》打了第一槍，⑤ 以后他又恬不知耻地把文学革命运动的光荣业績冒称为自己的貢献，⑥會經迷惑了許多人；其实他主張的"八事"倒有"七事"是窃自晚清白話文运动者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說法，这一点已經有人指出了。⑦而且就他的态度說，是畏縮的。就其思想說是形式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八事"中有七事都講的是形式，只有"一事"談到了內容，而这一点也只是說要"言之有物"，至于"物"是什么呢？只解釋成"思想感情"，根本沒触及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这样，他就把革命文学运动篡改为白話文学运动了。当时参与白話文运动的一些知識分子，許多人在主張上都比他堅决徹底得多。

陈独秀在当时是以急进民主派的姿态出現的，堂堂正正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⑧ 他的主張有破有立，虽然沒有明确地認識到文学的社会基础和阶級基础，但是能把貴族文学和国民文学对立，古典文学和写实文学对立，山林的文学和社会文学对立，这已經多少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啓發了。他在《答胡适書》里也表現了比胡适堅定的态度：

> 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話为文学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为絕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⑨

錢玄同反对封建文学的态度也比較徹底，直斥为"桐城謬种，选学妖孽"；⑩对于胡适的"不用典"而实際是主張用典的主張；也提出了反对。⑪

在五四运动中，魯迅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認識到文学必須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他在《吶喊，自序》中說明他的吶喊是"听将令"的，后来又解釋說将令就是"那时革命前驅者的命令。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是《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白話小說，这里有着鮮明的反封建的思想，給文学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⑫而在此以后，魯迅先生对于打倒文言提倡白話，也是堅持最久的，他始終如一地捍衛着新文学和白話文，并且堅持革命斗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里給了魯迅崇高的評价，⑬而魯迅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文白論战　白話文运动發难以后，刀鋒首先指向了封建的旧文学。为了树立对立面，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写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集中地代表了当时各种封建的文学观点，主要是反对白話文維护文言文的观点。然后再發表刘半农的《复王敬軒書》，淋漓尽致地把它徹底駁倒。封建士大夫林紓、严复，这些"老新党"，更是沒有什么道理好講，也只好写信責难，或者是發發牢騷，或者寄希望于安福系軍閥徐树錚。⑭等

---

① 《毛澤东选集》，671 頁

② 李大釗同志在 1916 年發表了《青春》，十月革命以后又發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

③ 1919 年 6 月，《每周評論》的編者陈独秀被捕，胡适窃取了主編地位之后，便發表了他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的向馬克思主义公开进攻的臭名昭著的文章。

④ 《北洋軍閥对进步刊物的摧殘》，見《中国現代出版史料》甲編，48－49 頁。

⑤ 胡适《寄陈独秀》，写于 1916 年 10 月，提出"八事"，未加解釋。《文学改良芻議》發表于 1917 年 1 月，对于"八事"做了說明。

⑥ 《胡适論学近著》第一集卷五，641 頁。又《逼上梁山》，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

⑦ 譚彼岸：《晚清白話文运动》，30－44 頁。

⑧ 参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44 頁。

⑨ 同上 56 頁。

⑩ 同上，78 頁。

⑪ 同上，48 頁。

⑫ 丁易：《中国現代文学史略》，33 頁。

⑬ 《毛澤东选集》，660 頁。

⑭ 林紓的小說《荆生》，即以荆生比況徐树錚。

到五四运动爆發起来，安福系自顧不暇，林、严等人只好消声匿迹了。

1921到1926这几年，又有买办文人新士大夫办的«学衡»和投靠軍閥的反动官紳的«甲寅»① 的逆流，他們并也提不出什么更新的道理。胡适这时已經背叛了革命投靠到大資产阶級怀抱中去了，他只是虛与委蛇地应付一下，实际上他已經与这些人沆瀣一气了。魯迅先生后来写道：

>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話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話要作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类早已二次轉舵，又反过来嘲罵"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②

对于«学衡»和«甲寅»鼓吹的讀經、复古运动，鲁迅先生都給以致命的打击。如«估学衡»、«答K.S君»、«十四年的讀經»等杂文，都是犀利的匕首投槍，直接打中了敌人的要害，使他們只好哑口无言了。

白話文运动的初步成就 白話文运动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新青年杂志»在1916年时，几乎百分之百是文言文，到1918年，白話文与文言文差不多平分春色，到了1919年白話文开始占了絕对优势。在这以后，各大报的副刊也差不多以白話文为主了，如当时号称四大副刊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民日报副刊«覚悟»，③虽然报紙的新聞、电訊、社論和广告仍然沿用着文言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力量很大，在語文教育上提出了改国文为国語的要求。当时教育部在1920年1月訓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級国文改为語体文。到了1921年3月教育部又訓令各省：凡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鐘点，加授"国語"。1923年6月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課程标准起草委員会，将所拟的"中小学各科課程綱要"刊布，关于"国語科"的課程目的和內容作了許多明确的規定。这个綱要虽沒有經过教育部公布，但教育界試行到1927年。④ 从此白話文的教学在中小学取得了法定地位。尽管反动的統治政权从来并沒有認真地推行过白話文的教学，可是这也还是白話文同文言文斗爭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这一个时期里，随着新文学运动的理論建設，对于白話文的書面形式的規范也进行了探討。

由于白話文的推行，旧的"句讀"需要改良，已有人开始試用新式标点，如1906年南潯方列生著的«蒙师箴言»，在一个句子后边運用了"！！！？"四个标点符号。⑤但是系統的主張和全面的推行，那还得說是五四时期«新青年»的貢献。«新青年»不只發表了討論句讀符号的文章，⑥而且自己首先逐步推行了。这是1918年的事情。又过了两年，1920年2月教育部才以訓令第五十三号頒行了新式标点符号。当时訓令說得很含糊："酌量分配轉發所屬学校，俾备采用"。⑦可是由于实际的需要，标点符号逐漸流傳开了。

"他、她"書面形式的分化，也是在这时开始的（詳后文第六节）。

改直行为横行的問題也是这时發起討論的。（1904年出版的严复的«英文汉詁»是中国汉文橫排的第一部書，不过这書的所以橫排，是由于同英文混杂的关系，并不是有意識地主張把汉文改为橫行。最早提出橫行的是錢玄同，⑧ 以后又發表了不少的討論文字。«新青年»杂志还想以身做則，从第六卷起改为横行，但是因为印刷方面条件的限制，沒能实現。⑨

毛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論»里对于五四以后到1921年以及1921年到1927年这两个阶段的革命运动的成就，作了科学的估計：

>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徹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沒有过这样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偉大的功劳。…⑩
>
>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爭为标志，繼續了并發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級的統一战綫，吸引了农民阶級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級的統一战綫，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紙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張，共同反对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內容的新文学和白話文。…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⑪

这就是这八年里的革命运动的总結。書面語言的

---

① 教育部長章士釗一方面办«甲寅»杂志鼓吹讀經，一方面又操縱教育部部务会議，議决規定小学讀經。

② «魯迅全集»卷一，363頁。

③ «五四时期期刊介紹»，183頁。

④ 这段历史可看黎錦熙«国語运动史綱»卷二，109—120頁。

⑤ «晚清白話文运动»，21頁。

⑥ 四卷一期，«句讀符号»；五卷三期，«論句讀符号»。

⑦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240頁

⑧ «論应用文字亟宜改良»第十三条，見«新青年»三卷五期。

⑨ «新青年»六卷一期，78頁。

⑩ «毛澤东选集»，670—671頁。

⑪ «毛澤东选集»，672—673頁。

斗爭是由这个革命运动所規定了的。

三　两个陣营兩条路綫

1927年資产阶級背叛了革命以后，中国就出現了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陣营的武装对持局面，革命武装部队开辟了广大的紅色区域。在白区里又有广大的进步群众在党的領导下堅持着斗爭，左联就是在白区奋战的一支文艺队伍。到了抗日战爭时期，共产党領导的抗日統一战綫組成了，但是两个陣营两条路綫的对峙局面本質上仍然沒有改变。这种局面直到解放战爭在全国范圍內获得胜利才告結束。白話文在两个陣营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遭遇。

苏区——左联——解放区　白話文在苏区和以后的解放区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健康發展。古田会議时，毛主席就曾經根据教育士兵、發动群众、爭取群众的需要，指示了很多当时条件所能实現的文艺工作方法…从那时起，文艺工作就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組成部分。①　毛主席的文学与工农兵結合的思想，在会議决議中反映出来了。从此，苏区就出現了嶄新的人民文艺。尽管这种文艺在当时不能不是萌芽状态的，但是这却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是与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談会講話里所指示的工农兵方向相一致的。为工农兵的文艺又是战士創作的文艺，这就規定了語言的通俗平易而又生动的特色，这也就是苏区和以后解放区的書面語言的風格的特色。从下面轉录的战士創作的詩歌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手榴彈②

別看我是生鉄蛋，
我的用处不一般：
不喝水来不吃飯，
冲鋒陷陣能当先。
大家好好把我練，
投得准，打得远，
轟隆一声冒黑烟，
能頂几架輕机关。

苏区的报刊、教科書一开始就采用了白話。連公文、通告、法規也尽量地作到通俗化，例如192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發出的通告，全文都是白話的。③

中央苏区紅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圍攻以后，在1932年3月26日出版的中华苏維埃中央机关报《紅色中华》④上有一篇报导，就完全用的是生动的白話文写成的，內中引用了国民党反动派头子們的"手諭"、函件之类，指出他們虽然被我們打得头破血流，却还在那里打着文言調子掉文呢。相形之下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下面是原文最后一段：

∴敌人的丧鐘已在狂响着

同时，在我們这些偉大胜利的面前，敌人更加恐慌动了。催促他們死亡的丧鐘已在狂乱地撞响着。官長在敗残部时竟公开的嚷着："我們九十师都被繳槍，眞不得了白軍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复灭后，蔣介石閒訊給陳誠的諭其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慘悽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隐痛！…"陳誠則于手諭之后写道："…誠虽不敏，独生羞…！"罗卓英則更在其給白軍第十一师，蕭乾函中写道"…昨今两日撫視負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伤部下之心，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人…"同志們，我們的胜利給了敌人多么严重的打击呵！

我們的胜利，就是敌人的死亡，現在敌人还沒有完全灭，还要竭其最后力量，拚死向革命进攻。我們要加倍力，繼續胜利的进攻，乘胜消灭快要死亡的敌人，取得最后胜利！

左联是一支在白区堅持革命斗爭的文艺部队，然在地区上与苏区隔离开了，但是它的斗爭是与苏革命运动的方向一致的。进步作家团結在左联的圍，以魯迅为旗手，与反动統治进行了堅决的斗爭，合着革命运动完成了革命任务，魯迅这时已經从"进論进到阶級論，从紳士阶級的逆子貳臣进到无产阶和劳动群众的眞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⑤在左联立时期，他独自担当了領导左联的任务。⑥瞿秋白同后来和魯迅一起負起了領导左联的工作。魯迅先生色地打击了当时各种反动的文艺主張，也抨击了以的形形色色的提倡文言、复古、讀經等逆流，使这些动逆流的反动本質暴露出来，使青年不致于上他們当。1930年开始了大众文艺論爭以后，又展开了大語文論战，在这两次論战中，左联起了巨大的作用。

左联一开始成立，就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級术"⑦的方向。到1931年11月，执行委員会又通过"中国无产阶級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議，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綫…才能完成我們当前的反反国民党的苏維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創造出眞正的国无产阶級革命文学"。⑧大众化的路綫就要求大众

---

①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紀念文集》1950年3月，105—6頁。

② 《文代会紀念文集》，107頁。

③ 原件存革命历史博物館筹备处。

④ 原件存革命历史博物館筹备处。

⑤ 《瞿秋白文集》，997頁

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就和缺点》，見丁易《中国代文学史略》，76頁。

⑦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1日出版引自中国人民大学編《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資料》卷一，頁。

⑧ 《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壇的回顧》，見《中国现代出版料》乙編，92頁。

的語言，所以决議里作了明确的規定：

第三、在形式方面，作品的文字組織，必須簡明易解，必須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們接近的語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許使用方言。因此，作家必須竭力排除知識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語的表現法。当然，我們并不以学得这个簡單的表現为止境，我們更負有創造新的言語表現法的使命，以丰富提高工人农民言語的表現能力，正和在思想意識方面一样。①

瞿秋白同志对于汉語書面語言的健康發展是十分关怀的，他不但批判了胡适等人混淆旧白話和現代白話界綫的錯誤，②批判了全盘西化（实际就是洋八股）的偏向，而且正确地解决了"欧化"的問題。他認为詞法和句法，可以吸收外国語言的表現方法，但是一定要合于汉語自己的規律。③他生动地写道：

譬如說何以不写："她是一个寡妇，有两个女兒一个兒子——她…"而一定要写："她是有两个女兒一个兒子的寡妇…"或者写："有着两个女兒一个兒子的做着寡妇的她…"請問这是优美些么？不見得。如果文艺应当是給平民群众听的艺术作品，那么，这种欧化句子讀出来，簡直是極惡劣的中国話，一些兒优美意味也沒有。难怪"說書的"，"唱滩黄的"比"新文学家"高明！④

他在《論大众文艺》的卓越的論文里，首先討論了"用什么話写"的問題，他有許多卓越的見解：

总之，不但普洛大众文艺，就是"非大众的普洛文艺"，都不能够用"周朝話"写，都要反对用"騾子話"来写，而且也并非要用"明朝話"来写。而要用現代人的普通話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現代人的土話来写（方言文学）。⑤

瞿秋白同志关于語言的理論，固然在个别論点上有偏向，⑥但是他有許多新的認識，在当时的确是先进的：（1）他对汉語吸收外来成分的見解是精当的，符合毛主席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的学習語言的精神。⑦（2）他对于汉語的規范化有着比較明确的要求，他希望汉語健康地發展下去。（3）"大众語"的問題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这就給两年以后展开的大众語論战准备了理論基础。

1934年展开的大众語文論战，一方面是由于要反击当时的汪懋祖之流的提倡讀經和小学教文言文的复古运动，另外也是由于革命深入的需要，要求白話文更接近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語，使文艺的形式能够更接近人民。胡适对于这个論战采取了潑冷水的手段，他写了一篇《大众語在哪兒》，譏諷提倡大众語的人"自己就不会說大众的話，不会作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众化"。并且猖狂地叫嚷着"拿出貨色来看"。⑧魯迅先生馬上給以还击，指出"反对者是沒有發命令的权利的"。魯迅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虽是一个殘廢人，倘在主張健康运动，他絕对沒有錯；如果提倡纏足，則即使是天足的壮健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⑨魯迅先生就这样有力地揭穿了胡适的毒計。

由提倡白話文而到提倡大众語，这标志着汉語書面語言發展的两个阶段。五四初期白話文还只是知識分子的交际工具，这时，是要它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了。

抗日战爭爆發以后，解放区扩大了，文艺队伍也扩大起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發表了。这个講話不只总結了苏区以及左联的文艺理論和实际斗爭的經驗，批判了这种那种的非无产阶級文艺思想，解决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理論問題，而且明白地規定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講話还要求作家改造思想感情，学習群众語言。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踐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赵树理同志等人当时就是这些文艺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成功地运用了人民群众的語言。周揚同志在文代会的报告里指出：

解放区文艺的內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为內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适应地有許多新的創造。这首先表現在語言方面。"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与討論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等的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实际的徹底的解决。直到"文艺座談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結合，努力学習工农群众的語言…語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赵树理的特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語言，他的語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經过加工、洗煉的，那么平易自然，沒有一点矯揉造作的痕迹。⑩

要求学習人民群众的語言，在运用时还要加以提煉，这就具有了規范化的傾向。

党对語言的純潔、健康的关怀，更具体地表現在解放区的語文課本上。1945年陝甘宁边区教育厅新編一套《中等国文》，这套課本的特色是：（1）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关于本書的七点說明"里明确提出："本書确認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語語文的基本

---

① 《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壇的回顧》，見《中国現代出版史料》乙編，93頁。

② 《瞿秋白文集》卷三，636頁。

③ 同上，648－9頁。

④ 同上，649頁。

⑤ 同上，860－1頁。

⑥ 《瞿秋白文集序》，4頁。

⑦ 《毛澤东选集》，858－9頁。

⑧ 《胡适論学近著》第一集卷四，551頁、543頁。

⑨ 《魯迅全集》卷五，447頁。

⑩ 《文代会紀念文集》，76頁。

規律主要用途的掌握。”(2)在編排上也与教学目的相适应,全書共六册,每册三十課,每五課为一單元,前四課是选文,末一課是語文規律的說明。(3)語文規律包括了“說与写”“应用文”“詞和句”“修辞”等內容。(4)“选文內容絕大多数是新民主主义的”,①这就显現了理論結合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圖。(5)“偶然也选一两篇比較旧的东西”②,但是可以看出,这是本着古为今用的态度的。(6)課文絕大多数是白話文的。

国民党的反动措施 国民党反动統治者在文艺斗爭上是无能为力的。他們对付左联的办法是封鎖,是檢查,最后又使出了屠杀进步作家的殘酷手段。对于白話文,不但沒有認眞地提倡,反而暗中慫恿文言文的复辟,在国統区里,文言文一直仍有广大的应用場所。成仿吾同志在1934年曾經这样指出过:

> 离开文学本身,在文学可以影响的范圍內,也有几宗現象可以注意:
>
> 甲、各大書店現在还出文言教科書,
>
> 乙、許多国語教科書尙多不通的語句,
>
> 丙、新式标点(指标点古書——本文作者注)还在流行,依旧在乱点。③

事实也正是这样。虽然在1933年頒行的“初級中学国文課程标准”里規定了語体文与文言文的比重为“7:3、6:4、5:5”;高中課程标准規定为“語体文言分授”。但事实并未認眞貫徹。这情形一直持續到抗日战爭胜利。国民党系統的正中書局出版的国文教本更是根本不遵守这个比重的。1935—36这两年出版的高中国文(叶楚傖主編,汪祖懋、叶溯中校閱),一至六册全部都是文言文。1948年出版的《初中适用国文精选》(汪懋祖复选,汪定实、許梦因选注),五六两册选文都是四十篇,白話文只各选了十篇,只占四分之一。

到了抗日战爭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只是暗中支持中学教文言文,而且明目張胆地規定要写文言文。1942年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国定課本《初中国文》的“編輯要旨”里就明白提出:“本書采精讀教材,其教学目的在于熟誦,务期因此充分达到訓練学生获得运用語体文或文言文叙事、說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为了达到进一步加强反动統治,国民党教育部这时还頒布了統一教本的命令。④

国民党反动政府沒有認眞推行白話文教学,从下边两件事更可以得到証明。1)《国文杂志》第一卷二期上發表了一个初中三年級学生的来信,說:“我們所讀的国文,不是一篇傳,就是一篇墓誌銘,…作文得作文言…”。2)解放以后,中学采用了新华書店的国文課本,里面白話文选得多,文言文选得少,北京的語文教师許多人都感到白話文沒法教,当时曾經作为一个專題来研究。

白話文在課本里不但比重少,不被重視,而且所
的白話文,規范性也極差。《国文月刊》上也發表这
評的文字。例如有人曾举出課本中許多类似下面这
的欧化病句:⑤

> 他睡在一間胡乱叫做書斋的房中一張藤躺椅上,
> 那样子看去,可以称为是午后二时光景的夏天的打吨

什么叫語言的純潔和健康,国民党反动統治者是根
不懂得的。

报紙的書面語言,更是文言的根据地。瞿秋白
志就曾經写文諷刺过。⑥ 后来他又写了《中国文学
古物陈列館》⑦一文,把当时报紙的書面語言分为:(
書房里的文腔,(2)小西崽的文腔,(3)戏台上的文
(4)洋翰林的文腔。各选了“代表作”以为例証。这
种文腔概括了当时国民党系統反动报紙的書面語
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一直維持到国民党反动政权
徹底打垮为止。

毛主席对于1927到1937的十年間的革命形势
了分析,指出“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
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圍剿’
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
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⑧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陣
两条道路也反映在对待書面語言的态度上。党所領
的抗日战爭爆發以后,阶級关系虽然有了新的改变,
这种两个陣营两条道路的斗爭仍然是存在着的。
面語言在国統区和在解放区依然是两种完全不同
情况。

四 全国解放帶来了白話文的徹底胜利

白話文眞正地成了唯一的書面語言,这是解放
爭胜利以后的事。

在报刊杂志上,現在已見不到文言文了。中学
材虽然还保留着小部分的文言文作品,但那是为了“
受祖国文学遺产”的目的,不再是要求中学生熟讀以
到模仿文言文的目的。語文教学承繼了解放区的优
傳統,注意語文規律,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論結合实际,

应該特別提出的,是党对于語言規范化的重視。
党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在运用語言,尤其是書面語言时

---

①② 見該書前附的“关于本書的七点說明”。

③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見《中国現代文学史
考資料》卷一,192頁。

④ 《中小学国定教科書編纂之經过及其現状》,見《中
华教育界》复刊第一卷,第一期,96頁。

⑤ 見《国文月刊》17期,20頁。

⑥ 《瞿秋白文集》卷三,593頁。

⑦ 《瞿秋白文集》卷三,693頁—696頁。

⑧ 《毛澤东选集》,673頁。

要注意到語言的規范，为汉語規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在1951年6月6日發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語言，为祖国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的社論，同日起又連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辞講話》。

汉語規范化的問題实質，早从五四起就接触到了。如"譯名統一問題"、"吸收方言"和"吸收文言成分"問題，"要講求文法"等，都提出討論过，但那时还不可能意識到"規范化"。全国解放以后，大家学習了苏联的經驗，这才把汉語規范化問題明确地提出來。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更把这一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

在这里，我們应該特別指出，学習毛主席关于运用語言的指示的重要意見。毛主席不只在自己的作品里，出色地运用了語言，給我們提供了运用語言的范例，而且他不只一次批判了不正确的文風，要求我們努力学習語言，此外，还指示了学習語言的道路。

祖国的飞跃發展，也要求我們的書面語言迅速發展与它相适应，而白話文的健康發展又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和領导。魯迅先生在討論大众文艺时曾經說过："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务。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帮助，…"①现在政治帮助这个条件已經具备，現代汉語書面語言的高度發展和日益丰富日益純潔健康，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五　五四以来汉語詞汇的發展

前文提到，五四运动不但在政治上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把文化革命也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四十年来，汉語詞汇所以得到空前的丰富發展，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同时也証明了斯大林所說的下面这段話：

> 語言的詞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經常变动中。
>
> 工业和农业的不断發展，商业和运輸业的不断發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来充实它的詞汇。語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汇，并改进自己的文法构造。②

四十年来汉語詞汇的惊人發展，鲜明地体現了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中国人民的社会斗爭与生产斗爭的过程；在四十年来汉語詞汇的發展中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所發揮的无比的雄厚力量。

五四以来汉語詞汇發展的总方向是：詞汇越来越丰富，詞义越来越精密，用詞越来越規范。以下分別来談一下。

詞汇的丰富　詞汇的丰富首先表現在外来詞的吸收方面。外来詞是指音譯詞与日語借詞。反映西洋文化与生活，尤其是反映工业革命与資产阶級革命的音譯詞，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就已經大量地出現，如"斯宾塞"、"盧梭"、"巴力門"、"托拉斯"、"烏托邦"等。音譯詞一开始就被納入汉語构詞規律当中，除了語音和一部分詞的意义有所改造以及外語的形态也被去掉之外，它們还可以：(一)按汉語規律簡称(限人名、国名等專称)，如"俄、普、奥"。(二)做为詞素按汉語构詞法构詞，如"欧洲"、"英人"、"北美合众国"、"东亚"。但是起初也有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如把"格罗士亞"簡作"格罗"（新民丛报7号），把"阿里士多德"称作"阿氏"（新民丛报7号）等。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逐漸消灭了这些不合理的現象，一方面又大量地吸收了或应用了新的音譯詞，如"德謨克拉西"、"賽因斯"、"苏維埃"、"普罗列塔利亞"、"布尔什維克"、"法西斯"、"斯大汗諾夫"、"盘尼西林"、"喀秋沙"、"習明納尔"等。这些音譯詞，一部分曾流行一时即为"意譯"詞所代替，一部分則比較稳定地进入汉語詞汇之中。

日語借詞也是自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就大量出現的，如"政治"、"法律"、"軍国主义"、"法則"、"电信"、"要素"等。这些詞，除了一小部分日本音譯的外来詞以外，都是日本用古汉語詞或汉字对欧美語詞的"意譯"詞。它們是用汉字构成的，用到汉語里以后，每个音节仍都有意义可寻。因此，五四以后，日語借詞一方面增多起来，一方面十分牢固地納入汉語詞汇体系之中，以致令人难以感覚出它們是外来詞，由于它們是用汉字构成的，也沒有必要認为它們是外来詞了。③

詞汇的丰富也表現在反映外来事物及本国新事物的新詞大量地产生上。例如：广播、电扇、工农政府、解放区、代耕、土地証、互助組、积肥、原子彈、氫彈、火箭、人造衛星、人民公社、敬老院、試驗田、多面手。

在一些有生命的文言詞語的保留和創造性的运用上，也表現了詞汇的丰富。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乘風破浪"、"人定胜天"这样的成語，已成为革命运动中鼓舞群众的口号。大跃进以来，甚至一些历史上的名詞如"罗成"、"穆桂英"、"黃忠"、"蛟龙"、"龙王"、"玉皇"等，也被运用于比喻而發揮了極大的表現力。

詞汇的丰富还表現在一些方言詞被吸收到普通話里。随着交通的日益頻繁，革命运动的广泛展开和革命文艺的創作，汉語普通話吸收了不少生动活潑的方言詞。

---

① 《魯迅全集》卷七，580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

③ 因此，下文有些地方把日語借詞当作汉語的新造詞。

在詞汇丰富的同时，汉語也迅速地發展了自己的构詞法。五四以来汉語构詞上有着显明的新的特征。

第一，汉語的句法构詞法的能产力迅速增强。例如：(1)原来构詞能力極弱的主謂結构空前活跃起来，产生了大批的新詞，象“自在”、“自为”、“自觉”、“自願”、“自發”、“主动”、“主导”、“国有”等。(2)三音节的偏正結构成为最能产的类型之一，造成的新詞象“發动机”、“播种机”、“收割机”、“增長量”、“开采量”、“傳声筒”、“可怜虫”等。(3)后附介詞詞素化的新类型得到發展，造成的新詞象“認識到”、“考虑到”、“关系到”、“敢于”、“便于”、“基于”等。此外，并列結构、状动結构、动补結构、动宾結构的能产力都大大加强。

第二，附加詞冠詞綴的新构詞方式的能产力越来越强。例如：(1)加詞綴“者”。象“記者”、“創造者”、“剝削者”、“殖民主义者”、“复仇主义者”等。(2)加詞綴“家”。象“作家”、“科学家”、“發明家”、“音乐家”、“預言家”等。(3)加詞綴“手”。象“舵手”、“射手”、“多面手”、“紅旗手”等。(4)加詞綴“員”。象“党員”、“团員”、“售貨員”、“服务員”、“司机員”等。(5)加詞綴“性”。象“历史性”、“規律性”、“决定性”、“正确性”、“不可避免性”等。(6)加詞綴“化”。象“毒化”、“計划化”、“公社化”、“地下气化”、“公有化”等。(7)加詞冠“非”。象“非人的”、“非教徒”、“非党員”、“非重点”、“非本質”等。(8)加詞冠“反”。象“反封建”、“反鉄托”、“反侵略”、“反浪費”、“反官僚主义”等。这些詞綴詞冠中，如“員”是戊戌时期从日語借来的，但新民丛报把“陆軍員”同“陆軍人員”互用，把“战时員”同“战时人員”互用，也显然还不是眞正的詞綴，它成为正式詞綴都是五四以后的事。“手”在汉語中虽然早就构成了“水手”等詞，“者”“家”“性”“化”“非”等虽然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有了詞綴詞冠的用法，但大量的应用也都是五四以后的事。因此，汉語的詞綴詞冠可以說是五四以后才定型而大大發展起来的。它們丰富了汉語的构詞法，給汉語的构詞带来了極大的机动性。

第三，一部分偏正結构的中心詞素，受外語詞綴的影响，也有了詞綴化的傾向。例如：(1)“主义”。象“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霸权主义”、“希特勒主义”、“修改边界主义”等。(2)“阶級”。象“工人阶級”、“資产阶級”、“統治阶級”、“被統治阶級”等。(3)“派”。象“右派”、“促进派”、“观潮派”、“反动派”、“知难而退派”等。(4)“品”。象“产品”、“廢品”、“印刷品”、“农业品”、“附属品”等。这些詞素象“主义”“阶級”“派”本是譯的外語詞綴，但是它們还能單独用为一个詞而意义不变，因此还不是眞正的詞綴。“品”本是个固有的詞素，但是还有一个和它同义的詞素“物”，原先构詞时用“物”用“品”本无一定，最近却有一律用“品”的傾向，如“产物”、“印刷物”、“农产物”等詞中的“物”都为“品”替了。①这种現象就說明了“品”正在趋于詞綴化。这种傾向的中心詞素还有很多。

第四，縮簡的形式大量运用起来。例如：“帝”、“支前”、“保秋”、“鎭反”、“土改”、“市人委”、“委”、“工运”、“联大”、“基建”、“三反”、“四害”、“五等。这些縮簡形式使詞語的运用达到極其簡練的步，只要意义明确的，就会逐渐凝定。此外，还有从古歌訣形式来的新的并立格的縮簡，例如“水、土、种、密、保、工、管”，“本着全国一盘棋和讓、投、精神”，“商业工作的主要环节是購、銷、調、存”，“了鍛、鉚、剪、冲、鉗、鑽等多种技术”。这种并立格簡，繼承了古歌訣簡明扼要容易記忆的优点，将在各种具体措施的口号中一天天多起来。

詞义的精密　随着构詞法的發展，汉語的多就日益多起来。本来汉語詞汇就是由單音向多音，其是双音發展着的，句法构詞能力的加强和詞綴加，又加快了这种發展的速度。

詞的双音化和多音化，本是为适应事物概念越复杂的情况而产生的。事物概念越复杂，詞义越精密，原有的單音詞就不足以滿足这种要求了。如把“美国”“境内”說成“美”“境”（新民丛报7号），中“世紀”說成中“世”(同上)，把“导火綫”說成“导(申报1919，6，2)，意义上就容易造成錯乱，双音化多音化就可以减少这种含混不清的現象。

但是汉語詞义的日益精密，并不仅依靠詞的形式的复杂，它主要表現在詞义本身的發展变化上。

詞义的發展总是向着扩大与縮小两方面②进的。詞义的扩大使一些相通的概念的表达統一起也造成詞义部分交叉的現象，因之同义詞就大量生，这就使差别極其微小的概念能用不同的詞表达来。五四以来在詞义扩大方面最显著的現象是(1)詞义的引申受着翻譯的影响迅速地进行着。例如“深刻”一詞原来指“印象很深”，而近来引申出“深入(如“深刻的認識”)“深厚”(如“深刻的友好关系”)“远”(如“深刻的意义”)等意义。“头等”一詞本义是“一等”，近来引申出“最”的意义，可以說“头等重要”了。(2)詞的比喻义大量被运用。例如：“劳动果实”、“苦水”、“大翻身”、“思想包袱”、“思想武器”、“侵略的

---

① 用詞素“物”和用詞素“品”的，有的同时被保留下来如“廢物”、“廢品”，“作物”、“作品”，則意义有时有了差别或本不同。

② 关于詞义的变化，还有詞义的轉移現象，因为已及到构造新詞的問題，故从略。

板”、“打倒野心狼”、“小麦衛星”、“工业抗旱”、“鋼鉄大丰收”、“政治挂帅”。

詞义的縮小会使詞义更具体更明确。譬如“司令”原来可做“賦稅”、“工程”、“邮政”、“印花”、“监獄”、“学校”、“慈善事业”等方面領导人的职称，后来就專做軍事首長的职称了。“領袖”一詞原来是大小單位的領导人的一般名称，一个小村一小群人的首領都可叫“領袖”，現在則專指国家或政党的領导人了。

詞义的精密还表現为詞的色彩的变化。随着事物的紛繁和人民文化的提高，許多精确的科学專用詞轉为通用詞。代替了一些含混的不精确的詞語。随着事物本身的發展和人們对事物認識的發展，許多詞的意义深化了，許多詞的感情色彩也因之轉变了。例如：“艺人”在旧社会是賤称，解放后則成为对曲艺工作者的尊称。“清高”在旧社会是褒义的，在新社会就成了貶义的。其他如“資本家”、“地主”、“功名”、“富貴”、“升官”、“發財”、“农民”、“工人”等都有这样的变化。大跃进以来許多成語也有了这种变化，如“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吹毛求疵”、“班門弄斧”、“标新立异”，从前只是貶义的，現在也可用为褒义的了；“知难而退”、“四平八稳”，則是由褒义轉为貶义的。这都使汉語的詞义越来越精密，从而丰富了汉語的詞汇。

用詞的規范 語言的規范“这是一种历史現象，这种現象是受着人民文化發展的一般状况和語言發展的内部規律所制約着的”。①汉語詞汇，四十年来就在人民文化的發展中按着語言發展的内部規律逐漸趋于規范。四十年来，一些优秀的学者和作家都在寻求着他們表达思想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有力地促进了这种規范。解放以后，党的語言規范化政策更有力地推动了詞汇的規范。有关汉語詞汇規范化的主要原則都已經体現在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的文件中，这里只談詞汇在人民文化的發展中依据汉語發展的内部規律逐步規范化的一些具体情况。

第一，一些結构不固定的詞逐漸凝定。拿并列結构的詞来說，原来許多詞素次序不固定的，現在多半已經凝定了。凝定的結果有二：(1)次序固定之后，另一种次序的被淘汰。例如：“人民”和“民人”、“声音”和“音声”、“战争”和“争战”、“意志”和“志意”、“权利”和“利权”、“职責”和“責职”、“見識”和“識見”、“介紹”和“紹介”、“审判”和“判审”、“印刷”和“刷印”、“增加”和“加增”、“野蛮”和“蛮野”、“共同”和“同共”、“反倒”和“倒反”，都是后者被淘汰。(2)分化为意义或色彩不同的两个詞。例如“和平”和“平和”原来都可做“战争”的反义詞，也可形容人的性情，現在“战争”的反义詞只用“和平”，而形容人的性情則多用“平和”了。“决議”和“議决”原来都用作动詞，为“会商决定”之意，現在則动詞只用“議决”，而“决議”轉为名詞，指“通过的議案”了。其他如“到达”和“达到”、“考查”和“查考”、“过渡”和“渡过”都分化为意义不同的詞。現在还有一些沒凝定的詞如“泉源”和“源泉”、“代替”和“替代”、“紧要”和“要紧”等，同五四前比較已是为数不多了。在規范化政策的促使下，它們将更快地趋于凝定。并列結构的詞如此，其他結构也是如此。

第二，关于譯借詞規范主要有两种情况：(1)音譯詞同新造詞或日語借詞并行的，前者多为后二者所代替。例如“德律風”为“电話”代替，“披亜諾”为“鋼琴”代替，“德謨克拉西”为“民主”代替，“巴力門”为“議会”代替，“康拜因”漸为“联合收割机”代替，“習明納尔”漸为“課堂討論”代替。也有并存下来而且将要并存下去的，則是因为它們的色彩有了不同的緣故。也有音譯詞代替了新造詞的，則是因为新造詞不符合原意的緣故。(2)不同的譯音或不同的写法逐漸趋于統一。例如：“巧克力”、“巧古力”、“巧格力”、“朱古力”、“朱古律”、“查古律”、“查古列”、“諸古力”②逐漸規范为“巧克力”。“黑格尔”、“黑智尔”規范为“黑格尔”，“西伯利亜”、“西比利亜”規范为“西伯利亜”，“匈牙利”、“匈加利”規范为“匈牙利”，“沙發”、“沙法”規范为“沙發”。也有两个不同譯音并存下来而且将并存下去的，如“馬达”和“摩托”，則是因为給它們賦予了不同的意义。

第三，新造詞(包括日語借詞)的規范主要有三种情况：(1)表达同一事物的許多新造詞逐漸規范为一个。例如：“計学”、“平准学”、“生計学”、“經济学”、“政治經济学”逐漸規范为“政治經济学”。“群”、“人群”、“社会”漸漸規范为“社会”。(2)因詞素不同而产生的絕对等义詞逐漸規范为一个。例如：“农民”和“农人”規范为“农民”，“編譯”、“輯譯”規范为“編譯”，“破坏”、“破毀”規范为“破坏”，“遭遇”、“遭逢”規范为“遭遇”。(3)生造詞不断地被取締。例如“論究”、“討究”(均“討論研究”义)“結組”(“組織”义)“明識”(“明确認識”义)都一出現就被取締。最近在文風的討論中，許多作品的生造詞語現象都受到指責，这些意义不明确的生造詞将难以进入汉語詞汇之內。

此外，文言詞的規范，实际上是書面語言中文白两种成分的斗爭过程。方言詞的規范，从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重視。大众語的討論虽然带来了一些方言文学作品，但等到毛主席文艺座談会講話發表以后，單純追求方言形式的傾向就得到了糾正。

---

① 加尔基納-賈多魯克：《現代俄語詞彙学》，中譯本，8頁。

② 高名凱、刘正埮：《現代汉語外来詞研究》，178頁。

六　五四以来汉語語法的發展

說到汉語書面形式的語法方面，从五四到現在，四十年来的变化也是巨大的。誠然，“語言的文法构造比語言的基本詞汇变化得更慢”，但是它还是在“逐漸發生变化，它逐漸改进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規則，用新的規則充实起来。”① 可是，这是就一般的情况說的；如果是处在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就会加快速度。五四以来，汉語語法在不到半个世紀的过程中就起了巨大的变化，正好可以說明这点。

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伴隨着无产阶級革命胜利的逐步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傳播的逐步扩大，已經發生了和正在發生着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汉語就不能不引起新的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書面語方面，这种变化就更显得突出、鮮明。——新的詞法产生了，新的句法产生了。汉語語法規律更加准确、精密、丰富起来了。从汉語語法發展史上看，这一时期的变化是值得我們給予足够的重視的。

在詞法方面，起了些什么变化呢？例如下列几点就应該注意：

他称代詞的“性”的分化——“性”这种語法范疇在汉語原本是不存在的。但为了把話写得更准确些，五四以来，这个他称代詞在書面語上也就逐漸具有了“性”的范疇。就是阳性：他，阴性：她，中性：它（或牠）。②例如：

> 她对于他已經是外人；而他对于她又何尝不是外人呢？（契訶夫：《好人》，瞿秋白譯）
>
> 有一天他送她回家，他便和她說爱她，願意和她結婚；一她身体一搖，仿彿他打了她一下，他也被她一吓。（高尔基：《时代的牺牲》，瞿秋白譯）

这就不难看出，書面上，这种他称代詞“性”的分化的必要性了。

介詞“的”的分化——“的”是汉語中的一个特别介詞。为了讓它能够更清楚准确地表示出詞語之間某种特定的关系来，从五四起，書面語就也給了它一个新的分化規范：“的”表示一般的定·名关系；“底”表示領屬性的定·名关系；“地”表示状·动（或形）的关系。③例如：

> 春天，太阳很燦烂地光耀着；因此，大家很欢乐，甚至于陈旧的石头房子上那些窗子底玻璃，都暖融融地含笑。（高尔基：《时代的牺牺》，瞿秋白譯）

如果不分化，在某些場合就容易引起誤解：

> 一到奴隶社会后期，…奴隶們竟亲手写起文学作品来，这样似乎可以称之为奴隶文学了。不过，这个名詞是很不通的，如果說“奴隶的文学”，不就等于說它是“主子底文学”么？如果說“奴隶底文学”，則一个有主子有奴隶等等阶級的社会里，那里会有代表奴隶利…文学出来呢？（書）

“的”和“底”分化的道理就在于此；“的”和“地”呢？也…此，但多关系于結构成分的确切化：

> 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沒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較…好一点，特别是紅軍的給养使之比較地充足一点，…迫切地需要的。（毛澤东：中国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

这“困难的比較地”的“地”如果不和“的”分化，仍照…老習慣，混着用，这“比較”究竟是定語还是状語就不…确定了。

以上两項所談的“他”“她”“它”（“牠”）在口語里…一样的，“的”“底”“地”在口語里也是一样的。它們…分化对書面語言来說，是一种丰富現象。其中“的”…“底”的分化似乎还不穩定，有些人还不这样用。“…和“牠”有再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构形詞尾的發展和变化——用“們”表数（多数）…范疇，用“着”“了”等表体的范疇，在近代語本来就已…产生了。但五四以前确实还是很不完善的，五四以…才有意識地讓它范疇化、規范化。可先看一个旧的…的例

> 桂英：方才这“二位”叔父是甚等人？蕭恩：兒問的…“他”？桂英：正是。蕭恩：“他”本是江湖“二豪俠”，…倪荣就是“他”；蟒袍玉带不願挂，“弟兄双双”走天…（京剧“打漁杀家”）

明明是多数，但也只用个“他”来表示，这在某种場合…会引起誤会的。这种脫略形式的現象，在五四以后…典范作品中一般地說来就看不到了。④不但如此，就…在不致引起誤会的場合也往往要粘个“們”尾表示…数，以便从形式上保障表达的准确性：

> 写党八股的人們，却总是想写給許多人看的。…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毛澤东：反对党八股）
>
> 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为所謂文艺理論…础的“人性論”，…是完全錯誤的。（毛澤东：在延安文…座談会上的講話）
>
> 人們能發現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的…的行动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来为社会謀福利，但…人們不能改变或廢除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的科学法則。（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中…本）

“們”尾而外，就是“着”、“了”等：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頁。

② 关于这个問題，請参看《汉語語法教材》第一編…名詞性別簡論”，33頁。

③ 詳細論述，請参看《汉語語法教材》第二編介詞章…

④ 参看同上書“称謂代詞單数的多数化”，75－76頁…

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在东方，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毛澤东：两个中国之命运）

若在旧白話，这些“着”尾当然是可以都不用的，現在用上就使汉語动詞的“体”的范疇逐漸确定下来；至于“着”“了”交錯着用，那就更可以看出这种詞尾發展的需要，这种概括而精确的表达法，在旧白話中簡直是沒有的：

解放区民主政府領导全体人民，有組織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毛澤东：論联合政府）

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偉大斗爭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毛澤东：共产党人發刊詞）

瞿秋白同志說：

現代的中国話显然已經是有字尾的言語。

…而字尾的丰富，可以使言語文字的表現力加强，現表的意思更加精确。①

这話是可以肯定的。

詞法上的变化是如此（虽然仅仅是举例性質），句法上的变化怎样呢？可以說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說，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这种变化，概括說来，下列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句法結构更完整化了——作为句子构造骨干成分的主語、謂語、賓語等，特别是主語不再随便省略了。这就从形式上保障了句子作为交际工具的准确性。下边引一段話为証：②

中国政府在7月19日，为英国侵略約旦和威胁伊拉克共和国的战争挑衅行为，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議。中国政府警告「英国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其侵略行为，并从約旦撤出其侵略軍队」。中国政府还表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爭挑衅行为，絕不会袖手旁观。」

在这之前，苏联政府于7月18日就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近东的事件發表声明，要求「美英政府立即从黎巴嫩和約旦撤出它們的侵略軍队」。苏联政府在声明中还表示，「苏联不能对在其国境邻近地区發生的侵略行动置若罔聞，它将不得不为苏联的安全和維护世界和平而采取必要行动」。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統納賽尔在18日發表的演說中也宣布，「阿拉伯人民将拿起武器来保衛伊拉克取得的胜利，保衛阿拉伯民族主义」。

这几天，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以及亞非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处的人民，都連日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抗議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伊拉克、黎巴嫩、約旦人民」。

显然，世界上眞正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已經开始行动起来了。这个行动是「为了『要制止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爭挑衅』」，「为了『保衛各国人民神聖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为了『保衛中东以及全世界的和平』」，

「美英帝国主义合伙侵略中东国家」，已使中东和全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美英帝国主义在先后派兵侵占了黎巴嫩和約旦之后，正繼續向这两个国家增兵。它們的侵略武装并正匆忙地向土耳其、塞浦路斯、亞丁以及东地中海的海面集結。美英的侵略目标正在指向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們妄想在黎巴嫩和約旦站稳脚跟之后，来进一步扑灭整个阿拉伯东方和亞非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动和狂妄野心，是对所有爱好和平和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挑衅。（人民日报社論：不能袖手旁观）

这么長的一段話（共十四句），竟沒有一句在句法构造上是脫略形式，讓讀者去“以意逆志”的，这就可見汉語句法构造形式的日趋形式化、完整化了。

句法构造更复杂化了——伴随着認識的日趋深化，思維的日趋复杂化，作为思維表达的物質外壳的語言，构造也就必然要日趋精密化、复杂化，这种現代化的精密的、复杂的思想，已經不是从前手工业生产时代所慣用的四个字一句的短句子所能够表达得了的。五四以来，長句子的增多，乃是时代的要求，实际生活的要求，这是必然的趋势。下边略举几例說明：

“一个以滚珠軸承化为中心的發明創造与推广使用相結合的所有的工具、改革运动的”高潮，正在各地形成。（人民日报社論：大搞工具改革）

“朱德毛澤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計划地建設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裝的路綫是經由乡赤衛队、区赤衛大队、乡赤衛总队、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澤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上是長在定語的例。

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軍閥的斗爭的。（共产党人發刊詞，同上）这是長在状語的例。

很明显的，正确地規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險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轉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紅軍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認紅軍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認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

（下轉181頁）

---

① 参看瞿秋白《罗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見《文集》第三卷，659—660頁。

② 为了說明这段引文的語法成分，这里用“加綫法”分别在各成分下面加綫表示，即字下加═的是主語，加—的是謂語，加～的是賓語或足語，加≐的是賓語的兼格；另外，凡句中作骨干成分的子句或短語，一律加「 」号，其中若遇原文本有的引号，便改为『 』号。

五四以来汉語詞汇的一些变化

伍　民

一

五四运动是一个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运动，同时又是一个文化革命运动。就政治上說，它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轉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轉捩点。五四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級已經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从 1921 年开始，在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展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給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新的局面。

就文化上說，五四运动是我国傳播无产阶級的革命学說和先进的文化思想的开始。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这一長时期內，可以說是中国傳播日本和欧美資产阶級文化学术思想的黃金时代；而到了五四时期，当时一些进步的知識分子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在中国傳播馬克思列宁主义，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思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广泛地向中国人民介紹了苏联的进步文化。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剛成功的时候，就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維克的胜利》，分析了世界形势，宣傳共产主义思想。以后瞿秋白等人都先后通过著述和翻譯，介紹了苏联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艺理論和文学作品。例如瞿秋白同志所著的《餓乡紀程》、《赤都心史》，就是中国最早介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品。他还翻譯了許多列宁和高尔基的文学理論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五四时期开始的这些变化，不但引起了其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發展的巨大变化，而且給五四以后汉語的發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五四以前，"文言"和"白話"在書面語言中处于并存的状态。尽管宋元以来出現了不少优秀的白話文学作品，而且以北方話为基础形成起来的"官話"，实际上已在口头上成了当时全民的交际工具，但是 文言文在五四以前，仍然作为文学語言的正式書面形式而存在着。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才使白話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書面上开始夺取文学語言的地位。

白話文虽有較長的历史，但是它成为民族語言的最高形式的文学語言，还是在五四时期才开始的。在五四时期，它还是处在成長过程的最初阶段，它还不十分完善的；随着五四以后的社会發展，它才逐渐丰和严密起来。可以这样說，从五四时期的"白話"發展到今天的普通話的过程，是汉語旧質要素不断消亡的新質要素不断积累的过程，是汉語不断丰富和發展的过程。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就五四以来汉語詞汇的發展变化情况，作一个簡要的叙述。

二

語言反映社会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社会向前發展，語言也跟着向前發展，特别是語言的詞汇，对于社会的变化最为敏感。斯大林同志說："工业和农业的不断發展，商业和运輸业的不断發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詞和新的語来充实它的詞汇。"①汉語詞汇的發展情况正是如此。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革命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發展，我們的語言里也就陆續出現了无数的新詞。

新詞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里不可能詳細地列举，下面只能就社会發展的主要方面举出一些例子来說明。

从五四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成立以后对国内外敌人的各种艰苦的斗爭。能够直接反映这种种斗爭的新詞是很多的。例如 1927 年在党領导下建立了紅軍，于是出現了"士兵会""边区""游击区""指导員""長征""指揮員""战斗員"等等新詞。抗日战爭开始以后，在面对民族的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又出現了許多新詞，如："八路軍""新四軍""决死队""民兵""三三制""促进会""沦陷区"，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領导下，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开展了大規模的建設，整个社会得到了空前的飞跃發展，反映在語言里就是出現了大量的新詞。例如我国从 1953 年开始，国家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統購統銷政策，就产生了"統購""統銷""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8 頁。

銷"等新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实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产生了"公方""私方""定息"等新詞；1957年提出整風后，就有"鳴放""大字报"等新詞出現。大跃进以来更是产生了不少新的詞語，如"下放""多面手""評比""綠肥"等都是。此外，如"大型""工分""规范化"等也都是解放后出現的新詞。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五四以后究竟产生了多少新詞，現在还沒有人作过統計。就这些新詞的构成方式来看，它們都是合成詞，①构詞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1) 项目　部門　环节　爭取　医疗　审查　安裝
　节約　鎭压
2) 中医　工地　油料　远景　教条　偏向　小型
　車間　高度　潜力　事件　文件
3) 青年团　主人翁　党委制　細菌战　原子彈
　群众性　特殊性　决定性　思想性　艺术性
　工业化　集体化　机械化　自动化　炊事員
　教养員　管理員　輔导員　售貨員

1) 是联合式，2) 是偏正式，3) 是混合式。这三种方式是現代汉語中新詞构成的主要方式。混合式中的"性""化""員"等的构詞能力特別强，有發展为造詞成分的可能。新詞的构成方式自然不限于上面三种。其他如"自滿""国营"是表述式，"动員""带头""鼓掌""建議"是支配式，"加强""提高""推动""肃清"是补充式。

还有一些新詞，原来是詞組，因为它很常用，經过紧縮而成略語，久而久之，这些略語就当作新詞来用了。如"抗战"是"抗日战爭"，"整風"是"整頓作風"，"文工团"是"文艺工作团"，現在我們已把它們作为一个詞来用，很少人再說它們的全称了。

新詞的产生只是詞汇發展的一个方面，五四以来詞汇的發展还表現在詞义的变化上。我們还常常用給旧詞增加新义的办法，来表現社会發展中出現的新事物，这样，原来的詞义就有了变化。詞义的变化，有三种情况：

1) 詞义的扩大。这些詞一方面保留了原来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意义，其中有一些是比喻性的。例如：

紅色、白色　原来都是指顏色，五四以后，我們則用"紅色"象征革命，如"紅色政权"；用"白色"象征反革命，如說"白色恐怖"。

衛星　原来指圍繞其他星球旋轉的行星，如"人造衛星"。大跃进以来，凡是在某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績，統称为"放衛星"。其他如"(丢)包袱""(扣)帽子""(会动)腦筋""(思想)健康"等，都是由原来的具体意义扩大为表示一种比較抽象的意义(有人称为比喻义)。这是詞义扩大的一种現象。

詞义扩大的另一种現象，是从詞的原来意义里引申出一种新的意义。例如：

节目　原本指文章的章节項目，現在則經常用来指称各种演出的項目，如"文娛节目"。

迷信　原来只把信仰鬼神称作迷信，現在凡是盲目地相信某人或某种事务都称为迷信。如"迷信專家""迷信書本"。

基本　原来是"根据"的意思，現在則是指主要的、絕大部分的意思。如"我們基本完成了任务"。

"节目""迷信""基本"的引申义，我們現在經常用，三者的原义反倒比較少用了。另外有些詞則不然，我們不但常用它的引申义，也常用它的原来意义。如：

單位　我們一方面用它指計算事物数量的标准，如"度量衡單位"；另一方面，我們也用它指各机关部門。如"生产單位""工作單位"。后者就是它的引申义。

元帅　我們原来只用它来指带兵的高級統帅，如"彭德怀元帅"；大跃进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設飞跃的發展中，为了讓群众容易了解哪些是建設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能够带动全面的东西，于是这个詞就有了新的引申义。如"鋼鉄元帅""粮食元帅"等。

战綫　我們原来只用它来指軍队作战的陣綫；五四以后同敌人的斗爭逐漸普遍到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于是我們还用它指各种斗爭的陣綫。如"文化战綫""思想战綫""經济战綫"，等等。

詞义扩大是現代汉語詞义变化中最常見的現象。这种例子非常多，如"业务""收获""坦白"等都是。

2) 詞义的縮小。近四十年来汉語詞义縮小的現象，应該說是比較少的。五四以后，少数詞义縮小的例子如：

地主　原来除指出租土地、剝削农民的人以外，也可以用来指"主人"(如"地主之誼")，解放以后，由于大家对"地主"这个詞的憎恶，就再沒有人用它来指"主人"了。

特务　原义是指担任特殊任务的人或旧日軍队中的伙食管理員，反动派为了鎭压人民，專門豢养了一批暗中搞破坏活动的坏蛋，又不敢把他們的工作公开，于是也称之为"特务"(这个意义的用法来自日本)。由于大家对这种人的憎恨，对一般担任特殊任务的人就不再称为"特务"，于是这个詞的詞义縮小了。

3) 詞义的轉移。有些詞从形式上看是个旧詞，但是它的意义却完全改变了，旧詞所代表的意义現在根本不用了。如：

---

① 音譯外来詞除外，見下。

检討 原义指的是对某一問題的檢查研討，現在指的是自我批評。

書記 原义是指抄写文書的人，現在則指党团組織的各級領导人。如"党委書記""支部書記"等。

近四十年汉語詞义的变化，主要是詞义的扩大，詞义的縮小和轉移比較少見。詞义的扩大，使得一个詞具有多种意义，就其增加的意义来說，是同增加一个新詞相同的。它与一般新詞不同的地方，是在形式上采用了旧有的形式，在意义上也同原来的意义有一定的联系。詞义的轉移更应該說是新詞，因为它仅仅利用了旧詞的形式，在意义上同旧詞并无关系。詞义的縮小，則是原来詞义的部分死亡。

五四以来，詞汇的变化还表現在詞性的变化上。古代汉語中，單音詞彙类的現象是很常見的，如"虛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見《老子》），都是形容詞彙动詞。五四以来，彙类的現象則往往表現在双音詞上。如"端正、丰富、密切、孤立、健全、粉碎"都是形容詞，可是現在可以作动詞用。如"端正学習态度""丰富科学知識""密切群众关系""孤立阶級敌人""健全革命組織""粉碎敌人圍剿"。

随着社会的發展，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一部分詞。总的說来，消失的旧詞远沒有产生的新詞那么多。五四以来，消失比較快的主要是那些不符合新社会要求的詞。

随着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原来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詞慢慢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只在历史叙述中才能碰到，如"租界""淪陷区""便衣队""童子軍""中央軍"等。

我国革命胜利后，有些不符合新社会要求的职业取消了，反映这方面的詞，也就跟着消失了。如"当鋪""妓院""交易所""中人""野鷄""僕人"等。

有些旧詞的消亡，跟社会性質的改变沒有那么直接的联系，它們往往由于一些别的原因，被另外的詞代替了。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被另外一个跟它意义相近的詞代替了。如"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战争結束后为"解放軍"所代替，"党团"改用"党組"；另外一种是两个詞的意义完全相同，只是詞素的次序不同，其中有一个逐渐被广大的群众采用，另一个則逐渐被人遺忘，到現在已經死亡了。如："紹介—→介紹""征特—→特征""利便—→便利""納交—→交納"争斗—→斗争""鑒戒—→戒鑒"。

三

五四以后，汉語詞汇的变化还突出地表現在大量吸收外来詞和方言詞。外来詞大量地进入汉語同翻譯工作的普遍展开有关；方言詞大量地进入書面語言則同白話文取得了文学語言書面形式的正式地位有关。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五四以后，苏联文化的广泛介紹和傳播，引起了对翻譯工作的重視。瞿秋白同志曾經写过《論翻譯》和《再論翻譯》等文章来說明翻譯工作者的任务和翻譯的重要性。他說："翻譯世界无产阶級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統地介紹給中国的讀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①他以为翻譯的任务"除了能够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国讀者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国的現代言語"（論翻譯）。②他又主張"絕对用白話做本位来翻譯一切东西"。③这些話明确地指出了翻譯工作在現代汉語文学語言形成上的重要作用。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說："要从外国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国語言，是要吸收外国語言中的好东西，于我們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的語汇不够用，現在我們的語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我們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鮮东西，不但吸收他們进步的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新鮮的用語。"④翻譯外国著作，可以說是吸收外国詞語的唯一途徑。通过翻譯作品，我們把許多于我們适用的外国詞語吸收到汉語里来。由此可見，五四以来对于先进文化思想的介紹和傳播，不但为中国社会革命的發展起了促进作用，并且为現代汉語的詞汇增加了一大笔財富，使現代汉語詞汇大大丰富起来。

五四以前，汉語的外来詞大都来自日語。鴉片战争以后，中国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些資产阶級的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影响，企圖走日本的維新道路，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这些留日学生就成了借用日本詞的主力軍。（編者按，甲午战争以前，通过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譯工作，还从欧美的資本主义国家吸收了不少新詞术語，不过使用未广。）当时对西欧資产阶級的政治、經济、文化著述，也往往通过日文譯本再譯成汉語，傳到中国。日語里許多名称用汉字作为書写符号的，汉語吸收起来比較方便，这也是当时的借詞大多数来自日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所遭到的破坏已逐渐恢复了，侵略的魔爪又伸到中国，重新加剧了对中国市場的角逐，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極力培植中国的买办資产阶級，勾結殘余封建势力向中

---

① 《瞿秋白文集》(二)(論翻譯)，917 頁。
② 《瞿秋白文集》(二)(論翻譯)，918 頁。
③ 《瞿秋白文集》(二)(再論翻譯)，927 頁。
④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58—859 頁。

国人民进攻，更从政治、經济和文化上向知識分子灌輸奴化思想，这一时期外來詞的主要来源就变成了英語。从1927年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由于政治、經济的原因，外来詞的吸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在国統区，主要是吸收許多英語的詞，如"香檳、拷貝、朴克、吉普、尼龙、派克、維他命、华尔滋、賽璐珞、模特兒、法西斯、盘尼西林"，等等(这些詞本来不見得完全是英語的詞，但当时是从英語轉譯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和买办阶級媚外、崇外的結果，在当时所謂"上层"社会中还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語言現象。这些人为了炫耀自己的英語知識，以示文明和高雅，就故意不用汉語原有的詞，而代之以英語。例如汉語原来就有"小姐、先生"这些詞，可是偏要說"密斯"、"密斯特"；此外如把"手杖"說成"斯狄克"，"再見"說成"姑德拜"等等都是。这种現象，当时在"上層"社会中虽成为一时的風气，但是，人民群众拒絕它，这种不健康的語言現象，自然也就随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滚出中国大陆而消失了。在共产党領导的根据地，情况就完全不同，为了介紹苏联的革命經驗，当时就已經直接或間接吸收了一些俄語的詞。如"白軍、白匪、白区、赤衛队"，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苏联的物質技术援助，由于中苏两国广泛的文化交流，俄語成为汉語吸收外来詞的主要来源。如"卡秋莎、布拉吉、文化宫、导彈、教研室、專业、專門化、劳动日、集体农庄、列兵、突击队、边防軍"等等都是。

五四前后，由于我国在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都很落后，需要进行全面的、徹底的变革，因此外来詞所反映的概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經济方面的用語，如"动产、破产、公債、交易、动員、法則、侵略、侵蝕、取締"，等等；有一般的日常生活用語，如"电池、广告、攝影、銀行、化粧、沙發、咖啡"，等等；也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專門用語，如"电子、原子、伏特、通貨、內在、外在"，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已逐漸由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强国。我們的党在运用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結合方面創造了丰富的宝貴的經驗，我国的政治和經济制度已成为先进的制度，擺在新中国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在科学技术上、經济实力上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近年来吸收的外来詞偏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一般生活用語和政治經济方面的詞就显得比较少，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国社会發展的变化。

現代汉語里的外来詞，有許多是从五四前后借来的。当时由于現代汉語文学語言尚未最后形成，缺乏統一和明确的規范，因此对外来詞的吸收，还沒有一个合理的統一的原則，在吸收外来詞的方式上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現象。同一个詞，有时用音譯如"德律風、賽恩斯、烟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等；有时用意譯如"电話、科学、灵感、民主"等。有些詞分成两半，一半音譯，一半意譯，如 mortor-car 譯成"摩托車"，ice-cream 譯成"冰其淋"；另外又有些詞則在音譯以后，再加上一个汉語的詞来表明它的意义，如 butter 譯成"'白脫'油"，ultimatum 譯成"'哀的美敦'書"，car 譯成"'卡'車"等。象这样譯法上的不一致，不能不造成語言上的紊乱和使用上的不便。此外，由于我国各地方音差別很大，一些音譯的詞，随着譯者的方音差异而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譯者在音譯时，也可以自由地选用同音不同形的汉字，比如，同是 chocolate，便有"巧克力、巧格力、巧古力、朱古力、朱古律、諸古力、查古律、查古列"等八种譯法；一个 violin 有"梵啞鈴、外奧林、伐烏林、繁华令、浮古琴"五种譯法，有的簡直会使人誤会它們根本是不同的詞。

解放以后，全国政治、經济和文化上的空前統一，以及党对汉語規范化、推广普通話的重視，这种紊乱現象已逐漸减少了。凡是汉語中有相应的表达形式时，就不再直接吸收外来詞；在吸收外来詞时，也以意譯的形式占多数，音兼意譯的和單純音譯的除地名、人名外已經很少了。如近年来吸收的"导彈、火箭、核武器、氫彈、冷战"等等都用意譯而不用音譯。一些过去音譯的詞也有不少为意譯所代替。如"維他命——維生素、盘尼西林——青黴素、卡秋莎——火箭炮、習明納尔——課堂討論、引擎——發动机"等等都是。

現代汉語詞汇丰富的另一来源，是吸收了不少方言詞。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虽以某种方言为基础，但它并不排斥从各种方言里(包括基础方言)吸收有用的成分。毛主席說："要向人民群众学習語言。人民的語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潑的，表現現实生活的。"①如果作为民族語言最高形式的文学語言不注意从人民群众活的口語里吸收新鮮的血液来充实自己，那它是不可能得到很大的發展的。

五四以前，文言文虽作为文学語言的書面形式而存在，但是它是脫离当时的口語的。当时的封建文人都認为方言俚語不配登大雅之堂，所以文言文是根本排斥方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話文不但在口头形式上而且也在書面形式上取得了文学語言的地位。白話文是以北方話作为基础的，这样一来，書面語和口語之間才有了血肉的联系，方言詞向書面語的詞汇領域滲透才成为可能。

从五四到抗战前夕，書面語虽然吸收了一些方言詞，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处于封建軍閥的割据状态，各地

---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58頁。

区之間缺乏統一的、强有力的政治和文化的維系力量，同时又因为人民群众在那时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們被排斥在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大門之外，因而这一时期人民大众的口語对于書面語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的。这一时期一方面有許多北方話口語的語詞进入書面語，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所以这一时期也吸收了一些吳語的語詞，如："垃圾、貨色、把戏、癟三、拆爛汚、掏腰包"等等都是。方言詞的吸收，虽和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有关，然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广东也曾是革命的策源地，但在書面語里，广东話却沒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大革命經历的时間不長，广东話語音結构的特殊性也可能妨碍了它进入書面語言。总起来看，这一时期虽然也吸收了一些方言詞，但是跟新詞的产生和外来詞的吸收比較起来，方言詞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少的。三十年代"大众語"問題的論爭，虽然在实質上是要求書面語向口語进一步接近，然而也仅仅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并沒有在語言方面产生什么深刻的影响。抗战期間，与方言拉丁化差不多同时，曾經提倡过"方言文学"，这主要停留在文学形式的討論上，眞正实践的人并不多，給文学語言带来的影响也不大。

抗战开始以后，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进步的知識分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动。为了使宣傳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在他們的口头或書面中，就必然有意識地注意到人民群众的語言。特别是在当时的解放区，由于人民群众政治、經济和文化状况的改变，他們的語言，不管是通过出版物，或是出現于口头，都会很自然地对書面語产生一定的影响。

1942年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發表后，对以后書面語言的發展，給了極大的影响。毛主席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綫，要求作家描写工农兵的生活，刻划工农兵的人物性格。从此以后，在作家們的作品里出現了一大批人民群众的日常用語。固然当时在运用方言的問題上有些作家还缺乏应有的选擇，然而書面語毕竟从这些方言里面提煉出一批有用的成分，并且很好地被文学語言所接受，使它由原先方言的地位上升为普通話的詞汇。現在我們常常在一般的書面語里看到的，如："淘气、疙瘩、够嗆、胡扯、底細、干巴巴、摸底、打气、出洋相、窍門、苗头、加油、狗腿子、沒譜儿、要奸、捉摸、冒火、搞、恼火、名堂、拌嘴、出漏子、打交道、甭、压根儿、别扭、排场、安詳、拉倒、二流子、寒傖、蹓躂"，等等，都是由方言中吸收进来的。从这些材料看起来，書面語里方言成分的主要来源是北方話的口語，特别是北京話。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础方言在这方面有它先天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政治、經济、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解放以后，全国出現了空前的团結和統一，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出現了空前高漲的文化运动，方言向共同語集中的趋势已經大大加强了。可以想見，今后書面語吸收方言詞的趋势，不是逐漸加强，而是逐漸减弱。当然書面語今后还是会吸收方言詞的，然而我們今天的民族共同語已經有了明确的規范，書面語对方言詞的吸收，必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發展。

*　　*　　*

四十年来，詞汇变化如此之大，就中国整个历史来看，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变化，正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文化革命开始的。在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現在，我們認为有必要对五四运动給汉語的發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作出阶段性的科学总結，这就有待于我們全体語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了。我們相信，随着今后社会的飞跃前进，汉語的發展一定要比过去四十年还要迅速，还要丰富多彩。同中国社会的發展一样，汉語飞跃發展的时期已經到来了！我們語文工作者应該拿出二十四分干劲来，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一时期的到来。

（上接178頁）

如果規定了"現代汉語"的范圍，重复的問題是基本上可以避免的。所謂不可避免，这是由于相近的学科彼此总有許多联系。还应該看到，即使有重复，而各門学科的講授角度和重点也可以不同。

最后，我們必須再强調一下"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的重要性。大家从来都很关心这門科学怎样才能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这可以从最現实的問題来看一看：不懂音位学的理論，能够制訂出汉語拼音方案么？又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創制文字呢？不懂語言和文字的关系，能够进行汉字改革么？不懂語言的發展規律，能够很好地进行汉語規范化的工作么？不懂語言和方言的关系，推广普通話能够圓滿进行么？有关这些問題的理論根据，都是来自"一般語言学"或它的基础課程——"語言学引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党的三大語言政策都是根据这門学科的理論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訂的。这正是体現了这門学科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方針。（新疆师范学院　李兆同、徐思益）

关于建立新的“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

（一）

我們在«中国語文»1958年12月号上，就“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粗淺的意見以后，有些同志基本上表示同意，有些同志对我們的部分論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現在，这門課程还有不少問題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我們覚得有必要进一步再談談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張成村同志批評我們上次只談了几个大原則，不够具体确切。認为“表达是否清楚也是一个方面”。我們認为，只有在內容的徹底改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考虑如何表达得更清楚更生动的問題。同时，我們絲毫沒有忽視表达清楚这一点，因为，有了正确的內容，还需要准确、鮮明、生动地表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了解它、掌握它。我們所坚决反对的是，不改革內容而只在語言表达上、章节安排上繞圈子的錯誤做法。因为，錯誤的甚至有毒素的內容，表达、安排得越好，其結果是危害性越大。張成村同志的文章，以省略号代替了我們上次文章的內容，这种丟开文章的基本精神抓住片言只語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其实，張成村同志談的基本上也是內容問題，并沒有說清如何才能表达得更清楚。

2）“語言学引論”要不要講語音、語法、詞汇各部門基本理論，这个問題，大家的意見較为分歧。孙良明、張成村等同志主張不必講，賀紹兰、葛本仪等同志主張要講。我們認为，不但要講，而且还要講得清楚透徹。

我們的教学改革，是要剔除不必要的以及錯誤的內容，并不是刪去必要的內容。如果取消了語言学各部門的基本理論，只講語言的性質、起源、發展等一般原理，这还能叫“語言学引論”嗎？要使学生眞正了解語言学的一般原理，也必須使学生掌握各部門的基础知識，才能做到。

有的同志提出：旣然叫做“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础”，如果又要去大講語言学各部門的基本理論，这就同課程名称不符了。其实，这当中并沒有什么矛盾。語言学各部門的基本理論，又何尝不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一部分呢？講的时候，可以用馬克思主义的語言观講，也可以用唯心主义的語言观講，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嗎？所謂“基础”，我們看来，就是闡明基本概念，講淸基本原則，为进一步学習和研究提供基础知識，同“引論”的含义并无什么差別。提出要改名称的目的，在于更明确这門課程的思想性、战斗性，說明要以馬克思主义語言观来講授这些基本理論，这是針对唯心主义語言观在語言理論教学中泛濫的情况提出的，同講不講語言学各部門并无关系。

首先，应該明确“語言学引論”是一門理論課程，它的任务就应該同研究具体語言的汉語課程有明确的分工。它应該講淸楚語言各部門的对象与任务，介紹常用的术語和概念，闡明一般規律，解决研究这門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的問題。以語音学为例，我們应該闡明：1. 語音学的对象和它在語言学中的地位。斯大林曾一再强調語言自古以来就是有声的，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壳，那么，我們就有必要通过講授，讓学生了解到：要研究語法、詞汇、文字，首先要掌握可以捉摸的語音。2. 語音的物理性質、生理性質、心理性質、社会性質。应該突出講社会性質，研究語音的物理、心理、生理性質是为語音的社会性質服务的。因此，其他部分可以少講，音位学却应該多講。3. 語音学的分类及其研究方法。語音学可以基本上分成描写語音学与历史語音学。确定这个分类原則后，就可以充分闡明两者的关系，以及怎样研究这門学問的方法論上的問題。4. 国际音标的性質、書写法、發音、用途。5. 語音学的現实意义。講授中应該指出：語音学是研究語言学各部門的基础，能帮助我們准确地掌握本民族語言和外族語言的标准音，能使我們了解各个語言的語音体系，应該特别着重闡明語音学对于調査方言、推广普通話的重大作用。这里提出的只是举例性質，并沒有包括語音学要講的全部內容，也沒有考虑到次序安排，但从中可以看出，这同現代汉語語音并无多少重复之处。

我們所說的从汉語出發，不等于講汉語，以汉語代替一般語言学。作为一般語言学的基础課的“語言学引論”和作为具体語言学的汉語，各有自己的具体內容。前者着重于闡明一般理論問題，通过一些具体的例証，解决学習和研究語言学的一般原則和方法論問題；后者則是講授汉語的語音、語法、詞汇各部門的知識，从而进一步研究推广普通話、汉語規范化、文字改革工作中的具体問題。所謂从汉語出發，就是要求我們在講授“語言学引論”时，要从当前党的語言政策的实际要求出發，总結汉語研究成果，使之提高到一般理

論上來，以丰富一般語言学理論。还要批判中国語言学者及对中国語言学有影响的外国学者的資产阶級唯心主义观点、方法，講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語言文字的言論和指示，以帮助学生树立馬克思主义的語言观。这样，我們就不会因为从汉語出發，發生与現代汉語重复的問題了。当然，要做到一点都不重复，那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这样做。我們要分清是必要的重复，还是不必要的重复。这就要求两門課的教师，搞好协作关系。如果这种重复是必要的，比如国际音标的教学，有些音素汉語中沒有，有些音素汉語中有，重复的就多学一次，这只会使学生掌握得更好。应該指出，如果先前学过的只是基本概念，后來是作进一步的探討，这并不算重复。

目前，有不少同志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問題，因而对开設"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有些顧虑，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一个現实問題。我們有必要根据学生具体情况來考虑課程的安排。賀紹兰、葛本仪两同志提出把"語言学引論"放在二年級开，这个建議很好，我們完全同意。一年級不講"語言学引論"，先講"現代汉語"，这对学生有好处，因为他們在中学已經多少学过一点汉語，而且汉語又是日常說的，所以容易接受。到二年級时，他們已經学过一年現代汉語和一年外国語(英文或俄文)，在这个基础上学"語言学引論"，困难就会大大减少。(南京大学　裴显生、夏錫駿)

(二)

《中国語文》近來关于如何改革"語言学引論"課程的討論，引起了我們教研組同志極大的注意，同时，也对我們有很多啓發。我們对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展开了热烈的爭辯，最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下面就談談我們对这个問題的看法。

有人說，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学生是面向中学的，可以不学語言理論，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作为未來的中学語文教师，决不能只懂得一点汉語知識就够了。如果沒有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的武装，沒有銳利的思想武器，就不可能更好地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語言現象的能力，也就不能更好地运用語言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同时，为了吸收中学語文教师参加我国語言科学研究队伍，也不能不先使师范院校中文系学生有較好的語言学基础知識。

"語言学引論"对学語言課程的指导作用，正如同"文艺学引論"对学文学課程的指导作用一样。"文艺学引論"要講文艺的特征和社会作用，文艺战綫上两条道路的斗爭，党的文艺方針等等問題，"語言学引論"也要講語言的特征和在社会生活、生产斗爭中的作用，語言学界两条道路的斗爭和党的語言政策等等問題。至于"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究竟应該講些什么，我們的意見是:

1) 闡明語言学的性質和內容，語言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以及語言学对于語言实踐的意义；

2) 系統講授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本理論，如語言的社会本質、特征、起源、發展等，并对在中国語言学界有影响的各种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思想进行强有力的批判；

3) 講述我国各民族語言發展的現状，闡明党的各項語言政策的理論基础和現实意义，着重論述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在中国的运用和發展，毛主席对語言問題的指示，瞿秋白和魯迅等对語言問題的見解，語言学界两条道路的斗爭和我們应有的任务，等等；

4) 說明語言的教育作用，語言和文学的密切关系，語言理論对提高語言修养和文学修养的重要意义，作为語文教师或語文工作者学習語言的方向和应有的态度。

至于汉語的語音、詞汇和語法各部門的基本理論，应該放到"現代汉語"中講而不必放到"語言学引論"中講，因为一年級学生沒有系統地全面地掌握汉語的实际知識，講这些理論，效果不会好；而且在"語言学引論"中講了，就难免和"現代汉語"重复。不在"語言学引論"中講汉語各部門的具体理論，不能認为这不是从汉語出發。

同賀紹兰、葛本仪两同志的意見有所不同，我們認为"語言学引論"应該放在一年級講，因为：1) 它可以引导学生学好語言課程，对他們学習汉語有帮助；2) 它如果能密切联系汉語实际、学生思想和业务实际，是不怕一年級大学生接受不了的。只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一年級同学也完全可以学好这門課。

最后，我們認为，关于語言和語言学的許多專門問題，如音位学、語法范疇、毛主席的語言風格、魯迅作品的語言等等問題，放在"語言学引論"和"汉語"課里面講都不合适。講簡單了，对学生帮助不大，詳細、深入地講，又会影响整个課程的計划和要求。因此，我們主張在高年級再开設"語言学專題講座"。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教研組青年教师)

(三)

我認为开設这門課的主要目的应該有三个:

首先，是作为綜合大学一切語言課程的"引論"，介紹学習語言学的目的、观点、方法，这門科学有哪些內容，分哪些部門，各部門之間的关系，在这門科学中哪些方面存在着思想斗爭，我們应該以什么态度來学習以后的語言学課程等等問題。

其次，它应該給以后的汉語課程，主要是現代汉語

的学習打下一个理論基础。

再次，它应該給以后的語言理論的学習打下一个基础。綜合大学的語言理論課不多，除"語言学引論"外，只有"一般語言学"、"語言学史"等課程，这些課程因为要一定的語言学知識作为基础，要到高年級才能开設，在这以前两三年有必要先开一門"語言学引論"。

如果这門課开設的主要目的确定是这样，那末，它就应該在一年級講，作为語言学課程的入門課。我想，高中畢业程度的同学是掌握了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識和語言的感性知識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教师教学方法得当，多結合实际，同学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在这里我同意張成材同志的意見，認为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应該是教学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

我認为在"語言学引論"中除了介紹語言学的对象、任务，語言的性質和發展等理論知識外，有必要講語言学的各部門。有人主張把这些理論归并到"現代汉語"里一起去講。我觉得，这样一来，現代汉語这門課可能太臃大了，在講"現代汉語"之前，先在"語言学引論"中講些理論，好处是：可以先对現代汉語的語音、詞汇、語法各部門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另外，可以給学習、研究現代汉語打一个初步理論基础。所以在"語言学引論"中可以多講一些一般的理論和現象，而"現代汉語"就可以就汉語的現象进行比較深入的分析，将汉語的特点闡述得更充分些，重复的地方可以略些，这样也可以帮助縮减些"現代汉語"的內容。（南京大学 許惟賢）

（四）

"語言学引論"課程我学过两遍，所以对它的感受比較深。現在我从学生的角度談談对这門課程的意見。

1）1957年上半年大鳴大放时期，北京俄語学院貼出这样一張大字报：要求高教部取消"語言学引論"。今年年初，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党总支發动同学討論"語言学概論"有沒有繼續开設的必要。有的同学主張不單講，同現代汉語合并，有的同学主張开几个專題就可以了。这些都是間接取消或削弱这門課程，我是不同意的。这是一門理論課，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具体語言的研究（如汉語、俄語），这是方向問題。如果取消了"語言学引論"，就等于取消了文学課程中的文艺理論一样，所以繼續开設是完全必要的。

孙良明同志經过教学实踐得出了"把馬克思主义語言基本理論同汉語合并在一起講是不恰当的"結論，大家应該重視。

2）賀紹兰和葛本仪两位同志認为，开設这門課的主要目的要求是："使同学通过語言学一般理論的学習和掌握而具有研究或解决具体語言（汉語）提出来的实际問題的能力…"我看这样的提法要落空。这不是懂得了一般語言知識和掌握了語言理論所能办到的，还必須較深入地了解具体語言才行。

我認为开設这門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馬克思主义的語言观，系統地掌握基本理論知識，能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具体語言中的一些現象。通过这門課程的学習，使学生充分地認識到党的語文政策的正确和重要，从而貫徹党的語文政策，宣傳党的語文政策。

3）我認为这門課应包括以下三大部分：1．語言学基本理論知識：主要是講授語言的社会本質，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同时，批判西方唯心主义語言学家；講述当前我国語言学界的两条道路的斗爭。2．从理論上闡明推广普通話、汉語規范化、文字改革的正确。还講述社会主义国家必須要进行扫除文盲以及編写扫盲課本的原則。总之，要为党的語言政策服务。3．講怎样学習語言，怎样运用語言，語言和文学的关系，衡量运用語言好坏的标准，等等。解决同学們迫切需要而又实际的东西。

至于語音、詞汇和語法我看用不着过多的去講它。

裴显生和夏錫駿两位同志認为"講'語言学引論'如果不講語言各部門就等于造房子只奠定了地基而不造房子"。我認为"語言学引論"課程是打地基，而不是盖房子，盖房子的任务应該交給具体的語言課。

4）我主張在一年級开这門課，因为先学了理論可以指导具体的語言的学習，可以帮助理解具体語言中的一些現象。理論应該做先导。

主張在三年級开設这門課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的确能理解得深透些。但是，在一年級就开設这門課程也不是沒有条件，因为同学們在中学已經能够初步掌握汉語的材料，同时也学了外語。担心学生基础差接受不了是沒有必要的。从前的高中畢业生語言知識少得可怜，这是因为以前的中学里只有文学課而沒有語言課的緣故。我在中学时就沒学过"汉語"。現在的中学已經开設了"汉語"課（从前是單开"汉語"，現在同文学課合在一起了，以后怎样設置，还不知道，反正有汉語的內容），所以在一年級开設还是有条件的。（吉林师范大学 易 功）

（五）

最近看到《中国語文》上的討論，在高等学校里必須开出講授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的課程来，这是大体上一致的看法。但有这么几个問題：講不講語音、詞汇、語法等語言学各部門的基本理論，課在哪一年級

开？課程名称改不改？叫什么？这些就是关于講授內容、开設时間、課程名称的問題。我們覚得这些問題都应該討論解决，但目前似乎应該首先解决講授內容問題，因为这是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核心，解决了內容問題，名称問題也就隨之而解决。內容上統一了認識，也便于解决开設时間的問題。

我們認为，討論講授內容也不应該局限于語音、詞汇、語法等語言学各部門基本理論要不要講的問題上，要把眼光放远些。应該意識到我們是在建設一門新的語言課程，那就必須从高等学校应該开出一門講授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本理論的新課程出發，来討論講些什么內容，怎样講法。我們覚得这不仅仅是“語言学概論”課程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我国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課的新体系問題。因此，在討論講授內容的时侯，决不能被以前“語言学概論”的旧框框所束縛。

講授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的新課程（名称問題暂且不談），我們認为应該包括这些內容：1）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語言学的基本理論。2）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講授，要求使学生系統了解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本理論的教学任务，認識到語言科学、語言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性。3）毛澤东語言理論研究。这个工作我国語言学界在以前做得很不够，最近，王德春同志的“認真学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一文的發表，可說是个好的开始，今后我国語言学家对于我們領袖关于語言方面的理論应該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4）批判中外語言学者唯心主义的語言学說。在这部分还要着重批判高本汉等外国資产阶級語言学家对汉語的污蔑，澄淸一些汉語研究者的胡塗思想。5）新中国語言科学的新發展。这部分应着重講述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語言研究工作的重視和領导，新中国語言科学的新成就，以及当前語言研究、語言教学方面的任务。（山东师范学院　李子云）

（六）

高等学校的語言文学專业要不要“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悬而未决的問題。从«中国語文»所組織的“語言学課程整改笔談”和每期报导的如高等院校語言学課程整改情况来看，大家的意見相当分歧。归納起来，大家对“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的意見，大致可以分成：1）取消論，2）合幷論，3）縮減論，4）分散論，5）加强論；第二、三两种意見，实質上也等于主張取消，不过提法不同。这几种意見的具体主張都已見于近几期的«中国語文»，这里不必一一引述，只談談我們的看法。

首先，我們認为，这次語言学課程整改的成績是很大的，許多教师开始注意到了理論联系实际；許多教师又都提出了对这門課程的整改方案，虽然有些方案幷不完善，或者說，还不正确，但是，至少表現了敢想敢說敢作的共产主义風格。要說这次整改还有缺点的話，那就是缺乏科学分析。有人看到“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問題严重，而沒有分析問題严重的原因和解决問題的办法，就产生了一种取消或削弱这門課的傾向，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我們認为，必須加强基础課，加强基础理論課，决不容許取消或削弱“語言学引論”，必須解决“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在过去教学中所存在的問題，具体的途徑就是在党委領导下發揮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科学研究，特别是汉語的研究，来丰富語言学理論，提高教学質量。

其次，我們談一下这門課程如何結合实际的問題。

第一，怎样結合学生的实际，这确实是应該首先考虑的一个問題。“語言学引論”只講語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一般知識，学生是具有接受这些知識的能力的。因此，我們始終認为，結合学生实际的根本問題，是教师如何改进教材內容和教学方法，而不是取消这門課程或削减这門課程的內容。

第二，怎样結合中学的实际，也是許多高等师范院校的同志們最关心的一个問題。高等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是中学教师，因而在課程設置上，强調面向中学，結合中学实际，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所謂結合中学实际，也决不能狹隘地理解成为結合中学課本的实际（有人主張連語言材料都完全采自中学語文課本）。如有的同志看到中学的汉語和文学合幷后，就主張在高等师范院校的語言文学專业里也取消“語言学引論”，或把这門必修課程改为选修課。有的学校認为“語言学引論”这門課程的許多內容，对語文教师来說用处不大，因而就大力削减，把它的剩余部分合幷到“汉語”課中去。我們認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第三，关于結合汉語的实际問題。所謂結合汉語的实际，决不是在“語言学引論”中尽举一些汉語的例子，更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去掉不易結合汉語的部分”。“語言学引論”是“一般語言学”（即通常所說的“普通語言学”）的“引論”，不是个别語言学——汉語的緒論。它的內容不仅要概括汉語研究的成果，而且还要概括世界其他語言研究的成果。它所概括出来的理論不仅要指导对汉語的实踐，而且也要指导对世界其他語言的实踐。在这个意义上来說，就根本不是什么“結合”問題，而是应該加强汉語的研究，把汉語研究的成果上升到一般理論，进一步去丰富“一般語言学”或“語言学引論”，使这些理論回过来指导汉語实踐。

再其次，我們認为“語言学引論”和“現代汉語”的重复現象既可避免，也不可避免。（下轉174頁）

毛主席的比喻

唐啓运

毛主席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紙老虎，确是十分鮮明的比喻。这个比喻使人們形象地認識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那种虛弱无能、外强中干的本質特征，使人們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

毛主席的著作中，許許多多的比喻都是十分鮮明的。他曾經把日本侵略者比作妖精，比作驢子，比作野牛，比作瞎子和聾子。把帝国主义比作怪物，比作大山。如：

"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三，904頁）①

"使它（按：指日本侵略者）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陣，我們一声喚也要把他吓一大跳，…"（二，474頁）

"我們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們变成瞎子和聾子，…"（二，455頁）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一，158頁）

"現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三，1126頁）

曾經把美帝国主义比作野兽，把各国反动派比作渣滓，比作蠢人。如：

"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划，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及其他地方乱窜，集合了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議上的講話）

曾經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小軍閥比作大狗、小狗、飽狗、餓狗，比作猫兒，把頑固分子比作狗屎堆，把国民党比作粪坑。如：

"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按：指国民党内部之間的爭斗）之間的一点特別有趣的爭斗，…"（一，146頁）

"那有猫兒不吃油，那有軍閥不是反革命？"（一，152頁）

"假如赫尔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三，1140頁）

"頑固分子，实际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二，709頁）

从上面这些比喻中我們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野蛮、愚蠢、骯髒、卑鄙的东西，腐臭面和阴暗面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的本質注定了他們是見不得光明的，他們在共产主义的曙光所照亮的世界里将最后失去其立足点而死亡。

我們从毛主席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比喻中却看到了光明世界的代表，他們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人的人民群众，是燒毀腐臭面和阴暗面的人民軍队，是引导人民前进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眞正的銅牆鉄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眞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一，136頁）

"我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們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三，1126頁）

"紅軍象一个火爐，俘虏兵过来馬上就熔化了。"（一，70頁）

"它（按：指中国革命）是立于高山之巓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兒。"（一，112頁）

"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二，435）

从这些比喻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和他的軍队，和他所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和他所衷心爱戴的共产党是多么的坚强有力，他們是銅牆鉄壁，是上帝，是如来佛的手掌。他們又是多么的美丽可爱，他們是光芒四射的旭日，他們是光明美好的象征。

从上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比喻中，我們可以曉得，比喻并非是單純的語言技巧問題。当然，不懂得語言技巧是不能写出好的比喻的，然而这不是毛主席善于比喻的根本原因。我們在这两种比喻中，覺得它之所以

---

① "三"是《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下同例。凡不是选集中的例句，另在句后注明。

能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鼓动力量，之所以能使人受到極其深刻的政治教育，首先就在于它鮮明的思想性，在于它飽和的感情，分明的阶級的爱憎，在于它精湛的論断和科学的預見。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們首先在这里探討了毛主席比喻中的鮮明性。

其次，要談的是毛主席比喻中的形象性。比喻的特殊作用，本来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远处的东西近处化，把深奥的事理淺显化。較难理解或較难掌握的概念和事理通过比喻而显現于眼前，使人产生实感，引起共鳴，叫人明白。但是作喻的事物，由于各人不同的选擇，就会使各人的比喻具有不同的特色。毛主席用来作喻的事物，是人人共知的，以及与这种人人共知的事物相适应的淺显通俗的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詞語。这和某些人追求奇詞僻語的比喻是完全不同的。

非一条直綫那样發展的战争形态，自然是錯綜复杂的，但是錯綜复杂到什么样子，毛主席用"犬牙交錯"一語就把它說穿了。他說："犬牙交錯的战争形态，就是頗为特殊的一点，…"(二，433頁)

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时常要談到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怎么个样子呢，如果从抽象的理論上来論述，則非浩浩蕩蕩長篇大論不可，但是毛主席只用了两个平凡的詞就把它的特性具体地說清楚了。他說："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远鏡和显微鏡。"(一，212頁)

游击战争有不同于正規战争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形下，游击部队迅速轉移就是其特性之一，但是迅速到怎么个程度呢，在毛主席的笔下，就把这个程度一語道破了。他說："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風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二，375頁)

解放以来，人人都談批評的意义，无不举医生治病一語来作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毛主席最先用的。这确实是比喻得淺显明白，眞是三尺孩童也能完全領会。毛主席說："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發了闌尾炎，医生把闌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三，850頁)

把沒有解决的思想問題和沒有放下的精神負担喻为包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却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也是毛主席的比喻。毛主席說："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担应該加以解除。"(三，971頁)

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比作灰塵，也是毛主席首創的比喻。他說："房子是应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滿了灰塵；臉是应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塵的，也应該打扫和洗滌。"(三，1120頁)

东風压倒西風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这是毛主席1957年11月在苏联發言时所用的。东風是清新的風，使人和气象蓬勃的感覚联系了起来，而西風是寒冷的風，只能使人感觉到寒意。

犬牙交錯、望远鏡和显微鏡、流水和疾風、医生治病、包袱、灰塵、东風和西風，这些都是人人共知的平凡事物。毛主席就是把它們用来使許多抽象的概念或事理形象化了。

拿流傳广泛的諺語、成語、典故来作比喻，是毛主席比喻的形象性的另外一个特点。

"对于他們，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三，884)"錦上添花"是喻提高，"雪中送炭"是喻普及。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暫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样罵也是空的。"(三，886頁)"阳春白雪"也是喻深入、提高，"下里巴人"也是喻通俗、普及。

"世界上多少人被張伯倫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說所蒙蔽，而不知道他們笑里藏刀的可怕。"(二，585頁)"笑里藏刀"是喻外和易而內阴險的伪善者，張伯倫及其伙伴就是这样的伪善者。

"'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虽然喪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迴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內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內潰，…"(二，469頁)

"他們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观了。"(二，751頁)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二，318頁，指自由主义的表現之一。)

这些諺語、成語、典故，是汉族人民許許多多的智慧花园里的一两朵花。正因为这是汉族人民所特有的，所以用来作成的比喻就富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使人看了特别感到亲切。

再次，我們要談到的是毛主席比喻中的多样性。

几个能喻者来說明一个被喻者，这是比喻的多样性的表現之一。"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队，長征是播种机。"(一，147頁)同是長征，但用了三个能喻者来說明。"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一，290頁)"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这样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一，289頁)"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釘子。"(一，779頁)也都是用三个不同的能喻者来說明同一的被喻者，用碰壁、

跌交子和碰釘子来喻犯錯誤。

此外，毛主席所比喻的語詞，或者是口語，或者是諺語，或者是成語，或者是典故，这也是他比喻中多样性的一种表現。

最后，談談毛主席比喻中的准确性和精煉性。毛主席的每一个比喻都是經过認真的推敲和着力的鍾煉的，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間的本質联系是十分恰当和十分准确的，并不是現象的堆砌，随便作喻，而是对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間的某方面的共同点作了高度的概括，以及与这概括性相适应的是那唯一能准确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詞語。

毛主席把馬克思主义比作箭，把中国革命比作靶。他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三，842頁）就是說，馬克思主义的箭不能脫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靶而乱放，要有的放矢，理論要和实际相結合。一个不是那么容易懂得的理論，由于毛主席用了准确的比喻，也就立刻懂得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129頁），"〔中国的正义战爭〕是把全世界历史轉到新时代的桥梁"（一，172頁），"誰要反共誰就要准备变成虀粉"（二，662頁），"关門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賊的忠順的奴僕"（一，153頁），"我認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風压倒西風"（1957年11月在苏联的發言），"中国領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絞索。"（1958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这許多都是准确地选用了最恰当最凝煉的詞語来作比喻的，句子的形式又是那末的直截了当，干脆利落，簡明精煉，确是准确性和精煉性的巧妙結合。

通过同一事物否定式的比喻和肯定式的比喻这两方面的对照，更明显地看出了毛主席用語的准确性和精煉性。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一，18頁）革命是"暴風驟雨，迅猛异常"（一，13頁）；"这些作風不正，并不象冬天刮的北風那样，滿天都是。"（三，834頁）"这不过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三，834頁）"国民党現在实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龟壳，以为这是他們的銅牆鉄壁。"（一，136頁），等等。这都是对同一件事物的两种比喻，两种比喻代表两种不同的看法，从两种不同的看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选用比喻所应有的思想性和正确的立場观点。毛主席的比喻所以那么准确和精煉，所以那么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这和他高度的思想性和鮮明的立場观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总而言之，毛主席的比喻是鮮明的、形象的、多样的、准确的、精煉的。毛主席不但是偉大的人民領袖和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語言大师和修辞家。不少同志都說不用看作者的名字，看了文章也知道是毛主席写的。毛主席的語言是有他独特的風格的，而独特的風格所由表現的方法之一，就是他那鮮明的、形象的、多样的、准确的和精煉的比喻。

（上接169頁）

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綫和陣地战，承認非固定的作战綫和运动战；反对击潰战，承認殲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認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認小后方制度；反对絕对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对的集中指揮；反对單純軍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認紅軍是中国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認严肃的政治紀律；反对軍閥主义，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軍事紀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認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紅軍停頓于旧阶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确的解决。（同上，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上面是長在分起的同位的例。

如此等等，可以分析很多句子所以延長的原因；但不論是什么原因，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实际的需要。如果沒有这种需要，却硬要把句子延長，那就眞要算"生造"的东西了。①

五四以来，汉語語法所發生的变化是否就限于这些呢？不，还多得很。这里只是举例性質。但是，就拿以上所說的这些来看，已經不难看出，汉語語法在这短短的四十年中已經發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很显然地，是遵循着汉語語法的內部規律在不断地急遽地然而又是稳妥地向着更完善、更精密、更丰富的新的阶段發展的；可以断言，汉語語法在今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設进程中，通过广大群众的語言实踐，通过政論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語言实踐，必将仍然遵循着这个方向被推向更高的新的阶段，而成为人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設进程中交流思想、調整工作的一种最鋒利的武器。

①参看《反对党八股》，《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65頁。

“平仄”也能算汉語語詞結構的“音乐性”嗎？

（一）

讀了徐世荣先生《汉語語詞結构的音乐性》① 一文以后，我有一些看法，有的和徐先生一致，有的不一致，現在一并提出来，請徐先生及其他同志指正。

我同意“声韵結合的規則化”和“凡音节都有声調”是汉語語音突出的特点。我認为，分声調是使汉語具有“音乐性”的最基本的因素，特别就普通話（北京語音）来說，“清亮、高揚”而又“舒緩、柔和”，“四个声調看来是高音成分多，而低音成分少”。②

关于音乐性在語詞結构上的表現，就“有規律的重复”这方面来說，我認为是符合現代汉語的特点的，徐先生所举的許多例子，令人深为信服。但就“有規律的調配”这方面来說，我認为和現代汉語——特别是普通話，是不尽相合的。

分平仄，是古代汉語的特点。古音* 分平、上、去、入四声，上、去、入为仄声。分四声，分平仄，都是从調值出發的。古音調值情况，現代无从知道，但顧名思义，“平”或許是平調（或高或低），“上”或許是升調，“去”或許是降調，“入”則是短促的調子。平仄相对或調配，語音就鏗鏘好听了。

然而，現代汉語，象有入声的东南各地方言，平（又分阴平、阳平）和仄的界限，往往难分得那样清楚（上海話阳平和去声調值相同）；沒有入声的“官話”，入声有的归到平声里去了，“西南官話”几乎全归阳平。看起来，从現代汉語語音上推敲平仄，意义是不大的。

如果完全撇开古音，仅就現代汉語——普通話的声調来分平仄，那就該是另一回事了。但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按徐先生的說法，平声（阴平、阳平）“高音成分多”，仄声（上声、去声）“低音成分多”，“在听感上，由于平、仄的‘音高’程度不同，分为两个大类”。然而，碰到两个上声相連时，前一个上声（仄）就变得象阳平（中升調），平、仄界限就不那么分明了。

另外，輕声屬于“平”还是屬于“仄”，徐先生沒有提。关于輕声在汉語語音中的“音乐性”作用，徐先生也沒有提。

現在就事論事，看看徐先生举的例子。这些例子是用来說明規律的，然而徐先生沒有举的例子，象“上—下”、“大—小”、“冷—热”、“进—退”（反义詞）、“树—木”、“光—明”、“悲—哀”（同义詞）、“早—晚”、“动—靜”、“开—关”（相对相关的事物），等等，不是平仄相对的；象“墨水”、“飞机”、“眼鏡”、“飯碗”、“茶壶、“順序”、“反对”、“汹涌澎湃”、“气吞山河”、“互助合作”等等詞語，不是平仄調配的，那又算什么呢？难道可以說这些都沒有“音乐性”嗎！

現代汉語是从古代汉語發展而来的，許多詞語（特别是基本詞）在結构上保留了平仄相对、平仄調配的痕迹，是很自然的。但是，新生的詞語，是不講究这一套的，看看“紅軍”、“火箭”、“水电站”、“共产党”、“拖拉机”、“八字宪法”、“社会主义”、“中国人民銀行”、“团結—批評—团結”，等等，就可以証明。

徐先生能首先从語音条件来研究汉語語詞結构，从而打开了一条路徑，这是很好的，应該欢迎。象音节重迭、声韵重迭的說法，都是有价値的。但是，在今天，即使象詩歌的格律，也只講究节拍、押韵等等，而不講究平仄。徐先生研究今天的日常使用的語言时，大講平仄相对、平仄調配，是不是脫离实际、鑽牛角尖？我想，这不应該是个方向。（元 丁）

（二）

徐世荣先生在《汉語語詞結构的音乐性》一文中，認为汉語語音結构中有两个比較突出的特点：一是声韵結合的規律化，一是声調高低的变化。在这两特点基础上，大量語詞結构具备了音乐性。

什么是音乐性，怎样理解語詞中的音乐性，这問題我不想全面来和徐世荣先生商榷，因为这問題涉及很广。現在我只想和徐世荣先生商榷一下“音乐性”在語詞中的第二种表現——即平仄相对和平仄相配的問題。我認为，汉語語詞中如果存在音乐性的話，它并不是平仄調配。

徐世荣先生認为“汉語造詞，大量的單音节‘反义詞’都是平仄相对的，如果相提并論之时，就自然有抑揚高下的变化”；据說这是由于人們联想到相对、相关的事物，就容易有平仄相对的說法。在后面又說，“联合式双音节詞，極大多数都是‘平仄’或‘仄平’的格式”。他前后一共排列了七、八十个平仄或仄平相配的詞作为例子。看来是理由充分，例子相当多，叫人不能不信。徐世荣先生还說，“这不仅是‘修’辞問題，也是‘造’詞的一条規律”，問題提得很严重，似乎以前的語言学者都沒有注意及此，而現在这規律被發現了。

---

① 見《中国語文》1959 年 2 月号。

② 徐世荣：《普通話語音講話》，5—6 頁。

* 这里所謂“古音”，大体上是指中古音說的——編者注。

为了运用这条規律，我翻了手边几本語法書，想找出一些反义詞和联合式双音节詞来証实这条規律是否正确；但是一看之下，大失所望。比如，在《語法和語法教学》一書（100—101頁）中所举的六十六个联合式双音节詞和反义詞里，只有三十个是符合这条規律的。胡欣安編的《現代汉語》第二册（105頁）在講到双音节反义詞时，所列举的十八个反义詞，也只有七个詞符合徐世荣先生所講的規律。

仅就上举两書所見的八十四个例子看，只有三十七个符合徐世荣先生所說的平仄相配的規律。当然，这个比例是不少了，我們要用数学方式来計算一下，那么，在八十四个詞中，就是出現一半"仄平""平仄"相对的詞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实际上，我們从語言現实中可以找到千万条"平仄"和"仄平"相配的双音节詞，也可以找到千万条"平平"和"仄仄"相配的双音节詞。我們虽然沒有統計汉語所有双音节詞中屬于"平仄"和"仄平"、"平平"和"仄仄"的各有多少（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做）；但是从語法書中的例子中也足够說明这样的問題：在构成联合式双音节詞时，平仄的調配是沒有規律的，所以能在八十四个例子中出現三十七个，这是由于数学上"或然率"規定的（根据"或然率"，出現四十二个例子也不算多）。

徐世荣先生后面提到所謂"四字成語的平仄調配便成了一定的形式"的說法，我們同样也可以推翻。徐先生把四个字成語排列成"平平仄仄"和"仄仄平平"的格式，說"一、三有不拘的，二、四固定"，那么它們的形式就是"×平×仄"、"×仄×平"，而实际上还是"平仄""仄平"的形式。用上述說明双音节联合詞的理由，同样可以算出"×平×仄"、"×仄×平"的可能率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十。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同徐世荣先生所提格式相反的例子，如"有备无患"、"一草一木"、"青出于藍"、"百家争鳴"、"百战百胜"、"杞人憂天"、"知己知彼"，等等。

因此，我們認为所謂"平仄相配"、"平仄相对"，决不是什么构詞規律，我們能够遇到很多"平仄相配"、"平仄相对"的詞，那是必然的，因为事实上双音节詞和四音节成語有百分之五十可能构成这类形式。

平仄相配是古代文人作詩选字用的一种規则，在現代白話詩里早已不注意这些了。前人研究的結果是：古代平声是長音，仄声是短音，所以自然平仄分成两类。大家都知道，古代語言傳到現代，在語音上变化很大。在現代汉語里，声調虽然在区别字义上还有其重要作用，但是对四声能有平仄感覺的（即阴阳平是一类，上、去是一类），恐怕除了"文人"以外，一般人民群众是不会体会的了。詞汇是全民創造的，决不是个别文人創造的，在实际語言中，人民群众感覺不到这种平仄的区别（注意：不是說沒有四声的区别），人民群众在造詞时自然不会管什么平仄問題了。

我們認为，發現語言規律的时候，必須掌握充分的資料，才能作出正确結論。徐世荣先生所以得出这样不妥当的結論，就是因为所根据的是片面的材料。

（施　波）

（上接187頁）

沒有解釋詞义，然而是有用的。听說凌景埏同志在他的校本里做了很多解釋詞义的工作，希望能够早些印出来。这个作品不單在文学史上有着它的重要地位，在語言史上也提供了極为重要的資料。

再談《談"西厢記"的詞語解釋》。

張心逸同志是一位極为勤奋的元代詞汇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工作的人还不多，而这又是汉語史，特別是普通話史里的一个具有重要环节性的工作，我很欢迎他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成就。

在这篇文章里，張心逸同志批評到了我校注的《西厢記》里的几个注釋，我衷心地感謝他的好意。我的那个校本虽然修訂了两次，但是仍旧存在着許多問題，希望同志們多提些意見，我准备重新再搞它一遍。

关于"演撒"的解釋，毫无問題地，我弄得不对。我想这是一个同行語，和"梦撒"、"涤老"相类。"撒"字用做詞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現象。关于"閑嗑牙"的解釋，我弄得也不明确；然而解釋做"誹謗地說是非"似乎感情色彩又未免过于濃厚了。根据現代北方官話区的方言里所保存下来的用法来看，还是王季思同志解釋做为"聊天"或"擺龙門陣"的"閑話"适宜，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意义有所变化和丰富，"胡吹乱扯"是其一，"說是非"（犹之乎"小广播"）也是其一，其目的性却不一定就是"誹謗"。

較为重要的問題是張心逸同志提出来的詞汇分类問題。王伯良分成九类当然不妥当，他是根据詞的来源进行分类的，这会分不胜分，而且总会發現越来越多的无法归类的或是跨类的詞。張心逸同志的四分法当然比王伯良的好得多，可是我以为它也仅只能起一个标識的作用，将来大規模进行宋元詞汇研究成果的总結工作的时候，我看还是根据語言現象来分类要更好一些，例如，用詞类分就可能是一个办法。

末了兒，这兒要感謝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志們，特别是赵正之教授，他們在关于"乳栿"的解釋上給了許多有益的帮助。

“乳口”和“鉤窗”

——《西廂記諸宮調》詞彙研究之一——

〔捷克〕米列娜·維林格罗娃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范疇里的通俗文学語言的研究——汉語史研究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直到今天还应該說是做得并不很够，因此在讀作品的时候，无論是有关句子結构方面或詞义方面，常常使人遇到困难。我在研究金、元两代的諸宮調的时候，不断地碰到这些問題。

諸宮調在古典說唱文学的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可能是从变文發展而来的。而且由于自己非常丰富的音乐形式，往往被人視作戏剧的前身。它最繁荣的时代是金代和元代，而且根据历史文献还可以断定：一直到明代，諸宮調仍然普遍流傳演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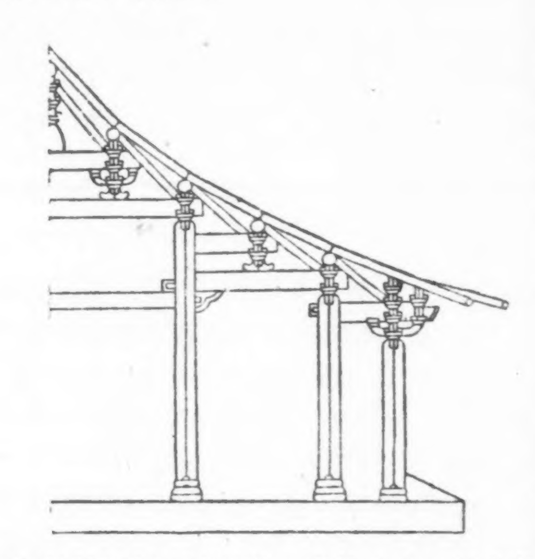
現存的諸宮調只有四种，那就是：1)金代佚名的《刘知远諸宮調》，2)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3)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遺事諸宮調》，4)我們把保存下来的宋代南戏《張协状元》的开头一段也看做是諸宮調。在这四种保存下来的諸宮調里，只有《西廂記諸宮調》是完整的，别的只是片断。我們認为《西廂記諸宮調》是最典型的諸宮調，因为它的內容和語言有着明显的民間風格。

在研究《西廂記諸宮調》語言的时候，我們碰到了一些詞，它們的意义在今天不能明确地被人了解。它們中間的一些詞完全是民間用語，又大都是屬于方言性質的，另一些是由專名詞轉化为民間常用詞的。这些原来的專名詞大概在《西廂記諸宮調》流行的时候曾經被普遍使用过，但是后来社会情况改变了，有些詞也变得陈旧过时了，它們的意义就被人忘却了。

在《西廂記諸宮調》里，我們把“乳口”[ʐỳk‘ou]和“鉤窗”[kōutʂ‘uāŋ]做为这一类的詞的代表。①

1)“乳口”这个詞出現在《西廂記諸宮調》第一卷叶四的上半叶的第一行：②“西有黃河东华嶽。乳口敌楼沒与高，仿佛来到云霄”。《西廂記諸宮調》的作者董解元在这里描写了黃河在河中府的汹涌的激流，在那里黃河的浪濤是如此高，連敌楼的高度都不能和它相比。这里，“乳口”修飾敌楼，它含有形容詞的性質，我們怀疑“乳口”这个詞的內容与敌楼的建筑工程有关。

李明仲写于熙宁年代(1066—1077)的《营造法
說明了这一問題。③在它討論“大木作”制度的那一
(5卷叶一的下半叶)我們第一次碰到“乳栿”这个詞
它与建梁的五种木工之一有关。但是在“乳栿”一詞
簡單說明“若对大角梁者与大梁广同”中，沒有圖
很难使人明确的。《营造法式》第31卷虽然附有若
結构圖紙，它們整个地使建筑的木料結构形象化，但
并沒有将乳栿細致地描画出来。只是在比較所有的
用了乳栿的建筑的結构圖紙以后(圖9,10,13,14,1
19,20,附8,9,10,12)，我們才能得出这一結論：这是
当两椽的外端和檐柱中綫相交的梁，它的頂端支持
屋頂上前后两部分的椽，下部分割牵建筑內部結构
水平梁和主柱。(見圖)



根据結构圖紙引出結論，乳栿大多运用在高大
寬广的建筑里。这一点在《营造法式》第19卷“大木
功限”叶四的下半叶和叶六的下半叶得到証明，那
說，乳栿运用在建筑“倉、廒、庫屋”及“常行散屋”，
“官府廊屋之类”的时候。

---

① 标音根据《中原音韵研究》的构拟。上海1957年
务印書館版，180頁、279頁、275頁和146頁。

② 适适子梓校，張羽序本《西廂記諸宮調》，上海195
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这是現存最古的版本。

③ 1925年朱啓鈐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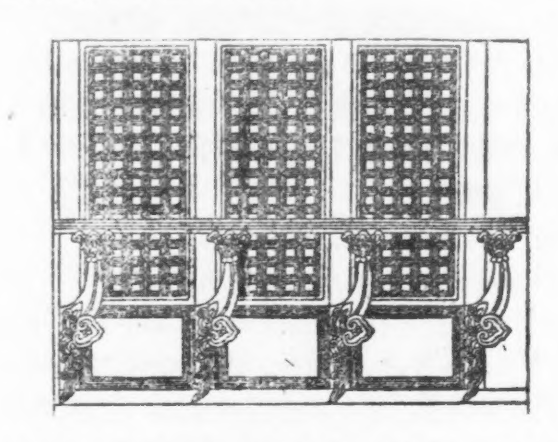
現在剩下的只是說明，为什么《西廂記諸宮調》的語言沒有直接运用"乳栿"而用"乳口"。我們認为是因为"栿"字不是慣用字，我們只能在最大的辞典里才能找到它。例如《康熙字典》这样解釋它的意义："以小木附大木上为栿"；（这一定义也支持了我們在《营造法式》基础上的解釋）所以民間語言沒有按照原样汲取"乳栿"这个詞，只用了它的第一个音綴，而用形象化的名詞語尾"口"字代替了它的第二个不習慣的音綴"栿"。

总的說来，"乳栿"这个詞原来是作为專門术語在建筑学中使用的，变成了民間語言"乳口"这个詞，它指明是建筑物为了高和寬广，在使用木材結构和檐柱中綫相交的梁。很可能"乳口"这个詞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在談到建筑方面的时候，把它当作"高大"的意义使用。

这一解釋也非常严格地适用于《西廂記諸宮調》的原文："西有黃河东华嶽。乳口敌楼沒与高，仿佛来到云霄"。我們可以很簡單地这样解釋：甚至那有乳口的敌楼，也就是很高的敌楼都不能以自己的高度与黃河的巨浪相比。

2）第二个詞"鉤窗"出現在《西廂記諸宮調》第1卷叶十四上半叶第五行。在最早的适适子本（16世紀）、居隆本（16世紀）和《六幻》本（17世紀）中，"鉤"字都錯成"鈞"字。黃嘉惠本（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和暖紅室本（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正确地修正为"鉤"字。在这里描写出春天和普救寺的环境，張生在那时第一次偶然單独与鶯鶯相遇，原文为："藥栏兒边，鉤窗兒外，粧点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翠。"

在《营造法式》第7卷叶三的上半叶"小木作制度二"一节中我們找得到闌檻鉤窗的描写："造闌檻鉤窗之制：其高七尺至一丈，每間分作三扇，用四直方格眼。檻面外施云拱鵝項鉤闌，內用托柱，各四枚，其名件广厚各取窗檻每尺之高积而为法。"为了清楚，我們也附上鉤窗的結构圖紙，这是从《营造法式》卷32叶七的下半叶上复制的。因此，在《西廂記諸宮調》原文里，鉤窗和栏兒（它即是《营造法式》里的"闌檻"）是緊密相邻的，我們認为《西廂記諸宮調》的作者一定熟習《营造法式》里所描繪的"栏窗"形象。



最后，我要眞誠地感謝吳曉鈴教授，承他在确定《西廂記諸宮調》中詞义的时候給予了我宝貴的啓示。

（伊　尔譯）

談《西 廂 記》的 詞 語 解 釋

張心逸

最近几年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不少公私藏家的珍本秘笈，供給研究語言和文学的人以宝貴的資料，《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以下簡称"奇妙本"）就是其中的一部。我因了这書的刊行，打叠起重溫《西廂記》的精神，仔細地把它和新版的《西廂記》作了一番校讀。

讀《西廂》最感困难的，是曲文中夾着的方言詞語。我們不加分析，便不能了解曲中人物的口吻和神情。"奇妙本"注釋比別本精詳，可是关于方言詞語，却付缺如。本来这类詞語，古今讀者大都以不求甚解处之。元陶宗仪云："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远，尙罕有人解之者。"他所指的董西廂是《西廂記諸宮調》，就是元代王实甫《西廂記杂剧》（以下簡称"王西廂"）的藍本，王实甫汲取了它的不少的文字。

明代的徐文長、閔遇五、王伯良、凌濛初等曾对这类詞語作过一番整理，著作流傳的有閔氏的《五剧箋疑》，凌氏的《五本解証》，王氏的《古本西廂校注》等。尤其是王氏更精詳地把这些詞語区分为九类：一、成語，二、經語，三、方語，四、調侃語，五、隐語，六、反語，七、歇后語，八、掉文語，九、拆白語。

不过他所区分的九类，互有牵連与抵触，例如他說："有美玉于斯"是"掉文語"。案此語出自《論語》子罕章："有美玉于斯，韞匵而藏諸？"所以也可归入"經語"。又因此句是紅娘对張生付簡，表示珍藏，請張生放心，故借此經語作答，又取下文"韞匵而藏諸"，又可称为"歇后語"。我以为大別实只四类：成語、方言、市語以及拆白語。

至于他的箋注，据云：是"采用碧筠斋本旧注及

天池先生新釋。"天池即徐文長的別号。凌濛初对徐氏詞語的解釋很不滿意，竟說："徐解牵强迂僻，令人勃勃。"对王氏贊揚地說："王伯良尽留心于此道者，其辨析有确当处，十亦时称二三。"就这种評蹤看來，我們便可了然古人的箋注只能給我們一种啓發与参考，并不見得絕对正确可信。我就他們所分析的詞語加以辨別，感到确有臆断曲解的地方。例如，王西廂第二本一折"天下乐"：

老夫人掏系的紧，則怕俺女孩兒折了气分。

"气分"一詞乃是"体面"的意义，可是徐士范解作"名分"，王伯良解作"声势"，凌濛初解作"气焰"。反而使得我們迷糊而不知所解了。

但是現在新版的《西廂記》注釋，虽如王季思先生的精博，也有不少使人感到不妥。主要的也是被古人的箋注所眩惑，而粗枝大叶地不加考索所造成的。我就这次校讀所得的实例，擇要說明于后：

一、演撒

王西廂第一本第二折"快活三"：

崔家女艷妆，莫不是演撒你箇老潔郎。

这詞王伯良解作："調侃为有了那个也。"閔遇五《五剧箋疑》云："演撒，有也。教坊市語。"王季思先生云："义未安，勾搭意。"吳曉鈴先生云："挑逗、勾引，本來演撒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的'有'的意思。"都不过拘泥古解而加敷演，并沒有做到切合詞意的分析。案此曲虽为張生与法聰相調侃，但决不能断为"有"或"勾搭"的意义。我在《西游記》中找到一个旁証。《西游記》第四回云：

悟空手疾眼快…他拔下一根毫毛，叫声"变"就变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演"着哪吒，他眞身却一縱赶至哪吒腦后。

文中所謂"演"是"迷惑"的意思。据此，"演撒"也同样含有"迷惑"的意义。"撒"为元人習慣的語尾助詞，并无意义，故"演撒"解作迷着是很确切的。我就此曲試譯为："崔家漂亮的女兒，莫非迷着你这光头哩。"这样措詞的調侃，似乎在事实上与情理上都比較恰当些。又据《乐府群玉》卷三周仲彬《朝天子曲》："演撒，梦撒，告一句知心話。"更足証明"演撒"之不能作"有了"或"勾搭"解。由于"演撒"与"梦撒"相对，那末"演撒"之为"迷着"的意义，也更显然了。

二、即即世世

王西廂第二本第三折"得胜令"：

誰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鶯鶯做妹妹拜哥哥。

这詞在奇妙本、元本、暖紅室本、六十种曲本和新版的《王西廂》一律是"即即世世"。但在王伯良的古本、張深之的正北西廂本、毛西河的論定本和金聖嘆六才子本却都作"积世"。《董西廂》卷二(135頁)、卷三(150頁)也都作"积世"。可知"即即世世"就是"积世"。《元曲选》《謝金吾》剧第二折"感皇恩"曲的"不爭你沉不醒，撇不了即世婆婆"更足証实"即世"确是"积世"。迭为"即即世世"，是元曲詞語的慣例。例如，《玉鏡台》第三折"醉高歌"：

我見他姿姿媚媚容仪，我几曾稳稳安安坐地。

这"姿媚"与"稳安"字字相迭，并不影响詞义。所以"即即世世"是"即世"的迭語，也就是"积世"。

明張深之注云："'积世'犹云'积年'。"故"积世"的箋解也就是"閱世很深，对于世上的一切是很有經驗"的意义。元曲中所指称的"积世婆婆"与董詞的"老人可来积世"，等于現代上海方言指人"奸詐"或"精明"說的"老奸巨滑"。所以《西廂》此曲譯作"誰想到这奸詐的老婆婆却教鶯鶯做妹妹拜哥哥"是適宜的。王季思先生引《誠斋乐府》《小桃紅》剧："他把那即即世世的甜話，引起你涎涎答答的兴"証明为"言語甜蜜"，未免使讀者在思想上多轉一个灣，須从下文"甜"字想当然地猜出来。同时《誠斋乐府》是明代朱有燉的著作，明代人对于金元方言詞語的应用是很隔閡的，我們箋注金元方言詞語單只援引明人用例是不妥当的。

三、梅紅罗軟帘

《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粉蝶兒"：

比及将暖帳輕彈，先揭起梅紅罗軟帘偷看。

此曲乃紅娘替張生送簡，是清晨到达鶯鶯臥室的片段。案宋史《輿服志》：

芳亭輦，前后垂帘，政和之制，以紅罗銷金为額。

金史《輿服志》：

皇后重翟車，有紅罗明金綠紅竹帘。

上引資料虽是說宋金皇家用紅罗作鑾輿之帘，但也可以推想宋金以后，民間也有用紅罗作帘幃的可能，所以"梅紅罗軟帘"这五个字应該看作一个詞組，也就是說，这軟帘是用梅紅色的綾罗來做的。可是王伯良竟把"梅紅罗"与"軟帘"分割，而把梅紅罗訛为紅娘手中的傳簡，而引《翰墨全書》云："元时上表箋以梅紅罗單絞封裹，蓋当时所尚。"无怪凌濛初要譏刺他"胸中有癖，似村学究訓詁《四書》。"把"梅紅罗"解釋为信紙。跟"軟帘"是隨便怎样也連接不上的。但王季思先生也不加思索的引为例証，这未免太信而好古了。

四、閑磕牙

《西廂記》第三本三折"清江引"曲：

沒人处，則会閑磕牙。

中华版《西廂箋証》征引《說文》："磕，石声也，謂石相击之声。…元剧中謂人好言曰磕牙，蓋人語言时齒牙必相击。"如此詳解的結果，始終未曾道出"閑磕牙"的含义。王季思先生解作"閑話也"。吳曉鈴先生解作"說話含有胡吹乱扯的意思"，虽較切合些，但分析还嫌

不够透徹。我以为正确的解釋应該是"誹謗地說是非"，或上海方言的"嚼舌头"的意思。«太平乐府»卷六曾瑞卿自序"滚綉球"曲有句云："見破綻呵閑嗑"（嗑，誤。«雍熙乐府»卷二亦作"嗑"。）可謂"閑磕牙"一語最扼要而妥当的注解。«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观音»"后人評論的好：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軍禁不住閑磕牙。"更可了然"閑磕牙"的含义不只是"閑話"或"胡吹乱扯"而是"誹謗地說是非"的意思了。

王西廂此曲乃張生如約踰牆，鶯鶯变卦翻臉，紅娘心中不平，怪張生怯懦，只会背着人說是道非地埋怨夫人与鶯鶯。我們不加細味玩索，怎知曲文的正确解釋呢！

五、不良

王西廂第四本第一折"上馬嬌"：

不良，会把人禁害。咍！怎不回过臉兒来。

"不良"为"沒良心"，意即"狠心"。王季思先生把"不良"与下句"会"字連文，解作"不賢惠"，并引«魯齋郎»杂剧为証。案，«魯齋郎»楔子"仙吕賞花时"：

你便不良，会可跳塔輪鍘。

此曲应将"不良"逗断，不应作"不良会"。因此曲本事是張珪規劝李四不可任性使气跟豪門魯齋郎斗爭，因为逃不出他的惡势力的范圍。所謂"不良"，是因他受了魯齋郎的欺压而想作反抗的意思，类似現今上海方言的"起狠心"。曲中巍巍之塔和鋒利的鍘刀（宋元时刑具，俗作鍘刀），都是形容可怕的惡势力。跳、輪乃逃越义。故"会"应与"可"接，即"会不会有可能"的疑問語辞。此曲意譯为："即使你狠心的跟他斗，你会不会跳出他的势力范圍呢？"但在王西廂中，这"不良"却另有解釋。"不良"一辞与"可憎"同样为曲語中習見的男女間爱極相詈的反語。例如，白仁甫«御水流紅叶»"二煞："

弄詞章相戏逐，不良才，反字头，去年前将两句相迤逗，暗欢喜，空把他心中爱。

"才"为元曲中詈人語，又同賊。蓋以怨恨薄倖而罵狠心賊也。

«太平乐府»卷七«怨恨»"好观音尾"：

不良煞，教人下不得咒。

意謂狠心煞的，教人恨不得咒罵他。

都是把心爱人罵为"不良"，同于男女間称"冤家"。据此，«王西廂»此曲可譯作："狠心的，你倒会把人作弄啊！嗨！你怎不回过臉来呢？"这样着笔来表白这幕喜剧中的調笑，才覺得逼真自然些。可能作者叫張生罵"不良"是照应前文"賴簡"。

以上举例虽很膚淺，却是新版«西廂»注釋者所未經精詳地分析过的；为了要接受海內学者的宝貴批評，我才写了出来以求指正。

«"乳口"和"鉤窗"»和«談"西廂記"的詞語解釋»讀后

吳曉鈴

先談«"乳口"和"鉤窗"»。

这篇文章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魯迅圖書館館長米列娜·維林格罗娃同志为«中国語文»写的，我們請伊尔同志直接从捷克語原稿譯出。米列娜同志本来还可以提出更多的金元詞义研究結果和我們討論，但是由于忙着做回国的准备，只能赶出这篇短文来。我們感謝她的友誼和关怀。

米列娜同志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中国学研究者，她从事汉語研究，也研究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她把重点放在現代文学，写有分析郭沫若同志的作品的論文，但也研究古典文学。在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过去一年来，她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門从事金、元的諸宮調研究，做为在布拉格的东方研究所同志們集体写作的«中国說唱文学»的一个組成部分。我有机会和她在一起問难質疑，覺得很荣幸，也很得到好处。

这篇短文是她关于«西廂記諸宮調»的語言研究里的两条分析詞义的例子，不难看出，她是在試圖就語法、語音和詞义相互結合来进行分析，并且扩展到有关的其他專业学科的領域的。"乳口"向来沒有較为可从的解釋，有人解釋做"雉堞"，恐怕是推測的成分居多。"鉤窗"則很多人都趋向于就异文"釣窗"寻找解决的途徑，認为就是"吊窗"。那是不正确的。不过，这兒也有一点值得商榷的的地方：从«西廂記諸宮調»的上下文看来，我怀疑"乳口敌楼沒与高"是形容华山的，不是形容黄河的。这虽然不妨碍米列娜同志的解釋，我仍旧願意提出我的看法来。在我讀到譯文的时候才發現这个問題，那时她已經回国了，无法和她当面商榷。

关于«西廂記諸宮調»詞彙研究方面，我知道日本的飯田吉郎先生編制了«董西廂語彙引得»，这个引得

（下轉 183 頁）

成語还是不能随便换字

藍 仲 文

林文金同志在《从性質和特点看成語的范圍》（見《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里面提到成語能不能換字的問題时說：

> 附带提一提的是，初中汉語課本說，成語是不能随便更換字眼的。前面談到成語的特点时，我們为什么不这样提呢？因为成語如“七嘴八舌”“七手八脚”，說“七手八脚”是由“七嘴八舌”更換了字眼而成的也可以，說“七嘴八舌”是由“七手八脚”更換了字眼而成的同样也可以。显然，不能更換字眼的提法不頂恰当。

我覺得林文金同志的这个看法很不恰当。理由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說：一方面是对汉語課本的理解有問題，另一方面是举的例証有問題。

先說前一个方面。这还可以分作两点說。

1）照我个人的体会，汉語課本所說“不能随便換字”并不等于“不能換字”。“不能随便換”似乎可以这样理解：a)一般說是不能換，但在語言發展变化的过程中有例外；b)成語是約定俗成的，你要用就只能照着原样用，不能只憑自己的高兴就更換其中的字。如果我的理解不錯，我覺得汉語課本的說法是与实际符合的。

2）汉語課本是“課本”，而且是供初中学生学習的課本，那么，无論为教学效果着想，还是为汉語規范化着想，我覺得提一下“不能随便換字”都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該的。課本的这个意圖可以从后面的練習里看出来，例如讓学生从“得不償失”和“得不补失”里选一个，練習題的意思是說，“得不償失”里的“償”不能随便換成“补”，因为習慣上沒有“得不补失”的說法，这对学生的学習語言是有好处的。

再說后一个方面。林文金同志是不主張成語“不能随便更換字眼的”，專就这个主張說，对錯很难定，問題在于換到什么程度，或者說，所謂“換”是什么样的“換”。譬如說，“莫名其妙”的“名”換为“明”，这是一种“換”，“千篇一律”的“篇”換为“遍”，这是另一种“換”；如果是前一种“換”，恐怕沒有人說不可以，如果是后一种“換”，恐怕同意的就不多了。——“換”的意义不定，这个問題也就可以不談。

这里应該談談的是林文金同志的“不能更換字眼的提法不頂恰当”所据的理由。林文金同志所謂“換”是“七嘴八舌”換成“七手八脚”，这个論据很有問題。

1）說这类成語是換字而成是沒有根据的。举个相类的例，汉語的合成名詞有不少是按照“起修飾作用的詞或詞素加被修飾的詞或詞素”这个格式构成的，如“火車”“汽車”之类。針对这样的事实，我們說“火車”“汽車”是按照同一个格式构成的，大概沒有人反对；如果不这样說，而說“汽車”是“火車”換一个字构成的，恐怕沒有人会同意。因为拿不出証据来，甲就可以說由“火車”換字而成，乙說由“电車”換字而成，丙說由“汽船”換字而成，結果是永远爭辯不休。“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之类也是如此，如果承認有母子关系，哪个生哪个呢？林文金同志說两可，这是“相生”（你生我，我生你），已經很难理解，如果再拿来“七上八下”“毛手毛脚”“貧嘴恶舌”等等呢？如果想維持相生論，就要乞于純粹的臆断。这样作，臆断就有跑野馬的危險——“九牛一毛”与“九死一生”有相生关系，“大材小用”与“大同小异”有相生关系，“无微不至”与“无所不至”有相生关系，等等。

換字而构成新成語的情形是有的，如“知难而退”換字而成“知难而进”，“无的放矢”換字而成“有的放矢”，“走馬看花”換字而成“下馬看花”。这个換字的痕迹人人看得出来，因为从意义方面看，新成語之所以要这样說，正是为了适应社会發展的需要，在旧成語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七嘴八舌”和“七手八脚”在意义上沒有这样的关系，說这个是由那个換字而成是沒有根据的。

2）这样的換字与汉語課本所謂換字是两回事。汉語課本的意思是說，你要用表示某一意义的某一个成語，你就得照着原样用，不能随你的高兴換其中的字。例如你想用表示“七手八脚”这个意义的“七手八脚”这个成語，你就得写“七手八脚”，不能随你的高兴写为“七手九脚”或者“七手八足”。这是一个成語范圍內的事。林文金同志的“換”（即使这种“換”的說法說得通）就不同了，“七手八脚”这个成語，一換字成了另一个成語“七嘴八舌”。这已經越出一个成語的范圍，談的是两个成語了。两个成語，表示两种意义，尔为你，我为我，專就其中的一个成語說，这里并不存在換字的問題。这样，汉語課本的“換”是一种“換”，林文金同志的“換”是另一种“換”，概念的內容不同，跳出同一律的約束，爭論自然就成为无意义的了。——按照邏輯的推理規律，林文金同志的例証，就其实質說不过是說明，我們的許多成語，其中有些，可以用相同的字，或者說可以用相同的格式而已。

语文短评

558　她退休之后，經过二十年，为着番邦犯境，她勇敢地再担起战斗的任务。（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6日7版）

“为着”就是“为了”，是用来表示目的或动机的介詞。这里用在“番邦犯境”之前，有“給番邦担起战斗任务”的意思，把主語的动机弄反了。“为着”可以改成“因为”；或者說：“为着征討犯境的番邦，她…。”（楊一可）

559　八一队这次比賽为什么失敗，我看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有了十比零的絕对优势而疏忽大意了。（人民日报　1959年2月22日8版）

“为了”是表示一种目的的，这里說明的是失敗的原因，应該把“为了”改成“因为”。（刘喜印）。

560　公社党委研究后，决定从多种經营收入中，抽出将近两万多元，暂借給生活困难的社員添置棉衣。（人民日报　1958年12月18日3版）

“将近两万多元”講不通，只能說“将近两万元”或“两万多元”。（周甚）

561　今年才好說歹說找到老羊倌李凤子大伯讓小秃去当羊伴，伴着老羊倌放着一群不到四十多只羊。（新港　1959年2月号，15頁）

1）有了“四十多”这个数目字，“一群”就用不着了。2）“不到四十多”是多少呢？叫人猜也猜不着。应該說得明白些。（或）删去“多”或“不到”，或两个同时删掉，这只能由原作者决定了。（雨田）

562　这种合金我国除大連、重庆等鋼厂虽已試制成功，但还未大量生产。（中国青年报 1958年9月29日3版）

这一句的意思是說，这种合金仅有大連、重庆等两个鋼厂試制成功，但是还未大量生产。除此以外，再沒有能够生产的了。原句用“除”字，意在表示排除，可是“除”不能和“虽”連在一起构成“除…虽…”的格式，原句也沒有用“除”的必要，应删掉。（雪夫）

563　既然下决心起跑了，就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們不登上那个頂峰。（政治学習　1959年3期）

作者原意是：我們既然下决心要登上那个頂峰，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可是由于多用了一个“不”字，把話說反了。（胡新）

564　他們在我国将赴各地了解和考察中医中藥治疗、痳風及我国痳風病防治工作等情况。（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3日4版）

在“痳風”前用了一个頓号，把“中医中藥治疗”和“痳風”平列起来，致使考察的对象不明确。如果考察的是“中医中藥治疗”及“痳風病防治工作”，則頓号和“痳風”都应該删去；如果是“中医中藥治疗痳風”及“痳風病防治工作”，則应删去頓号。（楊一可）

565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我国相邻的兄弟国家。（解放日报　1958年12月24日5版）

“相邻”是中蒙两国間的关系，应該用表对象的介詞“跟”或“和”，不該用表处所的介詞“在”。（殷之华）

566　一个有远大志向的知識分子，都应該下个决心，把知識与生产劳动結合起来，不断的改造自己的旧習慣、旧思想。（文汇报　1959年1月27日3版）

“一个”只是一个，“都”是对多数而說的，“一个”前加上“每”字就行了。（献力）

567　这本書的出版，不仅对文艺創作工作者，特别是一般业余电影剧本作者均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能帮助广大电影观众提高电影艺术的欣賞水平。（人民日报　1959年2月18日8版）

“一般业余电影剧本作者”是“文艺創作工作者”的一部分，后面不能用“均”，应删去。如果說，“一般业余电影剧本作者”不是“文艺創作工作者”的一部分，就应該删去“特别是”和它前面的逗号，换上一个“和”字。（陈德政）

568　所有調到这个車間来工作的每个工人，都向領导上提出了保証。（解放日报　1958年9月26日1版）

“所有”和“每个”重复，应删一个。（殷之华）

569　但是，美国除了在最近通过給予伊朗四千多万美元新貸款外，华盛頓方面在伊朗答应签訂协定后已表示，“美国不打算給予更多的軍事或經济援助”。（人民日报　1959年2月24日5版）

主語重复，应去掉“华盛頓方面”；如果保留“华盛頓方面”，“美国除…外”就没有着落了。（張正寰）

570　临睡覺时，林紅脫下穿在身上的一件玫瑰色的毛背心遞給道靜。（楊沫：青春之歌，348頁）

“小林，你身体很坏，把这件背心穿在身上吧。”（楊沫：青春之歌，343頁）

“穿在身上的”和“在身”显然都是多余的，为文章簡潔，可以删去。（廷木）

571　你到了徐州，把了解的情况迅即告訴我們。（文汇报　1958年11月24日2版）

“迅即”是文言的两个單詞，这里用得不妥；只要用“迅速”或“立即”就可以了。（沈鴻鑫）

572　詩人爱它，因了它的潔雅不俗；艺术家爱它，因了它的多朵多姿，少女爱它，因了它的玲瓏美丽；恋人們爱它，因了它能够藏起海一样的深情。（人民日报　1959年2月28日8版）

“因了”用起来很別扭，不合汉語规范。可把“因了”改为“因为”。（游仲权）

573　他們也会因为輕微的頓挫，而夸大了黑暗的力量。（讀書　1958年17期，28頁）

“頓挫”一般形容講話时的停頓和声調的变化，用在这里不妥当。可改为“挫折”。（沈鴻鑫）

574　蔣軍对杜勒斯施用压力表示憤懑（文汇报　1958年10月30日4版小标題）

这句話在語法上固然没有毛病，但是語意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釋：一、“施用压力”的是杜勒斯，“表示憤懑”的是蔣軍，二、“表示憤懑”的是蔣軍，“施用压力”的也是蔣軍。如果把“对”改为“因”，或者去掉“对”而把“蔣軍”移在“压力”后，成“杜勒斯施用压力蔣軍表示憤懑”，語意就明确了。（陆琛）

575　其次，請听同学們的意見，絕大多数同学都認为魯迅的“祝福”、毛主席的長征詩、郭老的向地球开战等作品很感兴趣，而对那些什么“向一千个山头进軍”“王家斌”“五亿农民的方向”“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引水上山，丰收万年”“农村調查序言”以及上学期的許多补充教材等等，这正是“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沒有艺术力量的作品”，这些沒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能作为感染学生的教材嗎？（中学教师　1959年1月号，22頁）

1）“很感兴趣”的是“絕大多数同学”，而不是“魯迅的‘祝福’…等作品”，“魯迅的‘祝福’…等作品”在这里只是“絕大多数同学”“很感兴趣”的对象，因此应把“認为”改为表示对象的介詞“对”。2）“向地球开战”是文章的篇名，也应加上引号。3）同学們对“‘向一千个山头进軍’…以及上学期的許多补充教材”的意見究竟怎样，这里没有着落。应在“等等”后面加上說明同学們的意見的詞句，如“则不感兴趣”之类。（向峯）

576　“靜靜的頓河”非常出色地分析了哥薩克之間的阶級关系的对立，描写了革命在哥薩克中間的影响。（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10日8版）

“之間”是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后面表示关系的方位詞，文中只提到一个“哥薩克”，用“之間”是不妥当的。可以把它改作“中間”或“內部”，或者改为“哥薩克各阶級之間的关系对立”。（楊一可）

577　天然气在旱地上出露的时候，往往是庄稼長不好的地方，人們叫它“火燒地”。（解放日报　1958年11月12日2版）

“时候”不是“地方”，更不能称为“火燒地”。可改成：“冒出天然气的旱地，往往是…。”（殷之华）

578　不識字的人要扫盲；懂得多一些的人，就要学得深一些。（人民日报　1959年1月15日6版）

不識字的人是文盲，扫盲是扫除不識字的人。“不識字的人要扫盲”等于說：“不識字的人要扫除不識字的人”，講不通。最好改說：“不識字的人要爭取摘掉文盲的帽子。”（楊一可）

579　明天，师、团实兵合練就开始了。团里讓我参加团指揮所，师制訂的計划想讓我看过，張副参謀長也向我汇报过。（人民文学　1959年2月号，71頁）

1）为了使意思表达得确切，“就开始了”的“就”字后面最好加上“要”字；2）“想讓我看过”一句很含糊，到底是“想讓我看”，还是“已經看过”？揣测文意，似乎要改为：“师制訂的計划已讓我看过”。（王健芝）

580　千里堤上河神庙前，两个个兒象小墩子的銅匠，正从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举起油錘來要砸鐘。（电影劇本创刊号，9頁）

唾沫哪有从手心里吐出来的？可改为：“向手心里正吐了口唾沫”或“正往手上…”。（王存芳）

书刊评介

《汉語拼音詞汇(初稿)》，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詞汇小組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64开，394頁，定价0.80元。

我們从吳玉章主任《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和推广普通話》一文（見《文字改革》1959年第6期)里，可以知道，汉語拼音方案公布一年多以来，文字改革工作在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中，已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和長足的进展。再从《試談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的跃进情况》(《中国語文》1959年3月号)一文里，也可以看到一年来文字改革工作在全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的基础上已經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对語文工作者說来，这个新阶段的任务之一就是怎样加速进行研究和实驗汉語拼音文字。要进行这个复杂而細致的工作，当然需要作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怎样把汉語詞汇用拼音形式初步定型。这本《汉語拼音詞汇》正是适应这个需要而編出的，所以我們对这本書首先表示衷心的欢迎。

汉語拼音文字的研究和实驗，必須同汉語規范化工作密切联系地进行，如果在詞的語音方面沒有一定的規范，便談不到拼写上的定型。这本書的編輯凡例里說，"希望这一本詞汇能够适合汉語規范化的要求，将来逐步發展成为一本汉語拼音文字的詞汇"，这个倡議是应該拥护的。在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中，首要的具体工作就是正字法問題，这个工作需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群众的实践来逐步解决。正字法問題的主要点是：1) 詞的連写，2) 同音詞区分法，3) 外来詞拼写法。現在这本《詞汇》的編写，正体現出这三个主要問題的存在实質。

連写問題实際上也就是如何分詞問題，如果"多数人承認是应当連写的"，当然也就划定了詞；不过，正如《詞汇》凡例中所說，"在目前还不能訂出一套簡單、明确而实用的分詞标准"，所以連写不連写也就成了值得研究的問題。所謂連写，当然指的是各个詞素的拼音字母連起来写，在这一点上，《詞汇》的作法是坚定而徹底的，有些"詞"許多人傾向于分写或認为介乎分合之間的，《詞汇》都毫不犹預地連写起来。我們覚得在大家的意見还沒有統一，分詞的标准还不明确的現阶段，过渡的或者說折中的办法，还是应該考慮进去。如果坚持独用原則来衡量詞的話，这本《詞汇》里所收录的就有許多应該算是詞組，比如，"碍手"、"开爐"、"燙髮"、"套圈兒"，等等，这些动宾詞組是不好認为一个詞的。这比不了"打倒"之类的动补結构，已趋向詞汇化，在人們意念上，动宾結构容易喚起两个詞的概念。对于这种情况，在拼写形式上，可以采取过渡或折中的办法，在两个詞中間加上短杠，如"燙髮"，在連写和分写的两極端中，可以折中写成"tàng-fǎ"。其实，动补关系的也未尝不可以同样处理。短杠的用途在正字法的研究中应該注意到，它不仅可以起詞形的过渡作用，还有区分同形詞、合成詞的功能。

因此，我們認为这本《詞汇》不如干脆收进詞組(当然不是临时搭配的)，① 实用的詞典里不但不排斥詞組，还要大量地收录，因为它的运用很广。

其次，对于所謂区分同音詞問題，这本《詞汇》的处理也表現出目前大家对于同音詞的界說的紛歧。把声調視同声韵一般重要的人們認为，必須是同声同韵同調的才算同音詞，因而說如果将来拼音文字一律标調，同音詞的麻煩可以減少很多；可是标調的手續也够麻煩。把声調視同次要的人們，便反对一律标調；可是难于解决同音詞过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有些是不难解决的。将来正式拼音文字里标調原則問題这里撇开不談，單就如何区分《詞汇》中的同音詞来看，在拼写形式上，有的是可以用兒化来区分的，如《詞汇》(237頁)中的"人員"、"人緣"，两者都写成 rényuán，实際上，"人緣"在口語中兒化的多，如果改写成 rényuár，詞形便区分开了。有的可以用輕声来区別(当然，須有标調的前提)，比如，"精細"(141頁)的"細"口語多讀輕声，那么拼写时不标調，就同"京戏"的拼写形式分开了；同样，"团員"和"团圓"，后者也可这样处理。还有的可以用短杠来解决，如"个人"、"各人"(90頁)，显然，"各人"可以利用短杠，以与"个人"区分；"强暴"和"牆报"(220頁)，后者也可以加短杠。此外，的确有許多是即使标調也无法区分的同音詞，那就应該从另外角度来研究解决了。其实單就《詞汇》所列的同音詞看，有許多是根本不会出現在同一語言环境里的，所以，对拼音文字怎样处理同音詞并不至于一籌莫展。

上面这些問題通过《詞汇》的編写，清楚地說明汉語拼音文字的研究和实驗是十分复杂的，因而需要有科学态度的处理。这所謂科学态度的处理，我們認为，在拼写形式上要遵守語音的原則，也就是在口語里怎样讀就大体上怎样拼写；收录詞汇可以在通用的原則下書面語和口語兼收，因为即使是書面詞，一到口語

里，自然会服从口語的語音規律来讀的，这一点从張洵如同志編的《北京話輕声詞汇》里就可以証明，比如"科学"一詞应該說是書面詞，可是在口語里"科学"的"学"也輕声化了（广播里也可以証明这一点）。以此类推，我們可以肯定，拼写形式服从語音規律，应該是个原則。

再次，在外来詞的拼写方面，这本《詞汇》也給我們提供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材料。这本《詞汇》所收外来詞并不多，仅以"馬克思主义"一詞說，《詞汇》所写形式是 Markszhǔyì（190 頁），这个形式就要引起很多問題：第一，《詞汇》凡例說"这里一般不用大写字母"，因为"大写字母一时还难于确定"，可是这个詞用了大写字母，是表示它为專有名詞么？显然不是，那末何必用大写呢？第二，这个形式是前一半轉写后一半拼写，能不能用这样杂拌兒的形式呢？这是值得研究的。这个外来詞可能是遵循了"分别情况斟酌尺度，名从主人而又主所客便"（見周有光《外来詞拼写法問題》，載《中国語文》1959 年 3 月号）的处理原則来拼写的；可是这同汉語实际的語音原則是有矛盾的。我們看到《中国語文》1958 年 10 月号上發表的《現代汉語詞典編輯凡例》里所举的"样稿"，对外来詞一律是按汉字語音拼写的，那末，"馬克思主义"就要写成"mǎkèsizhǔyì，这对人們的理解和讀音似乎都有一些方便，对"名从主人"的原則也沒有多大違背。"分别情况斟酌尺度"确是必要的，但这多半指的是在約定俗成以前的情况。这就是說，已經約定俗成的不妨服从汉字拼写，未經約定俗成的可以考虑根据外文轉写。这种兼顧办法通过群众的实践自然会慢慢趋于一致，何况再有因势利导的促进工作加以推进呢。

总之，我們对这本《詞汇》所以表示衷心欢迎，主要因为：1）它对目前汉語的詞汇規范工作有所啓發；2）对研究和实驗汉語拼音文字提供有益的材料；3）对广大群众学習汉語拼音字母的拼写方法提供較可靠的依据。此外，也可以为少数民族語文工作者在考虑汉語借詞形式上提供一些参考。正是由于这本《詞汇》有这么多的实际意义，所以我們願意响应《詞汇》凡例中所提出的"大家共同来把这个初稿修訂和再修訂"的号召，把我們一时所看到的問題提出来同《詞汇》的編者商榷。（劳　宁）

《汉語講义（初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集体編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 12 月第 1 版。定价 1.40 元。

在党的領导下，依靠教师和学生的集体力量来編写教材，这是教学改革中的創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集体編写的《汉語講义》的出版，說明了教学改革的重大成就。包括三十八万多字由原来"現代汉語""古汉語""語言学概論"三門課合并編写的教材，只ког了一个半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从講义的內容来看，的确是貫徹了避免重复、厚今薄古、重点突出、系实际的精神。但是，也正由于編写的时間短，各部的分量比例尙需要通过教学实踐来修正；因而粗糙不足的地方也就难免了。同时还因为目前中学課本語法体系也只是暫拟的体系，不少問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对"語言学概論"这門課是單独講好呢，还合并到"汉語"中去講好，也有很多爭論，所以讀者对样一本講义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是很自然的。

首先，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的教材来說，这講义的內容安排过于簡單。把"現代汉語""古汉語""語言学概論"三門課的內容压縮到三十八万字，而在前面还附了一个教学大綱，共四十八頁，占全書字約十分之一左右，这就使某些部分显得特別單薄。講要避免三者之間內容上的重复，这个精神是对的；但避免重复不等于这几門功課就不可能有重点的分工。

講义中取消了"語言学概論"这一名称，在最了"語言学基本理論知識部分"，只用二十二頁，分講"語言的社会本質"和"語言的起源与發展"。我这样的压縮是不够妥当的。編者强調"語言学概論"所講的知識有一些对中学語文教师不是很必要的，而作了大力削减。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将来是中的語文教师，为什么就不必要具备語言学的一般識呢？我認为，过去是沒有我国自己的联系汉語际的語言学理論，現在这一門課正应該在高等学校以新的面貌加强起来，而不是因噎廢食。在高等学中，外語是必修的，語言学理論中也可以在講語法时通过对比来說明汉語語法規律同俄語、英語等些不同。

語言学各部門也不是沒有东西可以講的。而《講义》中講語言的社会本質时，只用一千多字講的結构成分是語音、詞汇和語法。詞汇和語法也引用了斯大林著作中的定义，沒有联系汉語实际（当然吸收苏联語言学理論还是十分必要的）。这然不能指导汉語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比如就基詞汇这一理論来說，《講义》中說到它的特点是：a）何語言中都有基本詞汇；b）詞的稳固性；c）詞的构性。在 a）里說："基本詞汇如'父亲、母亲、人、手、等各种語言的这些詞尽管不相同，却是每种語言都可少的。沒有这些最基本的詞，任何語言都不能成为言，数量虽少，却是最基本的部分。"这样的論点就使难以捉摸到汉語中到底哪些性質的詞属于基本詞汇虛詞算不算基本詞汇呢？汉語的語法关系常常是虛詞来表示的，而各种不同的語言表达語法关系的法是不一样的。至于稳固性和构詞性，《講义》中

有詳細举例說明。再从前面（184—185頁）“現代汉語詞汇的来源”一节中，講固有詞內容中也引用了斯大林的話，“語言的詞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詞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为基本詞汇的核心”。下面又举例說“象‘山’‘火’‘地’‘人’‘中’‘羊’‘大’‘小’‘上’‘下’‘走’‘来’‘在’等最常用的最主要的詞汇是基本詞汇”。既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基本詞汇和根詞的理論，就应該說明白汉語中哪些是根詞，根詞的特点是什么。这里又提出了“最常用”和“最主要”是基本詞汇的两个条件，那末“常用”和“主要”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由此可見，編者一方面要想講明白斯大林的語言学理論，另一方面却生搬硬套地联系汉語实际，因而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汉語的規律。我認为这第三部分有必要好好地修改和充实，甚至还应該恢复“語言学概論”这一名称。所謂联系汉語实际，不等于全部講汉語，主要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

《講义》为了貫徹厚今薄古的精神，因而把古汉語部分也压縮得很少，只用六十七頁。我認为，教学改革的精神是要提高教学質量，批判錯誤的学术思想，“厚今薄古”也就是要古为今用，无論从提高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閱讀能力，接受古典文学的遺产来說，或是从現代汉語的發展过程同古汉語的联系来說，都应該提高古汉語的教学質量。古汉語是一門独立的学科，充实古汉語的教材內容不等于就是厚古薄今。因此，我認为大力削减使教材內容过于簡單是不恰当的。

其次，談一談对現代汉語部分內容的安排。《講义》中采用“語法”和“修辞”二者并重并全面結合的办法是不尽合适的。語法和修辞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是两个不同的內容，正如《講义》中所講的，“語法研究語言結构的規律，是对不对的問題；修辞研究語言表达的效果，是好不好的問題”。我認为把修辞再分为消極修辞和积極修辞也沒有必要。講修辞就是要把思想感情表达得准确、明白、生动，写文章能达到准确、鮮明、生动，就算是掌握了修辞的方法。毛主席的文章可以說篇篇是修辞的范例，不一定再去分哪些修辞格式是积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准确、明白”为什么是消極的呢？

修辞和語法全面結合的最大毛病是不能有重点地講解語法規律和修辞方法，事实上《講义》中是以詞汇和語法为綱，把修辞方法穿插到有关的章节中去。这样，在講詞汇和語法时另另碎碎地加上一些修辞內容，使人感到不系統。例如，講联系动詞“是”放在句子成分中的“表語”后面（24頁），講了用法，接着又講明喻、隐喻的修辞效果，这一节講的是句子成分，講联系动詞的特点和用法已經关系不密切了，又插上去講了一段修辞，扯得实在太远了。全面結合联系实际也不等于不要适当地分工和系統地确定重点。因此在講完語法的基础上再系統地講修辞方法是比較好的。

《講义》中也反映了片面地强調“解决实际問題，对学生写作有所帮助，使学生眼高手也高”。語法修辞当然要指导学生提高运用語言的能力，但是也不單純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指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应該是習作指导課的重点內容；講語法不把語法現象作分析解剖，找出其中的規律来，那末語法就沒有多少东西可講了。《講义》把汉語中表达語法关系很重要的虛詞部分，只用三頁篇幅很簡單地提一下它們的定义、类别和語法特征，虛詞的用法在講到句子成分时陆續出現，既不能突出重点，也缺乏系統。如三个結构助詞“得、地、的”分别在补語、状語、定語中講；介詞在宾語中講几个，在詞組中又講介詞結构的意义；介詞結构的用途却沒有詳細講。这样安排使学生难以全面地掌握汉語虛詞的特点、用法，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联系和区别。

《講义》用大量的病例讓学生分析研究，这是必要的；但是，病例也只能起个反面对比的作用，从反面来說明正面的語言規律，因而正面講解語法規律还应該占主要的地位，多举正面的例句分析講解是很必要的，而《講义》中却忽視了这一点。

最后，談一些关于語法理論的問題。在大綱說明中說：“为了面向中学，語法采用中学課本的語法体系（又不完全受其局限，还要把最新的科学成就吸收进去）。”应該說，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贊同《講义》中某些語法理論上的修改。在《講义》中有很多語法理論的說法不够妥当，有的还前后自相矛盾。例如編者把时态助詞放到“詞的构造”一章中作为构詞的虛詞素（輔助成分）处理，把“着、了、过”与“子、兒、头、性、士、員、者、們”等同样作为构詞成分。这是十分不妥的。构詞成分（詞素）和虛詞是两回事，中学課本把“着、了、过”列为独立的虛詞是比較恰当的。时态助詞不但可以附着在一个詞的后面，也可以附着在詞組后面表示动作、行为、状态的时态的語法意义。“們”也不宜看作构詞成分。如果“着、了、过”作为构詞成分，那末汉語詞典中要多收多少带有“着、了、过”的动詞？《講义》206頁中也写着：“动詞的变化：…b. 加‘着、了、过’等。动詞加上这些时态助詞表示一些附加意义。”这里还是承認“着、了、过”是时态助詞。在247頁划分詞类的标准問題中又說：“动詞…加上附加成分‘着、了、过’表示时态。”由此可見，編者是有些粗枝大叶，并且在理論上有混乱現象。另外我認为象声詞也应該講一講。

“〔附〕划分詞类的标准問題”，放在句子成分后面附带講一下，这更是不妥当，我認为应放在詞法中重点地講，不能用〔附〕的方法一笔带过。

关于一詞多类，詞类轉化問題。《講义》247頁中說：“如‘开’在‘开会’里是动詞，因为它具有动詞的語法特征，在‘开水’里是形容詞，因为它具有形容詞的語法特征。”这里的“开水”是偏正式合成名詞，不应該再拆开来分析“开”是形容詞，它只作为一个詞的构成成分（即詞素），与动詞“开会”中的“开”不能比較。同时，把一詞多类和詞类轉化作为一回事也不一定对头。

下面又說：

> 詞类互相轉化，这是語法發展的必然現象，社会不断發展，新事物不断出現，新事物就需要有新詞来反映，詞为了滿足这种需要，于是一部分的詞的意义和屬性就發生了变化。

把詞类的轉变單純归結为反映新事物的需要是不全面的。詞汇是語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它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主要体現在新詞的产生和旧詞的死亡上，詞义变化也是一个方面。而詞类的演变，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外，更主要的是語法規律的演变；所以应該从語言本身的發展規律中去找原因。比如名詞不能随便轉为动詞，形容詞也不能每个都可以有动詞的用法。这是有关語法規律的。新事物的不断出現也間接影响語法規律的演变，但不是主要的。

講詞类轉化的条件时，《講义》中說：

> 大致說來，名詞如果带得上賓語就轉变为动詞，…动詞前边如果加得上数量詞就变为名詞。如“教育”是动詞，“这一种教育应当注意”里的“教育”又变成名詞了。形容詞的前边如果加得上数量詞时也变为名詞。如“困难”是形容詞，“这一种困难”的“困难”又变为名詞。形容詞后边如果加得上动詞的附加成分“了”“上”“起來”等或带賓語就变为动詞，如“紅”是形容詞，“紅了”又变为动詞。
> 是形容詞，“大起來了”又变为动詞。

这一段話我也不能贊同。1）名詞带賓語作动詞用在現代汉語中是極少数的現象，可以不作为一条来談。中学課本中有动詞和形容詞名物化用法的在动詞和形容詞前面只能带状語，如果带上了定就是名物化的用法了，也就是丧失了动詞和形容某些語法特点，而取得了名詞的某些語法特点。《講中把这种現象叫做“一詞多类、詞类轉化”，这势必汉語詞无定类的理論，在詞典中无法确定詞类了。“动詞、形容詞前边如果加得上数量詞就变为名詞”样的講法显然是片面的。所举例子的用法很难类3）关于形容詞轉化为动詞的問題，在理論上也有且不說这样用法到底是否轉化了詞类，这里所講“加得上动詞的附加成分‘了’‘上’‘起來’等或带就变为动詞”，把时态助詞“了”又叫作动詞的“成分”，它到底同前面講的“輔助成分”（詞素）又么不同？前面动詞附类中講“上”“起來”等是趋詞，这里又叫作动詞的附加成分，名称也不一致向动詞是实詞（有虛化現象），附加成分算不算詞呢？

綜合上面所談的几点来看，作为高等学校的講义”还是比較粗糙的，缺点也比較多。特别是語析中正面例句用得少，分析語言現象过于簡單，理述的某些部分不够确切，文句不妥的地方也不少。是，我相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汉語講編写組的同志，一定能够进一步修改而达到比較的地步的。（黃浩森）

成語性謂語新例

赵生明

黃再春同志在《成語做謂語的句法功能》一文中（見《中国语文》1958年10月号）談到“成語性謂語的时态变化”时，認为“时态助詞中用‘了’来表示的較多，但用‘了’时，往往需要带有賓語或补語。…如果不带补語和賓語，就站不住脚”。这个論断恐怕也“站不住脚”，因为我在《毛澤东选集》和初中《文学》課本中發現，凡是用“了”表示时态的成語性謂語，都沒有带賓語或补語。下面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 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嗎？（文，四，88）
> …总之，德国法西斯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毛澤东选集，三，937）
> 剛才的一点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了。（文，二，214）
> 詩人当时眞是走投无路了。（文，三，27）
>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毛澤东选集，二，788）
>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文，六，24）

此外，还有些同样用法的例子，不必多举。这类带时态助詞“了”的作謂語的成語，其內部結构也分析即可自明。这里只是証明：各种結构的动詞、詞性的成語做謂語时，一般可以用助詞“了”来表态；“不带补語和賓語”，不但可以站住脚，而且是正常的現象。

語言学名詞解釋（七）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編

80 音高 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定时間內音波数或發音体顫数不一样就产生音高的不同。音波数或發音体顫动多的，音就高，反之則低。在每秒鐘內能發出的音波或發音体顫动数又叫做频率。如果有甲、乙两个音，音在每秒鐘內顫动一百次，乙音在每秒鐘內顫动一五十次，那么我們就說乙音的频率比甲音大，乙音比音高。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音高是由于人类声带的長、松、紧、厚、薄不同而产生的。声带長、松、厚，音就，声带短、紧、薄，音就高。人类声带是天生的，无法以改变，但松、紧却可以自由控制，因此同一个人發的音可以有高低的不同。

音高是构成語音的四要素（音質、音高、音長、音之一。在某些語言中，不同的音高有区别意义的作，例如汉語中的声調就是这样。汉語中“媽”“痲”“罵”四个詞的音質、音長、音重基本上都是一样，但由于音高变化所构成的声調不同，詞义也完全不。大部分語言还利用音高变化表达不同的感情。

語音学所研究的音高不是單純的物理現象或生理象，而是結合了一定意义的語音現象；所以單純由于带构造不同（如男人的声带一般較長，女人的声带一較短等），或高声說話时与低声說話时产生的音高变就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陈）

81 音重 音重又称音强或音势。音重指声音的强弱或輕重，通俗些說，就是發音时用力大小，用力大則音重，反之就輕一些。声音的强弱决于音波振幅（詳見振幅条）的大小。人类語音的弱和發音器官的紧張程度以及發音时气力的大小成比。

音重也是构成語音的四要素之一。在很多語言中用音重的不同构成重音，而重音的不同往往可以区詞汇意义或語法意义。例如在俄語中，мука́（面粉）му́ка（痛苦）詞义不同，стра́ны（国家，复数第一格）раны́（国家，單数第二格）語法意义不同，这些区别是运用音重所构成的重音来体現的。在句子中把某詞特别讀得重一些，还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和調这些詞的意义。（陈）

82 音位 从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出来的声音現象，在不同的語言中可以不同地加以处理。有些現象在这一种語言中需要区别，而在另外一种語言中却可以不加区别。例如在汉語中“壩”[pa]这个詞决不可以念成[p'a]，因为这样念，它就成了另外一个詞——“怕”。但是我們把它念成[ba]却不会引起詞义上的誤解。在俄語中却正相反，例如 палка [palka]（棍兒）中的[p]决不可以念成[b]，因为这样会使得别人誤解为另一个詞——балка [balka]（洼地），但是我們把 палка 中的[p]念成[p']却不至于引起詞义的誤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語音現象是一种社会現象，不能單純从物理学或生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們。我們所研究的是結合着一定詞汇意义或語法意义的声音現象，这些在某种語言（方言）中能够和别的声音在区别意义作用上有所不同的声音單位叫做該語言（方言）的音位。例如[p]和[p']是汉語中的两个音位，[p]和[b]是俄語中的两个音位；而[p]与[b]在汉語中沒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不能算做两个音位，[p]与[p']在俄語中沒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也不能算做两个音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語言中所有的每一个音素在一个具体的語言（方言）中不見得都是一个音位，而某个語言（方言）的一个音位常常包含了好几个音素（有时也可能只是一个音素），其中往往有一个是主要的，别的音素則是这个主要音素的不同变体。例如汉語中的[t]輔音，它在“都”[tu]中受[u]的影响而圓唇化，在“大都市”[tatuʂʅ]这个詞組中，[a]和[u]中間的[t]受前后元音的影响而濁化，在“顛”[tiɛn]这个詞中受元音[i]的影响而顎化…，这些圓唇化的[t]、濁化的[t]、顎化的[t]都是[t]的变体。一个語言（方言）中所有的音位和音位之間的組合規律构成該語言（方言）的音位系統。（陈）

83 音質 音質又称音色。音質同音高、音長、音势（音重）不同，它是声音的質素或个性。我們用同样的音高，同样的强弱和長短来發 a 和 u，仍然能發現它們有显著的不同，原因就是 a 和 u 有不同的音質。

从声学的观点說，音質就是顫动形式的不同，或者說是由于音波的式样不同，波紋的曲折不同。而音波形式的不同，則是隨着基音与陪音（副音）之間的强弱

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在單純音中，无所謂音質的不同，一般所謂音質不同，都是指复合音而言。

在复合音中，基音与陪音(副音)的强弱是不成單純比例的，有的复合音陪音强，有的复合音陪音弱，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产生不同音質的各种复合音。

音質的差别是由下面几方面产生的：1）發音体的不同，2）發音体發音的方法不同，3）物体發音的自身所具有的状况不同，或發音以后所遇到的环境不同。語音中音質的变化，由于人体口腔状况可以任意变化，鼻腔开閉和咽头緊松也可以自由控制，所以語音音質的复杂多样，不是任何乐器所能比拟的。（何）

84 成阻 發音动作仔細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成阻期(又叫音首期)、持阻期(又叫緊張期)、除阻期(又叫音尾期)。成阻期是發音过程的第一阶段。当我們要發某一个音时，必須使發音器官發生接触或使口腔形成某种形式的共鳴器，借以构成發音状态。例如發[p]音时，我們首先要把上下唇合攏起来，把口腔閉住，这种作用，語音学上叫做"成阻"，这一过程就叫做成阻期。

就一般情况說，每个音都具有成阻，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或受前后音节影响的条件下，成阻期就可能不存在。如 assa 中的第二个 s，因为第二个 s 所需要的位置已由第一个 s 准备好了。又如我們閉着双唇休息时开始發[p]音，就不要第一阶段器官的閉塞，因为这个姿势已形成了。（何）

85 持阻 持阻是發音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形成成阻状态以后到結束發音作用，恢复正常状态之前經过的持續肌肉緊張的阶段。如我們發[p]音时，无論从开唇或閉唇开始，都可以感覺到有許多緊張的动作：上下唇緊緊地閉攏，隔膜、喉头、舌头都在用力，把空气挤到双唇后面，最后产生破裂作用。成阻和除阻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不存在，而持阻却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缺少的。

就閉塞音說，持阻期是口腔的完全閉塞，除了有声閉塞音在持阻期內混合有声带顫动的微弱声音外，純粹的閉塞音的持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产生在成阻期或除阻期，或同时产生在成阻和除阻期，除了它的除阻期不存在外，一般的都产生在除阻期。

元音的持阻期是結合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共鳴器的肌肉緊張的；摩擦音的持阻是口腔持續收斂，讓口腔保持一条狹縫，使空气流出，發生摩擦声音。元音和摩擦音在成阻和除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正好产生在持阻期。（何）

86 除阻 除阻是發音过程的最后阶段。当發音动作完成以后，發音器官由發音状态变为其他状态就叫除阻。閉塞音的除阻是个破裂动作或是單純的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元音和摩擦音的除
是开口度的增减或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

在一定条件下，除阻阶段也可以不存在。如
中的第一个 s，因为第二个 s 的成阻期正和第一个
除阻期緊緊結合在一起，用不着除阻。又如广州
[lap](立)，閉塞以后不發其他开口音，嘴唇用不
打开，因而就省去了除阻阶段。（何）

87 同形詞 同形詞(又称同書詞)是語言中意
同，發音不同，而只是写法相同的
例如汉語同一个"好"字，有时念 hǎo 是"好坏"的
的意思，如"好人"、"好事"，等等；有时念 hào 是"
的意思，如"好看小說"。同一个"恶"字，有时念
"善恶"的"恶"的意思，如"恶霸"、"罪恶"，等等；有时
wù 是"討厭"的意思，如"好逸恶劳"。俄語 замок
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城堡"的意思，第二个音
重音时是"鎖"的意思；выкупать 一詞第一个音节
音时是"洗澡"的意思，第三个音节念重音时是"
的意思。英語 content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
"內容"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使滿足"的
思；contrast(对比，对照)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
名詞，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动詞；等等。

同形詞和同音詞不同，虽然它們都是同一个
形式表示不同的意义；但是同音詞无論發音和写法
完全相同，而同形詞只有写法相同，發音却并不完全
同，所以不能把它們混为一談。

同形詞的來源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都
声調或重音。汉語有些同形詞是由于語音演变
果，例如同一个"重"字有时念 zhòng，有时念 chóng
那就是因为受了声調不同的影响。这些同形詞改
音文字后就不是同形詞了。（岑）

88 等音詞 語言中意义不同、写法不同而發
同的詞叫做等音詞，如汉語的"
和"枇杷"，"权利"和"权力"；① 俄語的 плод(果实)
плот(木筏)，вести(引导)和 везти(搬运)；英語
write(写)和 right(正确，权利)，night(夜)和 knight
(武士)；等等。

等音詞实际上就是一种同音詞，但是也有它的
的特点。同音詞是意义不同而發音和写法都完全相
的詞，如汉語的"詞"(語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
的最小單位)和"詞"(一种長短句押韵的文体)，俄語
ключ(鑰匙)和 ключ(源泉)，英語的 can(罐头)和 can
(能够)，等等；而等音詞虽然發音相同，可是写法并
相同。

---

① 汉語的这些詞改用拼音文字时若不在写法上加以区
别，将成为同音詞。

等音詞的來源有：1)由于發音上的偶合，而在写法故意加以区别，如汉語的“琵琶”和“枇杷”；2)由于發上的历史演变，如汉語的“权利”和“权力”，英語的rite和right，night和knight，古音并不相同，以后变成相同了；3)由于發音上的有規則的变化，如俄語од的д是詞末濁輔音，照例应念成清音，везти的з为т所同化而变成清音，这样一来，在發音上就跟от和вести沒有分別了。

等音詞有些由于音位上和語法上的关系，在語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等音詞太多将会造成混乱，增加習上的困难，須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改革。(岑)

89 直譯詞 一种語言向另一种語言借詞，如果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接翻譯过来的叫直譯詞。譯音的多半是通过口头交談的，譯形的多半通过書面語言的。各种語言的發音習慣各不相同，到有些音是本語言所沒有的，那么常会用一个近似音去代替它。例如汉語沒有[r]这个顫音，所以把oma譯成Luoma(罗馬)，日本語沒有[l]这个边音，以把London譯成Rondon(倫敦)，这在語音学上做“語音代替”。譯形的詞，各种語言的念法也不尽同。例如英語的ball(球)本来念[bɔl]，而法語直譯却把它念成[bal]。

汉語直譯詞有全譯的和非全譯的两种。全譯的直詞是把整个詞的發音或形式全部譯出的，如“德謨克西”(譯自英語democracy)，“俱乐部”(譯自英語ub)，等等；非全譯的直譯詞却只譯出原詞的一部分，把英語的America譯为“美利坚”，俄語的трактор为“拖拉机”，等等。全譯直譯詞有时可以减縮，如把陀”减縮为“佛”，有时减縮后还加上一个类名，如把法兰西”减縮为“法”再加上一个“国”成为“法国”，这就成了縮写复合詞。(岑)

90 仿譯詞 一种語言向另一种語言借詞，不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譯，而是仿照它的义翻譯过来的叫做仿譯詞，例如汉語把俄語的пилетний план譯为“五年計划”，德語的Übermensch为“超人”，等等。仿譯詞多只限于一般名詞，但个别有名詞也可以采用仿譯法，如把英語的Oxford譯“牛津”；至于把Cambridge譯为“劍桥”或“康桥”，是一半直譯，一半仿譯的。

仿譯詞可以使原意比較容易了解，但是必須能够实反映原詞的意义，沒有适当的詞語可用的不如采直譯。尤其是在各种語言中有些复合詞和成語是不照字面仿譯的。从前有人把英語的milkway(天河)成汉語的“牛奶路”，鬧了很大的笑話，英語to rain ts and dogs是“大雨滂沱”的意思，如果照字面把譯成“降下許多猫和狗”，那就簡直不象話了。(岑)

91 社会学学派 語言学中的社会学学派主要在法国形成，因此又称为法兰西学派，这一学派的語言学的理論基础来自瑞士的語言学家索緒耳(F.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在法国住了很久。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是法国的梅耶(A. Meillet 1866—1936)和他的学生方德里耶斯(J. Vendryès)。这一学派从語言的社会观点出發，認为人类的語言是“社会事实”。他們所謂的“語言事实”是根据法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eim)所說的“集体心理学就是全部社会学”，因此所謂“社会事实”就是一种社会心理現象，索緒耳就把語言說成是“以每个人脑中所儲存的印象的总和的形式在集体中存在着”。这就把語言学看成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索緒耳并且根据这理論把語言和言語对立了起来，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辯証統一的关系。

語言学应該研究什么呢？根据索緒耳提出的“語言系統”理論以及把語言学分成了“历时語言学”和“同时語言学”，梅耶認为过去的历史比較法只解决了个别特殊語言事实而沒有解决“語言系統”。因此他强調用历史比較法去研究“已經为历史所証实了的語言間的对应”，也就是說比較法应該研究現代語言，因为要研究系統必須研究必要的語言事实，于是“同时語言学”被提到了第一位，而且同“历时語言学”割裂开来。

社会学学派認为語言是一种“社会机构”，因此要了解語言变化必須联系社会的变化才有可能，梅耶在《詞怎样改变意义》的論文里認为詞的使用范圍从大的社会集团进入小的社会集团，它的意义就縮小了，相反就扩大了。

社会学学派曾經在語言学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譬如語言和言語的关系，历时語言学和同时語言学，語言系統和語言的符号性問題，这些对以后語言学的研究都是有貢献的。但是由于这一学派是在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因此对于許多問題不能有正确的理解，其中尤其是反历史主义这一观点，是我們必須坚决反对的。社会学学派的理論在我国影响相当大，徹底批判这一学派的錯誤理論以及它对我国語言研究的影响，将是我国語言学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务。(赵)

92 結构主义 結构主义是二十世紀新兴的一个語言学的流派。它的理論基础主要是来自瑞士的語言学家索緒耳。索緒耳認为語言学应該研究語言的結构，也就是音素和意义所形成的关系。1929年布拉格語言学会的特魯别茨科伊第一次把这理論运用到語音的研究上，也就是把語音音素看做是关系要素的“音位学”。1939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也出現了結构主义，它們的刊物是《語言学学报》

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在單純音中，无所謂音質的不同，一般所謂音質不同，都是指复合音而言。

在复合音中，基音与陪音(副音)的强弱是不成單純比例的，有的复合音陪音强，有的复合音陪音弱，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产生不同音質的各种复合音。

音質的差別是由下面几方面产生的：1) 發音体的不同，2)發音体發音的方法不同，3)物体發音的自身所具有的状况不同，或發音以后所遇到的环境不同。語音中音質的变化，由于人体口腔状况可以任意变化，鼻腔开閉和咽头紧松也可以自由控制，所以語音音質的复杂多样，不是任何乐器所能比拟的。(何)

84 成阻 發音动作仔細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成阻期(又叫音首期)、持阻期(又叫紧張期)、除阻期(又叫音尾期)。成阻期是發音过程的第一阶段。当我們要發某一个音时，必須使發音器官發生接触或使口腔形成某种形式的共鳴器，借以构成發音状态。例如發[p]音时，我們首先要把上下唇合攏起来，把口腔閉住，这种作用，語音学上叫做"成阻"，这一过程就叫做成阻期。

就一般情况說，每个音都具有成阻，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或受前后音节影响的条件下，成阻期就可能不存在。如 assa 中的第二个 s，因为第二个 s 所需要的位置已由第一个 s 准备好了。又如我們閉着双唇休息时开始發[p]音，就不要第一阶段器官的閉塞，因为这个姿势已形成了。(何)

85 持阻 持阻是發音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形成成阻状态以后到結束發音作用，恢复正常状态之前經过的持續肌肉紧張的阶段。如我們發[p]音时，无論从开唇或閉唇开始，都可以感覺到有許多紧張的动作：上下唇紧紧地閉攏、隔膜、喉头、舌头都在用力，把空气挤到双唇后面，最后产生破裂作用。成阻和除阻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不存在，而持阻却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缺少的。

就閉塞音說，持阻期是口腔的完全閉塞，除了有声閉塞音在持阻期內混合有声带顫动的微弱声音外，純粹的閉塞音的持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产生在成阻期或除阻期，或同时产生在成阻和除阻期，除了它的除阻期不存在外，一般的都产生在除阻期。

元音的持阻期是結合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共鳴器的肌肉紧張的；摩擦音的持阻是口腔持續收斂，讓口腔保持一条狭縫，使空气流出，發生摩擦声音。元音和摩擦音在成阻和除阻期是沒有声音的，它的声音正好产生在持阻期。(何)

86 除阻 除阻是發音过程的最后阶段。当發音动作完成以后，發音器官由發音状态变为其他状态就叫除阻。閉塞音的除阻是个破裂动作或是單純的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元音和摩擦音的除阻是开口度的增减或發音器官的休息放松。

在一定条件下，除阻阶段也可以不存在。如 as[sa] 中的第一个 s，因为第二个 s 的成阻期正和第一个 s 的除阻期紧紧結合在一起，用不着除阻。又如广州話 [lap](立)，閉塞以后不發其他开口音，嘴唇用不着打开，因而就省去了除阻阶段。(何)

87 同形詞 同形詞(又称同書詞)是語言中意义不同，發音不同，而只是写法相同的詞。例如汉語同一个"好"字，有时念 hǎo 是"好坏"的"好"的意思，如"好人"、"好事"，等等；有时念 hào 是"爱好"的意思，如"好看小說"。同一个"恶"字，有时念 è 是"善恶"的"恶"的意思，如"恶霸"、"罪恶"，等等；有时念 wù 是"討厭"的意思，如"好逸恶劳"。俄語 замок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城堡"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鎖"的意思；выкупать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洗澡"的意思，第三个音节念重音时是"贖回"的意思。英語 content 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內容"的意思，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使滿足"的意思；contrast(对比，对照)一詞第一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名詞，第二个音节念重音时是动詞；等等。

同形詞和同音詞不同，虽然它們都是同一个語言形式表示不同的意义；但是同音詞无論發音和写法都完全相同，而同形詞只有写法相同，發音却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們混为一談。

同形詞的来源是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都不标声調或重音。汉語有些同形詞是由于語音演变的結果，例如同一个"重"字有时念 zhòng，有时念 chóng，那就是因为受了声調不同的影响。这些同形詞改用拼音文字后就不是同形詞了。(岑)

88 等音詞 語言中意义不同、写法不同而發音相同的詞叫做等音詞，如汉語的"琵琶"和"枇杷"，"权利"和"权力"；① 俄語的 плод(果实)和 плот(木筏)，вести(引导)和 везти(搬运)；英語 write(写)和 right(正确，权利)，night(夜)和 knight(武士)；等等。

等音詞实际上就是一种同音詞，但是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同音詞是意义不同而發音和写法都完全相同的詞，如汉語的"詞"(語言中代表一个概念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單位)和"詞"(一种長短句押韵的文体)，俄語 ключ(鑰匙)和 ключ(源泉)，英語的 can(罐头)和 can(能够)，等等；而等音詞虽然發音相同，可是写法并不相同。

---

① 汉語的这些詞改用拼音文字时若不在写法上加以区別，将成为同音詞。

等音詞的來源有：1)由于發音上的偶合，而在写法上故意加以区别，如汉語的“琵琶”和“枇杷”；2)由于發音上的历史演变，如汉語的“权利”和“权力”，英語的write和right，night和knight，古音并不相同，以后演变成相同了；3)由于發音上的有規則的变化，如俄語плод的д是詞末濁輔音，照例应念成清音，везти的з因为т所同化而变成清音，这样一来，在發音上就跟плот和вести沒有分别了。

等音詞有些由于音位上和語法上的关系，在語言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等音詞太多将会造成混乱，增加学習上的困难，須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改革。(岑)

89 直譯詞 一种語言向另一种語言借詞，如果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接翻譯过来的叫直譯詞。譯音的多半是通过口头交談的，譯形的多半通过書面語言的。各种語言的發音習慣各不相同，遇到有些音是本語言所沒有的，那么常会用一个近似的音去代替它。例如汉語沒有[r]这个顫音，所以把Roma譯成Luoma(罗馬)，日本語沒有[l]这个边音，所以把London譯成Rondon(倫敦)，这在語音学上叫做“語音代替”。譯形的詞，各种語言的念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英語的ball(球)本来念[bɔl]，而法語直譯却把它念成[bal]。

汉語直譯詞有全譯的和非全譯的两种。全譯的直譯詞是把整个詞的發音或形式全部譯出的，如“德謨克拉西”(譯自英語democracy)，“俱乐部”(譯自英語club)，等等；非全譯的直譯詞却只譯出原詞的一部分，如把英語的America譯为“美利坚”，俄語的трактор譯为“拖拉机”，等等。全譯直譯詞有时可以减縮，如把“佛陀”减縮为“佛”，有时减縮后还加上一个类名，如把“法兰西”减縮为“法”再加上一个“国”成为“法国”，这就成了縮写复合詞。(岑)

90 仿譯詞 一种語言向另一种語言借詞，不是把它的發音或形式直譯，而是仿照它的意义翻譯过来的叫做仿譯詞，例如汉語把俄語的пятилетний план譯为“五年計划”，德語的Übermensch譯为“超人”，等等。仿譯詞多只限于一般名詞，但个别专有名詞也可以采用仿譯法，如把英語的Oxford譯为“牛津”；至于把Cambridge譯为“劍桥”或“康桥”，就是一半直譯，一半仿譯的。

仿譯詞可以使原意比較容易了解，但是必須能够真实反映原詞的意义，沒有适当的詞語可用的不如采用直譯。尤其是在各种語言中有些复合詞和成語是不能照字面仿譯的。从前有人把英語的milkway(天河)譯成汉語的“牛奶路”，鬧了很大的笑話，英語to rain cats and dogs是“大雨滂沱”的意思，如果照字面把它譯成“降下許多猫和狗”，那就簡直不象話了。(岑)

91 社会学学派 語言学中的社会学学派主要在法国形成，因此又称为法兰西学派。这一学派的語言学的理論基础来自瑞士的語言学家索緒耳(F.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在法国住了很久。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是法国的梅耶(A. Meillet 1866—1936)和他的学生方德里耶斯(J. Vendryès)。这一学派从語言的社会观点出發，認为人类的語言是“社会事实”。他們所謂的“語言事实”是根据法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eim)所說的“集体心理学就是全部社会学”，因此所謂“社会事实”就是一种社会心理現象，索緒耳就把語言說成是“以每个人脑中所儲存的印象的总和的形式在集体中存在着”。这就把語言学看成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索緒耳并且根据这理論把語言和言語对立了起来，忽視了二者之間的辯証統一的关系。

語言学应該研究什么呢？根据索緒耳提出的“語言系統”理論以及把語言学分成了“历时語言学”和“同时語言学”，梅耶認为过去的历史比較法只解决了个别特殊語言事实而沒有解决“語言系統”。因此他强調用历史比較法去研究“已經为历史所証实了的語言間的对应”，也就是說比較法应該研究現代語言，因为要研究系統必須研究必要的語言事实，于是“同时語言学”被提到了第一位，而且同“历时語言学”割裂开来。

社会学学派認为語言是一种“社会机构”，因此要了解語言变化必須联系社会的变化才有可能，梅耶在《詞怎样改变意义》的論文里認为詞的使用范圍从大的社会集团进入小的社会集团，它的意义就縮小了，相反就扩大了。

社会学学派曾經在語言学中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譬如語言和言語的关系，历时語言学和同时語言学，語言系統和語言的符号性問題，这些对以后語言学的研究都是有貢献的。但是由于这一学派是在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因此对于許多問題不能有正确的理解，其中尤其是反历史主义这一观点，是我們必須坚决反对的。社会学学派的理論在我国影响相当大，徹底批判这一学派的錯誤理論以及它对我国語言研究的影响，将是我国語言学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务。(赵)

92 結构主义 結构主义是二十世紀新兴的一个語言学的流派。它的理論基础主要是来自瑞士的語言学家索緒耳。索緒耳認为語言学应該研究語言的結构，也就是音素和意义所形成的关系。1929年布拉格語言学会的特魯別茨科伊第一次把这理論运用到語音的研究上，也就是把語音音素看做是关系要素的“音位学”。1939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也出現了結构主义，它們的刊物是《語言学学报》

(Acta Linguistica)，同时在美国也出現了“描写語言学”派的結构主义。

結构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注意研究語言結构中各成分之間的关系，而且这些成分只能看作是对应关系中的因素。对于結构主义者說来，語言成分的本身，例如語音或是語义的本身并不是語言学所要研究的，它們只是輔助的、次要的因素。譬如汉語的“藍”和“淺藍”在德語中是“blau”，从意义本身來說，“藍”和“淺藍”这两种意义对世界上一切語言說来都是一样的，这对于語言学來說沒有意义，也不必研究。但是德語只用一个“blau”来表示，而汉語却用“藍”和“淺藍”两个形式(或“語言成分”)来表示，这种不同的关系却是語言学所要研究的。以上純粹意义的部分，結构主义者称之为“非語言学的”，而其后关于意义和形式間的关系則是“語言学”的。区別这二者，对結构主义者說来是重要的，因为这样一些音素和意义間的关系就是“語言結构”，也就是根据这样一种理論，所以我們称它为結构主义語言学。

傳統的語言学是采用归納法的。結构主义采用的是演繹法，但是它有三条原則:

1)同类性原則，也就是以同类性質的事实說明另一些事实。

2)一貫性原則，也就是只要論証时所采用的某种理論是正确的，那么它所得出的結果也必定是正确的，不必再要用事实或經驗来証明。这种演繹法也叫做“思維实驗”。

3)統一性原則，根据这原則就必須把所研究的对象各个方面統一起来，使它成为同形的一般規律。

結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很复杂，它同以下一些哲学思想有关:德国哲学家胡賽尔的現象学，同数理邏輯理論相結合的德国和美国完形派心理学，邏輯实証論和意义学(奥国哲学家卡尔納普，英国哲学家罗素等)，美国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和新实証主义等。由于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所沾染的色彩不同，因此就使得各种的結构主义也有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派別。其中主要的有三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語言学派(請分別参看这三条名詞解釋)。这些派別虽然有着某些差异，但基本任务——不联系历史發生学的方面，形式地描写一种語言的結构，則是共同的；而且共同的趋向是純粹以功能观点分析語言事实。他們之間甚至可以說是相互补充，使結构主义語言学成为一个完整的統一的語言学理論。

結构主义語言学家的特点是对語言事实作了詳細的描写和系統化，但是为了同傳統語言学区別，他們使用了許多使人难懂的一些复杂的术語和公式，結构主义的研究对一些实际問題的解决提供了理論基础，如机器翻譯、字母表和正字法的制訂，等等；是結构主义者离开了一些語言事实和使用該語言的历史，这是違反馬克思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联的語言学界曾專門对这一学派进行了比較長时討論，但是至今对这一学派应有的精确的評价尚最后的結論。我国語言学界对这一新的流派也应重視，并以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和正估价。(赵)

93 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是結构主义語中的一派。它是在 1926 年成的。当时主要代表人有馬德修斯 (V. Mathesius)、特魯別茨科伊 (Н. Трубецкой)、斯卡列契卡 (B. Cличка)、卡尔采夫斯基 (С. Карцевский)、雅各(R. Jakobson)。这些代表人的立場和理論并不全一样的。他們在 1929—1939 年办起自己的«布拉格語言学学会学报»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gue de Prague)，其中主要的論文都闡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論。

布拉格結构主义語言学的綱領，主要表現在期«布拉格語言学学会学报»的“綱目”(Thèses)中，中給語言下的定义是“表达的适当的手段的系統”。不仅强調断代語言系統的性質，也提出应联系追寻历史的演变。除了历史比較法外，他們还提“分析比較法”，他們并且把語言学分为詞的学說法單位論来代替傳統的形态学和造句法。

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緒耳的基本理論，这就和結构主义的另一派——哥本哈根学派有共同点，就是說，应該把語言的音素和意义作为相关的要研究。因为結构主义的共同点是，認为語言中的只由于有了其他現象的对立才存在。但是，布拉派同哥本哈根学派也有不同之处:

1) 布拉格学派不忽視語言实际，他們把語言認識語言以外現象的手段;

2) 布拉格学派認为語言与現实是二者不可現象，所以研究語言应該联系它同文学、艺术、文关系;

3) 同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叶姆斯列同，布拉格学派承認研究語言結构时对立的意义，認为語言成分依靠外界而存在;

4) 把語言看成是同現实事物有直接联系的符号系統，因此，布拉格学派認为語言有不同的功文体。

此外，在区別“語言学”与“非語言学”的原則上拉格学派同哥本哈根也有区別: 哥本哈根学派把式”表示語言学方面，也就是說应該詳尽地記录音系和語法体系的單位的分配关系; 布拉格学派認

不是唯一的标准，还应該考虑到"分化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結构主义中的美国描写語言学派同哥本哈根学派是一致的。

布拉格学派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意文学語言，但是它把文艺語言同用于其他方面的語言脫离开来了。（赵）

94 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結构主义中的一个学派。它是1939年在哥本哈根成立的。当时他們創办了一个国际性的杂志《語言学学报》(Acta Linguistica)，副題是"結构主义語言学杂志"。主編是布龙达尔(Viggo Brøndal)和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这个杂志上許多綱領性的論文里写着結构主义的基本原理。1942年布龙达尔死后，丹麦的結构主义就以叶姆斯列夫为首。他的語言学理論称为"語言單位論"(glossematics)，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他主要的著作有《語言学原理導論》(Omkring sprogtheoriens grundlæggolse, 1943)，1950—1951年他在《Acta Linguistica》上發表了《語言学中結构分析方法》，他在这篇論文里闡述了他的基本理論。

叶姆斯列夫發展了索緒耳的符号学說。索緒耳認为語言只是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統，原則上它和其他任何符号系統都是一样的。这一符号系統所特有的不是实际存在的符号本身而只是这些符号之間的关系。叶姆斯列夫在这基础上認为語言只是一种由內容和表达构成的符号，它是內在地存在的，也就是說語言符号不依賴于語音和現实世界而存在，甚至于符号是第一性的，而現实世界是第二性的。因此他們所研究的不是語言結构而是抽象的关系結构。而在对这样一种語言系統描写时認为不必依賴經驗，而只以結构本身的內部邏輯为条件作最簡單的、全面的、沒有矛盾的描写。为了区别于傳統的語言学，叶姆斯列夫把他的語言学称之为"語言單位論"，而且其中采用了許多复杂的邏輯术語来代替一般的語言学术語，甚至常常用一些同数学很相近的符号系統来代替傳統的术語。总之，哥本哈根学派是要建立一种沒有空間和时間限制的、純粹关系的一般和抽象的系統，实际上他們是离开了語言科学的范圍，在方法上同唯心的实証主义是很接近的。

这一学派同結构主义的另一学派——美国描写語言学是很相同的，其共同点有以下几点：

1）語言和思維以及用这語言的人民的历史是无关的，它只依賴于自己的結构；

2）他們都不承認詞的重要性；

3）他們要求脫离傳統語言学的概念并且把自己的語言学和以往語言学的發展对立起来，并認为傳統的語言学已經过时了；

4）純粹实用的特点，术語很复杂、难懂，但描写的方法很精密。（赵）

95 美国描写語言学学派 美国描写語言学学派是現代最極端的結构主义学派。它的奠基人是法朗士·保爱兹(Franz Boas)。他在研究美洲印地安語言时認为，用古典印欧語言学的方法对印地安語是不合适的。因此要求擺脫傳統的格、时、式等傳統的观念独立地描写新的語言。这个基本思想本来是正确的，但到他的学生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薩皮尔(E. Sapir)以后，这种思想却發展成了極端的結构主义語言学。

美国描写語言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心理学学派中的"行为主义"，这一派認为心理学只研究人从生到死的"行为"，而在研究行为时，一切要素，如意識、感觉、知觉等都被根本否定。在这思想指导下，美国描写語言学的理論有以下的特点：

1）由于人們无法知道言語行为同哪些心理活动联系，也无法知道說話的人脑子里的活动究竟如何，因此不得不把語言和思維分开，这样就使語言的意义被排除于語言研究之外了。語言的研究只需記录言語的行为。

2）語言在它一定的阶段上，应該脫离它的历史研究独立地加以描写，甚至認为历史知識会"歪曲"对語言断代的描写。

因此語言学家的任务只是去發現最适当、有效的方法輕易而迅速地去記录語言材料，并且把它們归納成变化表和类别；而在描写語言結构时，应該是作脫离历史的、离开时間要素的統計性描写。这种描写主要是掌握两种要素：一是詞素，另一个是詞素的先后次序。这就使傳統語言学中"詞"这一重要單位被他們完全否定了。描写語言学者們很注重語言系統的严整性，在他們的著作里常常提到：要把事实安排到系統里去，并不是要系統去符合事实。

美国描写語言学这种極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以及否定語言的本質要素的單位——詞，都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所不能接受的。

在划分"語言学"与"非語言学"的原則上，美国描写語言学認为詳尽地記录音位体系和語法体系的單位的分配关系是确定"語言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和結构主义的另一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是一致的。他們之間在基本理論上也是一致的。只是在术語上有所不同。因此也有人把这两个学派看成是結构主义中一个学派而同布拉格学派相对成为两个方面。他們分别研究結构主义語言学里面的各个問題，相互补充，共同發展。（赵）

读者 作者 编者

希望語言学家深入研究

《中国語文》近几期接連發表了苏联語言学者写的几篇关于汉語研究的論文。我从这些論文里，得到很多帮助和啓發，因而使我联想到：我們的語言学家最近为什么很少發表較深入的專題研究呢？是有什么顧虑，还是干勁不大呢？我相信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我們語文工作者一定不会鼓不起干勁来。从《中国語文》每期的动态里也可看出各地高等院校的語言科学研究工作确是在跃进中；可是为什么看不到發表什么專題論文呢？

因此，我十分同意上期發表的張应德同志的意見，建議《中国語文》要尽量培养新生力量，引导青年語文工作者的研究方向，也要多多动員老專家写文章。

我更希望无論是青年或是老專家，都能結合当前的語言实际問題，多做些專題的深入研究工作，不要老在已有的成就中盘馬不前，满足于感兴式的文章。

（北京 **李永宁**）

对《中国語文》的三点意見

我是《中国語文》的讀者之一，現在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見提出来供参考。

第一，《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發表的《試談成語的新發展》，同《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所刊各篇有关成語的文章，尤其是陆文蔚先生的《文学語言的新生力量》比較一下，作者不仅抄襲了例句，而且抄襲了其中一些提法。这篇文章很少有作者"个人的看法"。这种作風很不好，这样的文章也不适宜。希望《中国語文》以后审稿严格一些。

第二，《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有吉林师范大学昜功同志一篇《語言学家必須深入生活》的呼吁，我双手贊成他的意見。确实，在我們的有关汉語的書籍杂志上，有些例句輾轉相抄，眞是使人看得有些腻了。

第三，《中国語文》最近大力开展了对語言学界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批判，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也是有成績的。但也有些批判文章，写得不够深刻，尤其是結合中国語言实际还不够紧密，今后希望进一步加强。

同时，也希望在語言方面来一次"采風"，大力挖掘人民喜聞乐用的生动活潑的語言来丰富我們的研究內容。

因为我是在业余看看有关語文方面的書籍，而且也不是学語文的，所以不能对一些問題作比較深入正确的理解，这只是一些感覺，說出来作为一个讀者的意見罢了。

（四川省公安厅 **傅正模**）

希望尽量走群众路綫

一、《中国語文》从去年九月号起，陆續發表了批判資产阶級学术观点的文章，这就使本刊加强了战斗性，很受讀者欢迎。希望今后多發表这一类的稿件。

二、《中国語文》是一个在国內外都有地位的刊物，語言的規范要特别注意。近一两年中發表的文章好的很多，但也有些文章的語句有毛病，希望編輯部作文字加工时多多注意。

三、本刊最近增辟語言学論文索引一栏，对讀者很有用。我們希望能再增国內外語言学重要論文摘要一栏，这就更有用。

四、希望多出專輯，这些專輯可以拿語言学上的重要問題为中心，也可以拿有代表性的語言学者或語言学專書为中心。

五、有关汉語史的文章过去發表的很少，希望今后能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六、希望尽量走群众路綫，編輯計划的拟定，最好能經过群众（指本刊所联系的群众）的研究討論。

（合肥师范学院 **張滌华**）

* * *

編者按：李永宁同志提出的意見对本刊选稿方面很有啓發。張滌华同志所提第四点意見，我們正在进行，本年中国語文丛書当轉向这方面努力。傅正模同志从业余語文爱好者的角度提出对本刊的期望，我們十分感謝；所提几点意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中国語文

月刊

1959年4月号

总第82期

1959年4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每冊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18,325冊 代号2–44